仁智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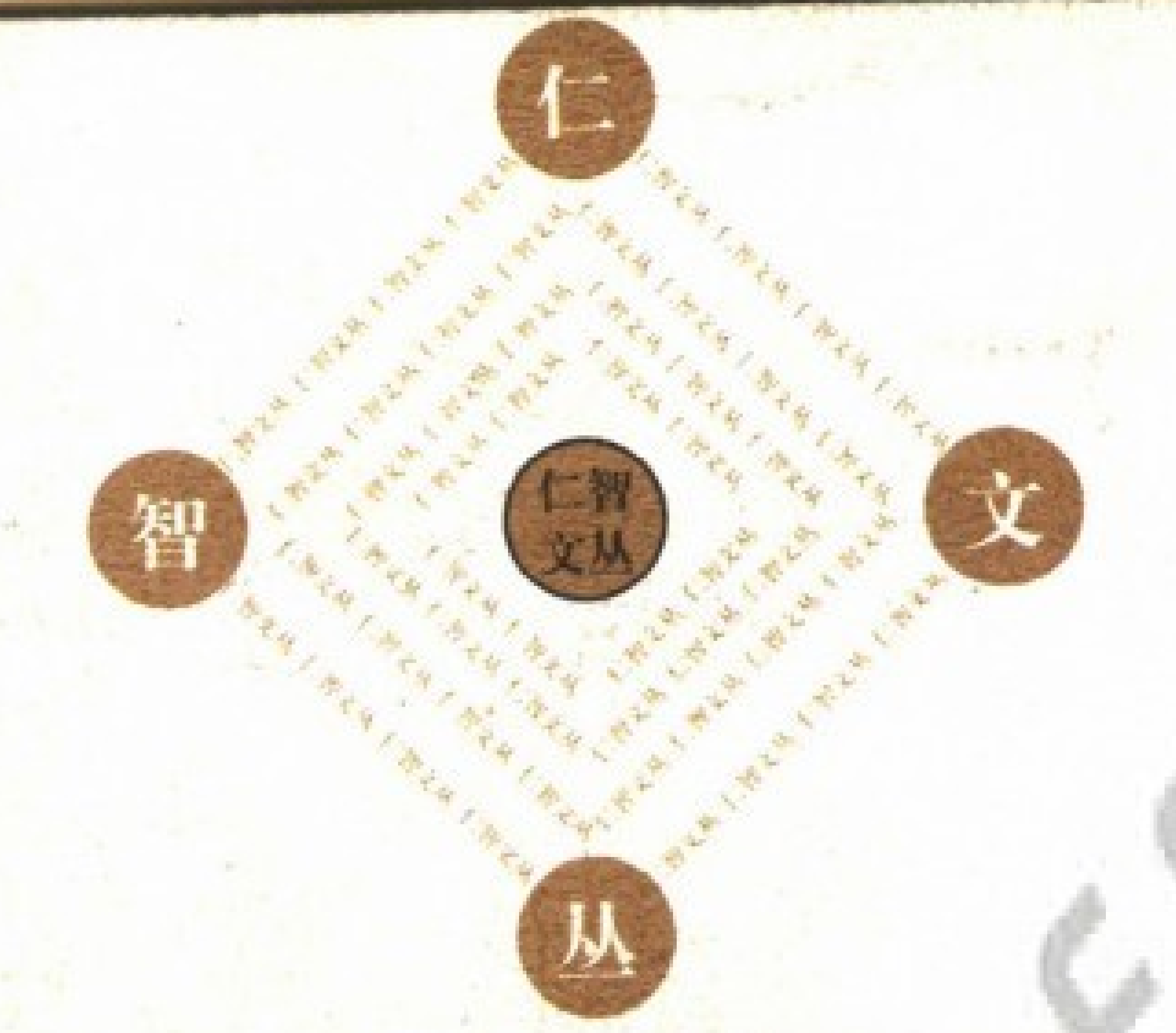
杨奎松

ZOUJIN ZHENSHI

走近真实

——中国革命的透视

湖北教育出版社



走近真实

ZOUJIN ZHENSHI

——中国革命的透视

ISBN 7-5351-2882-3



ISBN 7－5351－2882－3
G·2349 定价:19.50 元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杨奎松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
(仁智文丛)
ISBN 7-5351-2882-3

Ⅰ.走… Ⅱ.杨… Ⅲ.中国-现代史-研究
Ⅳ.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58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437100·咸宁市温泉路 41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3.25 印张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50 千字 印数:1-2 500

ISBN 7-5351-2882-3/G·2349 定价:19.50 元

目录

自　　序

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既远又近。说远，是因为哪怕是昨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只要我们不是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决策全过程，就未必能够说得清楚，因此今人和过去未免越来越隔膜；说近，是因为今天永远是昨天的继续，过去发生的一切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今天，甚至对明天产生影响、发生作用，想躲也躲不过。

中国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也许，今天来探讨半坡村文化或炎黄二帝如何影响我们现如今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多少有点感觉遥远。但是，自从有中共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却距离我们很近很近。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关注一下“革命”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烙印，也许能让我们活得更明白。

看革命的历史，要离开革命的那个时代。所谓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就是强调要有一定的距离感。以红海洋中红卫兵的那颗赤热的红心来感觉那个红彤彤的世界，是一种感觉；用丰富的历史对比和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向的深邃理解，来冷静地俯视过去，所得到的则是另一种感觉。后一种感觉无疑会比前一种感觉，更可靠，更真实。

距离对历史研究会带来很多遗憾，距离过远，今人关心的热度也越低，反过来对历史研究的推动力也越小。而且距离远了，史料——包括活的史料（当事人）和死的史料（文献档案

等）损耗越大。但距离对研究近现代历史，比如中国革命之类，却也有相当好处。除了可以获得更多理智和冷静的判断力以外，还因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文献档案30年解密制度。也就是说，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近现代历史之谜，差不多都要到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根据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深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距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止于档案开放。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即使在十几年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文章著作，只是凭借某个讲话、指示、社论和本本上的精神就来解释过去。而随着时间的远去，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随着人们历史敏感度的降低，要客观地研究和说明半个世纪以前的许多问题，如今应该不再是一件很受束缚的事情了。

当然，有了这许多足以让前人羡慕的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写出发聋振聩、启迪新知的历史文章。研究历史，贵在求真。求也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努力探索之谓也。即为探索，就难免要对过去的研究和定论有所问、有所思、有所辨。而问也罢，思也罢，辨也罢，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非要有全面深入的史料搜集功夫、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和清晰有力的逻辑判断不可。正因为如此，由于个人心态不同，社会及教育环境不同，知识积累不同，对史料的掌握和理解各异，历史学家的研究心得有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提供的知识和新意也未必一样。时至今日，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尽一致的解释，实难避免。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没有真实可言呢？当然不是。尽管存在着种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局限，努力探求历史真相，争取让读者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仍旧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反映了笔者个人在这方面的部分努力与尝试，它选择了一些可能引起读者关心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讨论的重点，并尽可能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以期引起读者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与共鸣。

当然，以笔者个人的观点，来对一些传统说法做出新的解释与说明，是否真正实现了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目的，最终还是需要让读者认可，特别是还要经过历史本身的检验。不过，笔者可以确信的是，本集所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至少能够将已有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并提供读者一些新的经验和新的思考。

实事才能求是。只有当我们真正贴近了历史真实时，我们才可能对我们的昨天和今天有更加透彻的认识，才有可能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脉搏。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于缺乏对历史的深刻检讨，无视历史的教训，看不清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曾经走过太多的弯路。但愿我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既用来照人，更用来照己。但愿我们每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都能为创造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历史之镜而努力，因为只有镜子的质量高，镜子中的影像才不会扭曲和失真，照镜子的人才可能不被假象所误导和欺骗。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

中国革命得益于俄国革命，不仅仅是在思想理论上。它更直接地体现在来自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上。这种组织上的帮助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对中国革命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从向中共党、团、工会及其相关组织派驻代表，到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到指导协助中共召开各种重要会议、帮助组建中共地下交通线，一直到干预中共中央人事、干预中共中央各种决策、遥控指挥中共军事作战等，可谓面面俱到，无孔不入。其实，俄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直接介入，从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形成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时至今日，由于文献资料欠缺的缘故，我们对这方面情况了解得还不是很深入。比如，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史实的说明，我们至今主要依据的还是一些并不十分准确的回忆材料。近年来，俄国公开了部分共产国际早年的档案材料，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使我们的解释能够比过去更贴近于历史事实。

对上海发起组问题的不同说法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所利用来了解中共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大都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提供给我们的线索通常十分有限，并且充满矛盾。因此，尽管多数著作已经就几个关键问题，如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基本达成共识，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

目前有关中共上海发起组问题的比较权威的说法，分别见

之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其中，前者肯定“一九二〇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① 后者则进一步说明：“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到达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1920年8月，首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达、李汉俊等”。②

但是，无论是在对上海发起组参加者的认定上，还是在对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的考察上，中共党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上海发起组的参加者问题，因为对何谓“上海发起组”概念不清，凡这段时间涉足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有关活动者，均可视为其成员，因此从5人到20人的各种说法都有。考虑到举证烦琐，故这里暂置不论，仅以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为例加以讨论，亦可知分歧之大。

中共上海发起组究竟是何时成立的？尽管相当多数学者赞成1920年8月说，但是，由于回忆材料众说纷纭，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上述所谓1920年5月先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三个月后再成立上海发起组的说法。

比如，同样在1981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写的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②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持大致相同的说法。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册）即称：1920年"五六月间，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发起，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由上海小组与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联系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① 稍晚如李新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则认为："一九二〇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七八月间正式成立。"② 以后如专门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黄修荣，在其专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一书中，也认为上海小组的筹建，应该是在"1920年6—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实现的。③ 1993年出版的周文琪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更进一步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4月发起，8—9月间正式成立起来的。④

出现以上不同说法的原因，根本上在于许多研究者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持有疑议。这里面的问题自然是出在研究者们凭藉的不同人物的回忆上。1993年，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任武雄先生的一篇文章曾对此作过解释。他指出：目前的许多历史著作都说：1920年5月左右，上海建立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8月左右，才建立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但原始的文献中，未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说法，主要是根据早期上海党组织的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②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327页。

③ 黄修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④ 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7页。

成员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施存统、李达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加以否认，或者从未提及。如沈雁冰明确地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①] 施存统也回忆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 1920 年 6 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有的地区党小组领导的外围组织，取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有名，但在上海，并没有用这个名称"。[②] 公认的上海发起组成员，也是对上海发起组回忆最多的李达，在他的历次回忆当中，也从未提到过上海发起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这回事。据此，任武雄先生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能并不存在"。[③]

否定先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观点，由于 1991 年新发现的俞秀松 1920 年的一篇日记，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俞秀松在这一年 7 月 10 日的一篇日记当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就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④] 显然，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俞秀松在这里所谈的那个"社会共产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因此，上海小组的成立时间，至少应当在 1920 年 7 月 10 日以前。任雄武先生"估

---

①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6 页。

② 《"一大"前后》(二)，第 35 页。

③ 任武雄：《1920 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党史研究资料》，1993 年第 4 期。

④ 《上海党史》，1991 年第 7 期。

计"："成立时间是在5、6月中"。[1] 日本京都大学的石川祯浩先生则进一步根据俞秀松日记从6月17日起，直到7月9日都未曾提到过这个"社会共产党"，和最初积极参与上海发起组筹建工作，后因孙中山反对流泪退出的戴季陶6月17日前后因心情"烦闷"，"精神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湖州疗养等情况，具体"推测"上海发起组应该成立于1920年6月17日之前的"6月中旬"。[2]

在缺少文字档案资料的情况下，要想靠对说法各异的回忆录进行分析推理来厘清谁是上海小组的成员，小组究竟成立于什么时间，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当事人俞秀松从1920年6月17日至7月25日的日记，也于事无补。其实，从上面提到的俞秀松7月10日的文字当中，我们也未必就能够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他日记里提到的那个"社会共产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毕竟，在那个时候，"社会党"、"共产党"之类的字眼儿颇受中国激进青年的欢迎，已知的号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就出现过好几个[3]，无论如何不能见到"共产党"三个字，就认定它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

稍微仔细地推敲一下这段日记的文字，我们应当不难看出，俞秀松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并不是为"前回"成立了"社会共产党"而感到兴奋。造成人们理解上出现问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其日记中不仅提到了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而且还有所谓"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这句话。一方面提到组织过"社会共产党"的事

---

① 同前引任武雄文。

② 石川祯浩：《青年时代的施存统—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日本小组及其建党问题》，（日本）《东洋史研究》，第53卷第2号，1994年9月30日。

③ 参见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实，一方面强调对安那其主义感到“茫无头绪”，肯定“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看上去确乎容易使人得出俞秀松这时已经因为加入“社会共产党”而放弃无政府主义的印象。但是，如此理解这段文字的研究者们，显然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是忽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不仅不排斥无政府主义，而且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同道的这一事实。同样经过上海发起组帮助成立的北京和广州的两个小组，最初干脆就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为骨干的。第二是只注意到俞秀松关于“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一句话，却忽略了他关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句话的含义。“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就是当时苏俄共产党人用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那个革命的列宁主义。既然作者表示对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他所提到的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对于我们又有多大意义呢？何况，如果将“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作为因，而将其后的“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作为果，按照语顺联系成一句话来理解，恐怕不仅得不出他们刚刚建立起共产党的意思，而且会得出对“前回”尝试着建立共产党感到失望的结论来。所谓“前回”，即使照字面理解，也应当是指“前一次”、“上次”、“上回”的意思，不含有“前些天”、“前些日子”的意思。

综上所述，我们恐怕应当这样来诠释俞秀松这篇日记的意思，即：

> 经历过上次组织社会共产党那件事以后，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特别是从前信无政府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如果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随便拿一种方法来改造社会是不行的。

如果以上的诠释是正确的，那么，俞秀松的这篇日记，当然不能成为证明五六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文字依据。它唯一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俞秀松曾经一度因为愤世嫉俗，向往共产主义，参加过组建“社会共产党”的活动，但此事已经成为过眼烟云，时至 1920 年 7 月，他和其他参加组织那个“社会共产党”的成员，对于推崇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仍不甚了了，颇感失落，尤其是对无政府主义失去信仰。考虑到一个多月以后俞秀松在陈独秀委托之下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这个时候的他不可能不了解陈独秀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因此，从逻辑上，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判断：或者发起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问题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或者陈独秀等人这时并未以“共产党”的名义筹建这个上海发起组。

上海小组与上海“革命局”

要真正弄清楚上海发起组的问题，需要发掘历史档案。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喜的是，1994 年底在俄国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一书中公布的几件共产国际档案文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上海发起组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几件文件是：（1）1920 年 6 月维经斯基致某同志的信；（2）1920 年 8 月 17 日维经斯基致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部的信；（3）1920 年 9 月 1 日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4）1920 年 9 月 1 日威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5）1920 年 12 月 21 日勃朗施坦和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这些来自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当时派往中国的代表及其领导机关的书信报告中讲述的情况，和我们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上

海发起组问题的深入了解。

综合上述文件的内容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员前往上海推进中国革命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夏。当时在莫斯科的威连斯基和在西伯利亚的加蓬分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得到批准，威连斯基并被任命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则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根据这一指示，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担负起了具体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的工作。①

1920年初，根据威连斯基的提议，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设了一个外国处，主要负责人为东方学院毕业，懂中文的阿布拉姆松，其工作人员有我们所熟知的维经斯基，以及马马也夫、埃尔杰列夫斯基、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关于维经斯基来华的情况，根据有关报告可知，他前往中国的确切时间是1920年4月。报告称：远东局外国处“于4月派遣以下同志去中国（上海）：维经斯基（格里戈里耶夫）作为全权代表，季托夫（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作为助手。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从此奠定了我们在远东各国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开端。而在此以前，中

①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国的工作都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例如，天津大学教授鲍立维（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和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执行编辑 A.A. 伊凡诺夫（来自巴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人。同时，还从哈尔滨派了一位懂法语的工人共产党员 K.A. 斯托扬诺维奇同志（矿工）去天津。"[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当熟悉的名字，除了维经斯基以外，还有尽人皆知的俄侨鲍立维（又译为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又名伊文阁），后来受命前往广州帮助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其中成员之一的斯托扬诺维奇。只不过，和我们过去的了解有些值得注意的区别是，报告提到的维经斯基的两个助手，似乎没有我们过去一直当作维经斯基主要同行人来介绍的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②]

从已知的情况看，维经斯基来华后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给外国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目前还见不到这封信的内容。现在公布的维经斯基最早谈及在华工作的信，已经是6月份的了。但在这封信里，我们仍不难看出维经斯基来华后主要作了哪些工作。他说：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工作的进展只限于巩固联系和完成我所拟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虽然我们在汉口、广州、南京还没有代理机关，但是我们的地方工作可以通过地方的革命者朋友直接在那里反映出来。……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群益书局"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

---

①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50～51页。

② 当然，无论是否维经斯基的正式助手，两人随同来华仍是事实。且据李达回忆，杨明斋曾"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故那个"毕业于东方学院"的季托夫是否即是杨明斋，仍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参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第7页。

的核心。中国革命运动的最薄弱方面就是行动的分散性。以协调和集中为目的正在开始准备召开全华北（原文如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正在给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以确定大会讨论的课题以及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大会有可能于7月初召开，我们将不仅参加准备工作（制定议程及决议），而且参加会议。①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维经斯基4月出发，在5月经天津、北京转到上海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发展同中国各地革命者的联系。这一工作收获显著。第二，自6月以后，维经斯基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织之间的联合与统一，为此特委托陈独秀向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准备于7月间召开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大会。这也就是说，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共产党上，而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甚至包括日本和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大同盟。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以及中国革命者不断有代表前往俄国远东寻求援助的情况，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加紧革命鼓动工作和组织共产党的极大可能性。还在5月份，威连斯基就指示维经斯基迅速在上海筹组一个临时的工作机构，定名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书记处全体委员会分设一个局，由三人组成，威连斯基亲任临时局主席。他特别强调，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

---

①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28页。

事业。在此之后不久，为就近考察中国工作的情形，推动组织宣传工作的更大规模展开，威连斯基更通知正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俄共党员统统到北京，参加由他主持的会议。7 月 4 日，他亲自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第二天便举行了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俄共党员参加的重要工作会议，一面总结前一段的工作，一面部署下一步的任务。会议讨论的各项工作中，一项格外引人注目的议题，就是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1]

众所周知，在 1920 年 7 月初以前，中国还不存在一个可以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的相应条件。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也是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产生基础的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和日本等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尚未建立。那么，何以北京会议会郑重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问题呢？显然，这种讨论不可能是文不对题或空穴来风。具体负责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这时固然没有“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计划，中国各地这时固然也不存在党组织或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产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但是，维经斯基却有一个“在最近期间召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小组织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组织中心的计划。联系到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也是鱼龙混杂的情况，联系到俄共（布）同本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某种合作关系，不难想象威连斯基等人关于迅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设想之上的。似乎可以认为，俄国人 7 月初在北京会议

①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41～42 页。

上讨论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代表会议”，就是维经斯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和组织的这次会议。只不过，威连斯基更倾向于把维经斯基组织的这个社会主义者大会，直接变成一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

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召集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大会，于7月19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多半是由于受到会议组织者的影响，与会者专门讨论了要不要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关于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大会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问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与会的多数人能够接受“社会党”的名义，只是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更赞成使用“共产党”的名称。[①]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足以显示其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则定名为“革命局”。[②] 紧接着，在这个“革命局”之下，还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同盟的日常运作。[③]

关于在维经斯基参加下，这个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海“革命局”工作的情况，我们在当时曾经参加过出版部工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隐约的轮廓。它很明显是各派社会主义者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生动表现。据郑回忆说：1920年夏

---

① 陈独秀9月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公开使用“社会党”自诩，看来也是适合多数人意愿的一种需要。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② 有学者认为革命局成立时间为1920年5月，成员也主要是俄国人，似乎是未能细读1920年6月和1920年8月维经斯基的信。见谢荫明：《俄共（布）在华革命局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党史》，2000年第5期。

③ 参见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党史研究资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1～32页。

天的一个晚上，维经斯基、杨明斋与随同维经斯基来的那个朝鲜助手，再加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一个印度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尉克水、郑佩刚等，“在陈独秀家中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维经斯基后交2000元给陈独秀转给郑，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很快，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建成了，并迅速印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①

郑佩刚的回忆同维经斯基报告中所说明的情况相当吻合。维经斯基的报告称：

出版部现有自己的印刷所，并印刷各种小册子。几乎所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按即海参崴）寄来的材料（除书外），都已翻译并在印刷中。《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有15种小册子和传单正在付印。

结合郑佩刚的回忆，可知从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到成立上海“革命局”，再到建立印刷所，印出《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的工作，都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20余天里完成的。据报告称，在8月22日星期日，他们还将要开始出版一新的中文的工人周刊，即《劳动界》。印数两千，也是在又新印刷所里印刷。

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无论是出版《共产党宣言》，还是出版《劳动界》，显然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为。因此，不难想象，维经斯基报告里谈到的这个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维经斯基有关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他报告说：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工作，指导他们走

①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8～959页。

向联合工人和士兵的方向。目前，这方面尚未取得很大成就，但已经有了几个首先倡议的小组，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他们进行工作。

本周我们组织部从十个地方工会和车间各召集两名代表，以组建工会中央局，该局代表将加入我们上海革命局。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用英文写成的。经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已译成中文，决议的提纲现已作为工会在工人中的宣传材料。

……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类似上海局的组织，然后通过各局代表会议将工作集中起来。现在还只是在北京有一个局，该局接受我的以及米涅尔（按即斯托扬诺维奇的匿名）同志和鲍立维教授的工作指示。如今我拟派米涅尔同志从天津去广州，在那里他将要组建一个革命局，设两个部：情报部和组织部。

……在广州局成立的同时，我们正在安排汉口局的工作。①

这一年的 8 月，原先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下属的外国处撤销，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了一个以布尔特曼为主任，加蓬为副主任，勃朗施坦为部主席团书记兼情报处长的东方民族部。原远东局外国处的阿布拉姆松担任东方部中国处负责人。从阿布拉姆松与勃朗施坦这一年 12 月 21 日联名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上海“革命局”下属的组织部还直接推动并策划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报告在说明组织部已经成功地在中国的各大工业建成了

①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33 ~ 35 页。

相应的“革命局”之后称：

>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工作，引导他们活动，同工人及士兵建立联系并组织他们。为联合革命的大学生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我们在中国各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大学生的会议，在此基础上，8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了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团组织的代表进入了我们的革命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直接并积极对大学生运动施加影响，指引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开展有效的革命工作。我们在上海的分部利用这一影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大学生的革命运动，指引他们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人集团划清界限，这些集团的方针是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而倾向于美国式的民主的。我们的方针与此不同，主张社会革命和坚持面向劳动人民大众。①

稍微熟悉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的读者都能够了解，上述报告中的各项工作，从前都是挂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名下的。而维经斯基在报告中提到的工会中央局，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所报告的由上海局，而北京局，而广州局，而汉口局的情况，恰恰与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从上海、而北京、而广州、而武汉这一发展顺序相一致。他报告中提到的派斯托扬诺维奇前去广州组建“革命局”的情况，也恰恰符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报告的内容。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 年的报告说，1920 年底斯托扬

①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51～52 页。

诺维奇与另一俄国共产党员佩斯林受命到达广州，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共产党”。[1] 长期以来，我们不十分了解，斯托扬诺维奇为什么会到广州去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了解了1920年7月社会主义者同盟产生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上海“革命局”的作用，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斯托扬诺维奇去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既不是技术上的失误，也不是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由于对当地情形不了解。他早就知道他要去与哪些人合作。这完全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其领导机关——上海“革命局”所希望的。同样，东方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关于上海“革命局”已经成功地于8月17日在北京召开大学生代表会议，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明，也正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功绩之一。[2]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而派生的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

几点分析

根据上述，我们或许可以对众说纷纭的上海发起组及其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问题，作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判断。

第一，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其实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产物，也即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熟知的上海、

---

①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远东人民》，1921年第4期）关于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时间与这里所说的略有不同，是8月22日。

北京、广州这几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其成员的派别背景与思想倾向都极为复杂。

第二，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这与维经斯基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维经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国并加入俄共(布)。[①] 在维经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相互之间的转换不应当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来达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有其特殊的背景。[②]

第三，作为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指导者，威连斯基及其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显然不反对维经斯基所进行的努力。但威连斯基的5月指示以及他所领导的7月北京会议，清楚地显示出俄共（布）更倾向于在中国直接建立纯粹的共产党。很可能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协调机关的上海“革命局”在这一年的秋天迅速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即由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等起草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地组织的分裂和各地革命局向纯粹共产主义小组的转变。

第四，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数最初都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革命局”而产生出来的。它们从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纯粹的中共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经历过一个过程，人员构成也有过较大的变动。但其性质与人员的变动，并未中断其组织形式的延续。

---

① 见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页。

② 这个时候维经斯基也在积极联络日本等国社会主义者，推动他们组建共产党。无独有偶的是，他在日本也同样是以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同盟”为先导，进而促成日本共产党准备委员会产生的。参见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1页：犬丸义一著：《日本共产党的创立》，日本青木书店1982年版，第62～63,76～77,84～86页。

因此，计算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立时间，仍可以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为准。而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不早于1920年7月初俄共(布)党员北京会议，应当是在7月19日社会主义者联合大会以后，但也不应晚于8月上旬。

第五，最初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工作机关而产生的上海“革命局”，开始向作为中共发起组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转变，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界限。这就是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的出版。但是，这个转变的完成或许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直到1921年初，党的小组和青年团均分别召开“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且在提议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失败后，解散了青年团，这一过程才算最终完成。[①]

第六，既然上海发起组最初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协调机关，并且下设各种工作部门，它最初的成员自然派别各异，而且人数较多。随着这一组织在维经斯基以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日益标明共产主义的倾向，从统一战线组织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它的成员也就自然日渐减少。所以，简单地争论或肯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是5人、6人、7人、8人、或15人、20人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当注意到它的构成是随着时间和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七，应当肯定以威连斯基、维经斯基为代表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以及组建上海、北京、广州等“革命局”的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以往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所做的各种说明中，不仅很少提到威连斯基及其背后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相关作用，而且也忽略了维经斯基正是这一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一事实。

---

① 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前引舍维廖夫文。

第八，上海“革命局”最初由5人组成。[1] 已知这5人中包括维经斯基，另外4人是中国革命者，其中有陈独秀和李汉俊，其他两人的姓名在上述档案文献中没有记载。需要注意的是，从维经斯基8月17日的报告看，上海“革命局”成立后并非一成不变，它至少已计划增加两人，一人是新组建的上海“工会中央局”的代表，另一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后者似乎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

① 1921年中共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中一共只有五个人”一事。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上)，第52页。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

陈独秀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从一个前清秀才，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进而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①]，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甚至是中共五届中央的总书记[②]。曾几何时，斗转星移，陈独秀成为"反对派"，遭共产党唾弃，被国民党判刑，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综其一生，与共产党关系最大。恰恰是陈独秀在共产党的这一段时间，许多资料长期不得披露，研究起来困难最多。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③] 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这里谨按习惯称法。

③ 《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页。

情形[①]。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②]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③]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能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④]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抑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坦率地说，“右倾”也好，“左倾”也好，未必是历史学家

---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396页。

②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

③ 参见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④ 参见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17页。（原文发表于1978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杰柳辛：《中国1925—1927年革命》（原书俄文版出版于1982年），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291~293页；袁南生：《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史实的新佐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

应该讨论的话题。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①，但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欠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随着俄、德、中三种版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27)》(文件集）的出版，这样的条件得到了重要的改善。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就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某些传的说法，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更“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件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根据《毛

---

① 1990年，围绕着陈独秀是否要求将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中国学者中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郑超麟先生也曾加入到争论中来。争论虽然只是就几个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展开，但已涉及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问题，并且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退出的主张是“左”倾的，一种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些讨论还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即陈独秀总的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别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5、6、9期。笔者同年也曾发表《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载《文史哲》1990年第6期)，具体讨论了1924—1925年间陈独秀及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的分歧问题。比较深入地讨论到这一问题的，还有国外的部分学者。早先如俄国学者格鲁宁所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译文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如德国陈之宏的博士论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

泽东选集》中的说法，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①] 这句话，逻辑上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因为党初创时期“幼稚”，所以才选了“幼稚”的陈独秀来做总书记。

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②] 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③]，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

---

① 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竖排版)，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页注。

② 陈独秀当时明确讲：“不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因此，“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从分配上下功夫来解决社会上贫富不均问题。分别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以及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③ 《俞秀松日记》，《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①]。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

---

① 参见拙作：《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1920年九十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出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

希望”。①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都相信，中国从1911年帝制被颠覆之日起就已完成了从封建到共和的革命转变，陈独秀也不例外。因此，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革命要“两步走”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到第一位来。此后的陈独秀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乃情理中事。但是，他长人之处在于，他毕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民主派”与“君主派”的斗争在中国其实依然存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应当支持，而遇着“民主派”反对“君主派”的斗争的时候，“吾党”应该帮助前者反对后者。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从1920年九十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1921年7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有

①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

所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他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①] 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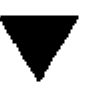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②] 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

① 《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清楚地描述了俄国式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此所做的说明含混不清，特别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一条，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国革命的方式大相异趣，而且明显与此后共产党人反对军事革命的主张不同。不知所据为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见《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①

陈独秀：“暂时支持国民党”



对俄国人“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 CY 中央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② 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③ 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帖帖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

反对加入国民党

---

① 关于早期闹独立性的问题，仅见于包惠僧的回忆，但颇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陈独秀因担心被人指为“卢布党”，因而反对拿莫斯科的钱。而事实上从已经披露的陈独秀当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时间很难自行筹款，因而“希望国际有所接济”的文字。参见包惠僧：《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百科知识》1979 年第 2 期；《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 年 6 月 30 日等。

②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5 页。关于陈的个性，陈自己也有过公开的检讨。如在中共三大的报告当中，他就承认自己“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172 页。

③ 王观泉前引书，第 34 页。

表马林1922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4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1]“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2] 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员，必然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相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束缚，绝不可能。[3]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

---

① 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Dov Bing与Muntjewerf和Adrian Chan在“China Quarterly”（No.54，56）上曾激烈争论有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问题，从Dov Bing的答复中以及从现有资料中，都看不出这一次的讨论是在杭州进行的。

②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③ 关于陈独秀多次赞同或主张同国民党人合作的情况，可参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页。

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①

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②，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月28—30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一年以后报告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③

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

---

①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显然对党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绝望。他在6月30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明确讲，与孙中山联合的希望很小。

② 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③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9页；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同上引书，第92页。

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①] 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②] 只要看一看他 1922 年 11 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

① 参见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1922 年 11 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93～94 页。

② 蔡和森坚持说：“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认为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他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 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47 页。

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1]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1922年8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5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3] 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

---

①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并见《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陈独秀率刘仁静、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同时还提交了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农民状况、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等4份报告。

② 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81页。

③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163页。

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①]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

---

①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①] 共产国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有多少差别。

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国内舆论与社会对此竟没有太强烈的反响，对京汉铁路罢工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因为自身力量太小，虽义愤填膺，却也一筹莫展。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它一定的道理：必须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否则难有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实行阶级斗争的有利环境。

"二七"惨案之后，国际代表马林首先开始写信给莫斯科，尖锐批评共产国际根本就不该强调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说这纯属"幻想"[②]。当然，马林未必真的主张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其实就是希望共产党人只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就好了。[③]

---

① 见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副刊》，1922 年 9 月 17 日；独秀：《造国论》，《向导》，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并见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 年 8 月 26 日。

② 《马林给拉夫斯坦的信》，1923 年 4 月 3 日；《马林给布哈林的信》，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46、194 ~ 195 页。

③ 马林在事实上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放弃独立性。他不仅鼓励中共中央公开监督和批评国民党的政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地以孙铎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党。

来自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影响，也促使陈独秀更深刻地体会到走好革命第一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如今，"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共产党人很清楚："虽然明知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① 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直接从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②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与马林结成了统一战线，突出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动国民党左倾的工作上来。三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一面强调保存党的组织，努力从工人群众，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革命分子，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一面解释说：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不能发生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而整个决议的中心在于说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故"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

① 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②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1923年5～6月。

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1]

过多地注重国民党，并且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扩大国民党的问题上来，也难免产生陈独秀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问题，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一面坚持：“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一面又叮嘱说：这一切做法要自然，“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涉及到任何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感的行动，中共领导人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2]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陈独秀等人当初之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就是担心会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纪律束缚。而中共三大刚刚开过不久，孙中山和广州的国民党人就因陈独秀等在《向导》等刊物上批评国民党，而大起纠葛。孙中山甚至当着马林的面提出警告，扬言陈独秀若再不收敛，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通过决议，决定避免在报刊上过多刺激国民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批国民党元老再度借机抨击陈独秀“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果又引起新一轮矛盾。[3]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强调谨慎以外，陈独秀还不得不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他表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6～148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00～201页；《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团领导小组会议纪录》，1924年1月17日。

③ 参见《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6～297页。

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 1917 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①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②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作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画上等号。

据说，有关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与"二次革命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将无产阶级领导权贯彻到底的问题。前者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领导十月革命，而且要领导二月革命，以便由二月革命紧接着就不间断地转向十月革命；而后者则放弃二月革命的领导权，等于将领导权"拱手"

①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 2 号，1923 年 12 月 1 日。

② 胡华：《试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 65 页。

让给资产阶级，任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十月革命。然而，这种看法大概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不要说陈独秀依据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握二月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错，陈独秀何错之有？何况陈独秀也并非不想要所谓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当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公开利用党内合作的条件从国民党内部来夺取其领导权又势必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导致民主革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想象一下中国可能也将不得不像俄国那样，经历一个从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到十月革命劳农政府的转变，又何错之有？

关于领导权问题要随着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应该能够有所了解了。毛泽东当时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国共两党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即使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也还相当慎重，只是使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说法。[①]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同在1923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比陈独秀的看法实际上更为悲观。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

---

① 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年4月5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2期。

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1] 如果我们说陈独秀主张的是什么“二次革命论”，那么毛泽东呢？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1924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200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2]。以致从1923年10月以后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共

---

① 见马林所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谈话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36页；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② 据陈独秀会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的已经以共产党人为主，发起建立了国民党党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12月27日。

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①

对于这种情况，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② 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工作。③

1924年5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

---

① 《鲍罗廷与谭平山谈话纪要》，1924年1月10日。

②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68，373，412页。

③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pp. 864-866；《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93～494页。

命集团的含混说法①，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②；一反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断言“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③；一反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主张，提出：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会议的基本目的，明显地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④

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知道维经斯基在五月扩大会议开会前半个月就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主

---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页。类似的说法其实是马林的观点。见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②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扩大会议决议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同时又肯定其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他们的阶级利益每易趋于妥协”。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0~243页。

③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61页；《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④ 同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7，244页。

张与国民党决裂”，陈独秀虽与维经斯基同一立场，决心一面加强自身的发展壮大，一面在国民党内加强阶级斗争，但不难想象，他未必没有同样激烈的想法。[①] 会后，陈独秀马上就向鲍罗廷提出了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国民党内这时批评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共党团活动的舆论正烈，鲍罗廷穷于应付，也乐得把这一分歧归结为派别斗争。他于是公开讲：“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②]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无遗。由于党内合作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员都已是国民党员，不管陈独秀等人以何种名义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不免被国民党人看作是党员反党的证据。不过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就有20多件，党员达2000余人。到6月18日，更进一步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党案。让陈独秀深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对此不仅不压制，反而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陈独秀自国民党一大以来，一直都把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坚持适度的批评，并不担心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压制右派。但进入7月，孙中山同意讨论弹劾案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看法都开始变化。鲍罗廷断定：“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陈独秀却告诉维经斯基说：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还有一定数量的

---

① 见《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5月6日，《瞿秋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页；《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1924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96页。

②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6月，《瞿秋白选集》，第2卷，第607页；《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

左派，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①

五月会议本来就激起共产党人对党内合作形式的潜在的不满，随之而来的两党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浪潮，陈独秀显然也在考虑万不得已时的办法。鲍罗廷见状急忙做广东区委的工作，劝说广东区委于7月15日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中央准备退出国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同时写信给瞿秋白，通过瞿转告陈独秀：“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不了解“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②

不论陈独秀是不是得到了来自广州的劝告，他显然我行我素。在7月21日的中央通告当中，他以“委员长”的名义通告全党称：五月扩大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此时国民党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为此，陈独秀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要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

---

① 见《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03页。

②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08，511页。

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且“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吸收一切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左倾分子，以“形成国民党左翼与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陈独秀虽然没有在通告中谈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且仍然主张“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他无疑是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的。①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刚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被鲍罗廷推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一同与会。当他从鲍罗廷处得到消息，得知鲍罗廷和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一）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②

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开会做出决定，发往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没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全会上采取进攻的态势，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辩解，反对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旧赞同了那个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

---

①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②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

开通报给国民党。[①]

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倍感沮丧。他在随后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明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然不能开除我们，但却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目的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令人气愤的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②]

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瞿秋白 9 月 23 日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③]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严厉批评鲍罗廷的同时，高尚德在广州也推动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展开了同鲍罗廷的辩论。

---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 ~ 75 页。

②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 年 9 月 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528 ~ 529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 年 10 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 年 10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532 ~ 534 页。

广东区委这时与鲍罗廷的争论也颇为尖锐。共产党人不赞成孙中山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江浙军阀卢永祥来对抗直系军阀吴佩孚，鲍罗廷却不予反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以支持北伐，服从大局为名，强迫广州印刷工人停止争取改善自身权益的罢工，鲍罗廷却坚持劝说共产党领导人要工人复工；共产党人反对听任商人资本家组织武装威胁广州政府，鲍罗廷却赞同孙中山搞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所谓实行广州自治的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与国民党还有许多具体矛盾，如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人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是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已经使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陷入困境，使民众也产生了恐惧或困惑的心理。对此，鲍罗廷更是熟视无睹。

正因为如此，当高尚德带来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到来后，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委立即召开会议，同鲍罗廷进行了长达几天时间的反复辩论，明确主张，即使不退出国民党，也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作，否则无法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会议并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做出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涉及有关地区性的问题时，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

由于10月中旬突然爆发了广州商团叛乱事件，10月下旬又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共中央以及广东党组织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起来了。但到一个多月后，即维经斯基再度来到北京和上海，先后参加了12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925年1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仍旧成为陈独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个重

点。

1924年12月上旬，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陈独秀对鲍罗廷乃至对共产国际的不满。陈独秀等人不仅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陈独秀明确说：我们给他送去了许多决议，发去了许多电报，他从来不予答复。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工作。他在广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国民党的工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1000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1000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一百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2000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200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①

不难看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共产党人，在涉及到共产党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对鲍罗廷，就是对莫斯科也颇多怨言。他们相信，莫斯科过分重视国民党了，共产党的发展不该受制于鲍罗廷。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事实上是倾向于支持陈独秀的，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并不等于共产国际，

①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4年12月5日。

共产党没有必要听鲍罗廷的，它应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而不能一心不乱地为国民党做苦力。

让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津津乐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它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共产党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突出地表达了陈独秀这时对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它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反对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任，宣称革命成功即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左倾；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忘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便是右倾。

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

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党。[1]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2] 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1923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3]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

---

① 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41，379～380页。

②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73页。

③ 三次"大让步"的说法，始见于周恩来1943年整风期间在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以后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种定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23页。

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〇”事变，或其他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1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9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尤为重要的是，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此即后来史称西山会议派之前身），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①

共产党势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

① 《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25年10月。另据维经斯基1925年8月4日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称“我们党共有2500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46页。

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恺遭到暗杀，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卷入暗杀事件，过去曾经被中共视为左派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站到右派一边，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这在最初显然是鲍罗廷不愿意看见的。

还在 1925 年 5 月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双方就再度发生严重争执。鲍罗廷坚持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到广州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即使损害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不仅陈独秀，就连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也深感鲍罗廷要求过分。而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双方之间更是意见冲突。陈独秀提出 7 人，鲍罗廷却坚持不要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说是“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争到最后，陈独秀不得不妥协至 4 人，鲍罗廷这才勉强同意下来。①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利用孙中山逝世后自己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的特殊身份，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挤走了胡汉民，赶走了国民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许崇智，把与苏联顾问靠得最近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显赫地位。因此，鲍罗廷胆子明显地变大了。不过陈独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虽然肯定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称赞他们“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但他对鲍罗廷必欲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始终难以释怀。注意到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势必会更加刺激国民党，导致国民党或共产国际反过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陈独秀再度明确提议：适当时机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②

① 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 年 5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613～615 页。

② 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并见 1928 年 6 月中共代表在中共六大预备会期间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解答的 18 个问题。

这个时候，形势之复杂与微妙，就连共产国际内部也意见分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因为过于弱小，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旗帜，在国民党内进行群众工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继续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占据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维经斯基就明确认为，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怀疑和右派的攻击，再加上“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自然会导致关系紧张。他相信：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必要“从联盟转向联合”，否则将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共产国际却相信，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难免会使国民党内右翼倾向抬头，使苏联控制和影响国民党的力量减弱。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反对任何退出国民党的企图。它的书记瓦西里耶夫 9 月 21 日上书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警告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必须赶紧重新审查它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党不应当要求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①

1925 年 10 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到中国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的维经斯基，贯彻了共产国际反对退出国民党的意图。② 不过，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陈独秀为全会起草的有关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仍旧坚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决议称：过去将国民党分

---

①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 年 9 月 21 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 年 8 月 19 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 年 9 月 2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678，656，692～693 页。

② 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见《告全党同志书》。另外在 1928 年 6 月中共代表所提 18 个问题当中，也谈到吴廷康反对的情况。

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当的，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左派，把靠近自己的国民党人视同中派，实际上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汪精卫等为左派，戴季陶等为右派。“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维经斯基却鉴于戴季陶等与西山会议派有所矛盾，坚持将戴季陶等视为中派，说什么：“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因为我们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并通过国民党实现全面的统一战线。”①

1925年11月底，利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北京地区的机会，国共两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示威游行，试图发动一场“首都革命”。尽管革命本身没有成功，但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维经斯基显然进一步为他的妥协主张找到了根据，因为没有巩固的国共合作，包括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共产党无法在北京发动如此规模的示威行动。因此，他强调说：“在那些无产阶级数量很小，特别是没有像在上海那样出现革命运动的地方，不巩固统一战线，不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自我克制，“委员不妨少些，多做基层工作”。对于右派，也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方针，“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他这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对右派“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②

正是由于维经斯基坚持的结果，陈独秀在这之后与在上海

---

① 《陈独秀在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925年10月；《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88~490页。

② 《维经斯基的报告》，1925年12月；《维经斯基关于与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委员会谈的报告》，1925年12月4日。

正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了谈判，劝说他们改变初衷，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他为此保证说，共产党绝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并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三分之一等。[①] 比较一下5月间陈独秀费尽口舌才争到4个名额，可以想见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陈独秀未必是个妥协的数字。何况，陈独秀对此也并非心甘情愿。联系到陈独秀这时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措辞尖锐的政论文章，坚持把国民党分为左右派和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立场，断言戴季陶乃国民党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断言右派乃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断言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②] 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维经斯基所说的这些“中派”请回去，并许下若干让步的保证，并不是陈独秀所主张的。

不论陈独秀意愿如何，请回孙科等人，与广州的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这时的意图是矛盾的。在巧妙地运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广州政权之后，鲍罗廷已不那么缩手缩脚了。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等主张团结和妥协，而鲍罗廷却对军事受到苏联顾问控制，政权在左派汪、蒋手里的广州局势充满信心。对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与汪精卫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过去反对多选共产党人的态度，决定国民党中执委中应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中至少一半为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区委对此举双手拥护。只因随后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鲍罗廷才转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选入

---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66～67页；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

② 陈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陈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陈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

中央，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里，让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最后仍然把掌握着国民党实际权力的中央党部中将近80%的领导职位，交给了共产党人。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人没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占据多数，只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还是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三二〇"事变发生，以及随后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显而易见都是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来的。换言之，在不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占据国民党的中执委也好，占据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好，最后的结果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陈独秀的第二次"大让步"，指的是"三二〇"事变时不敢反击，让蒋介石轻易得逞。但这个说法明显与事实有距离。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莫斯科不满鲍罗廷擅自在广州策动政变，搞掉胡汉民、许崇智。国民党右派公开提出要求撤换鲍罗廷，深知此中内情的维经斯基也不表示反对。再加上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也对鲍罗廷大权独揽颇多怨言，主张撤换，竟至迫使一向支持鲍罗廷的加拉罕不得不同意召回鲍罗廷。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名，打道回府，实非得已。②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这时对国民党现状的担心所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使团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0页；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51~154，210~211，226~227页。

② 维经斯基1925年12月同国民党右派领导谈判时，对右派领袖提出的解除鲍罗廷职务未置可否，仅表示国民党的工作一时离不开，现在暂时不宜让鲍走。鲍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不满，提出辞职。与此同时，苏联代理军事顾问季山嘉也写信状告鲍罗廷，说他无端干预军事工作，要求撤换鲍。加拉罕这时不得不决定让鲍罗廷回国。

在。而事实很快也就证明，莫斯科的担心可能并非毫无道理。

鲍罗廷对当时的广州形势自然是信心十足的。他在路经北京时，向刚刚到达北京，准备前来广州的苏共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汇报过国民党内部状况，他明确肯定，包括他所选定的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和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但就在布勃诺夫刚刚到达广州不久，鲍罗廷打过保票的蒋介石就在 3 月 20 日发动了一起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政变。他一举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逮捕了自己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员，并且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广州实行戒严。这就是所谓的“三二〇”事变。

“三二〇”事变的直接诱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过于自负的处事态度，与蒋介石“天性多疑”和“虚荣心特别重”的性格发生了冲突，引起了蒋的严重疑惧。但从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排斥共产党的措施看，不难看出政变归根结蒂是冲着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太大的权力来的。如果这时布勃诺夫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加上有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支持，再争取到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军事领导人的附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莫斯科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反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占据国民党领导机关，再加上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几乎所有苏联顾问都曾报告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因此，布勃诺夫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采取了妥协的作法，同意了蒋介石关于撤换季山嘉等一系列要求。[①] 结果，季山嘉被布勃诺夫带回苏联，汪精卫孤立无援，被迫去职赴欧，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就攫取了党政军大权。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录》，1926 年 2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60 页。

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关于“三二〇”事变的具体消息，已经是在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了。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对事变临机的指导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①] 事变后不论广东的共产党人内部有无争论，在布勃诺夫批评军事顾问和共产党人过分突出自己、发号施令是引起事变的重要原因之后，中共广东区委的态度事实上与布勃诺夫没有两样。3 月底广东区委已经发出公开信，保证说：“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并且宣布说：“我们广东现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②] 很显然，当时在广州实际指挥退让的，是布勃诺夫，并非陈独秀。

至于陈独秀的第三次“大让步”，则是指陈独秀派张国焘等到广州，逼迫广东党组织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第一，应当看到，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第二，接受《整理党务案》既不是陈独秀的主张，也不是张国焘能够说了算的，它是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

对于“三二〇”事变起因的具体了解，陈独秀主要是听路经上海回国的布勃诺夫介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对事变起因的认识，自然比较多地是俄国顾问和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引起了误会之类的印象。陈独秀在 3 月 29 日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就明确肯定事情是国民党右翼的孙文学会成员蓄意

---

① 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大让步导致共产党失去反击机会的说法，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1 页。

②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大会上的报告》，1926 年 3 月 24 日；《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 年 3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169～171，184～187 页；《中共广东区委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人民周刊》，第 7 期，1926 年 3 月 30 日；太雷：《怎样巩固革命基础》，《人民周刊》，第 8 期，1926 年 4 月 6 日。

制造，蒋介石误以为真造成的。但他同时也谈到，“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疑心很大。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蒋介石还是左派，蒋、汪关系破裂和国民革命军因此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陈也同意“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主张“应该全力‘拯救’他”，使他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从而不再害怕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很快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决不会去推翻他。① 有许多人批判他这时“千方百计地向国民党讨好，结其欢心，瞻其马首，绝对服从命令，不敢越雷池一步”。② 查一查他在“三二〇”事变后这段时间的文章，对蒋介石几近阿谀的言论也确实可见。问题在于，远在上海，不清楚事变真相，又不能火上浇油地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以致丢掉广州，在当时情况下，陈独秀除公开向蒋示好，消除“误会”以外，如何能够去表示强硬的敌视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事变过于突然，多数人又相信其中确有误会，共产党人解决事变问题的全部希望，最初自然都寄托在了对蒋最了解的鲍罗廷身上。事变发生后，布勃诺夫就提议将正在返国途中的鲍罗廷紧急召回广州。蒋介石事变后也确实很快发表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声明，并讲了不少高度称赞共产国际的话，陈独秀相信蒋介石可能还不是右派，也不无理由。据说，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曾同广东区委商量，“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而这时恰逢蒋介石专门写信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共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汪精卫也已离开，陈独秀又始终担心

① 《张万和（中共中央化名）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 年 3 月 29 日；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 148 期，1926 年 4 月 3 日。

② 见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剖析》，《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 54 页。

广州国民革命军其他将领更加反动，他自然没有表示赞同的意见。[①] 中共中央这时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电报说明了它的设想：国民党5月15日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已派张国焘、彭述之与蒋介石商谈，争取在全会召开前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下一步的策略是正确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当共产国际来电，询问中共中央是否有退出国民党的打算时，陈独秀明确答复说：“我们不打算退出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也无意开除我们，他们只是想限制我们在国民党里开展工作。”[②] 可以看出，陈独秀直到这时在上海仍然没有得到更严重的情报，因此仍旧相信有可能争取蒋介石。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而4月底莫斯科实际就已经做出决定，并通过电报通知了鲍罗廷。决定的内容很明确，即“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③] 因此，不论鲍罗廷是否曾经提出过“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主张，他的态度已经迅速转向了妥协。在与蒋介石反复谈判后，他转而力劝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态度。有莫斯科的指示，张国焘等自然也只好转而去劝说广东区委的同志们。最终，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办法被认可了。据蒋介石日记描述，当他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但无论鲍罗廷，还是与会共产党人，均未争

---

① 参见《中共委员会的信》，1926年6月9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第36~37页。

②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电报》，19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1926年5月。（电报5月11日由北京转发莫斯科）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36~237页。

辩与反驳，蒋当然喜不自胜，马上与鲍罗廷重叙友情，并兴致勃勃地下令去鲍公馆“看影戏”。①

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恐惧心理。它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凡中共给其党员的训令，均须先交联席会议通过。② 结果，共产党人纷纷被迫从国民党的重要机构和军事部门当中退出，国民党明显右转。显然，这并非是陈独秀预期的结果。只有鲍罗廷出于迎合莫斯科的目的，报告说：《整理党务案》使国民党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但它“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对广州的右派领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退出后，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③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较孙中山两年前的那个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明显地要苛刻得多。陈独秀当年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已经是怒不可遏，如今对《整理党务案》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对付《整理党务案》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退出国民党。维经斯基此前也在信中特别提到了需要调整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的设想，莫斯科的命令当中其实也委婉地提出，如果问题严重，同意讨论改变党内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在不能破裂国共两党统一战

---

① 参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6~588 页。

② 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 233~234 页。

③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 年 5 月 3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272~282 页。

线关系的情况下，陈独秀只好一面公开否认《整理党务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称："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于贵党党外之机构，则殊无所关涉"。一面召集会议，决定："1. 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 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 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 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简而言之，就是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不受《整理党务案》的束缚。他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坚决"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①] 严格地说，这才是陈独秀对《整理党务案》的真实心态的反应。

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掌握国民党大权的情况下，退出国民党，是否对中共更有利，同样值得讨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确的。维经斯基6月下旬再来上海后，马上就反对陈独秀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维经斯基"坚决同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作斗争"的情况下，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被压制下去了。会议决议表态说："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只能便利资产阶级实现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对国民革命的指导。

这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得出了蒋介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结论。因为北洋军阀势力一向被认为

---

① 《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20～221，236～237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192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42页；转见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1927年4月5日，《国际共运史研究》，第2辑，第209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代表封建地主势力，西山会议派只能被认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依照逻辑蒋介石也只能被定性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了。据此，会议一反陈独秀过去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点，断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基于不能退出国民党的考虑，会议只能强调：“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对蒋介石，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①

既然肯定蒋介石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会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承认：由于我们过去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把它们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壮大，结果“广东的革命领导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去了”。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当前的整个问题在于：“谁领导中国的国民解放运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如果是资产阶级，那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断送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怎样争取我们的领导权?”他的看法是：既然现在革命还不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要试图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现在对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全力争夺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在使蒋介石成为我们的同盟者

---

① 《维经斯基致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主席团的信》，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21页；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8～171，176～177页。

的同时，努力排除他对国民党的领导。[1] 不论如何解释陈独秀的上述说法，他并不打算对《整理党务案》做无条件妥协是可以断定的。

《汪、陈宣言》缘何产生？

应当看到，如果说“三二〇”事变前，特别是从孙中山逝世到国民党二大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治上分崩离析、军事上群龙无首，鲍罗廷还可以背靠苏联，以谋略取胜的话，那么“三二〇”事变，特别是“五一五”之后，蒋介石独揽军事大权，并成功地控制了党权和政权之后，继续运用谋略纵横捭阖地拉一派打一派，就成了一件带有极大冒险性的工作。不论是陈独秀，还是俄国人，显然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了。陈独秀明确讲：我们说争夺领导权，并不是要重新夺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失去的那些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而是要做到“支配运动的政治领导和基本口号”。说到底就是要争夺群众。“我们应当在工农群众、革命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影响，使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2]

陈独秀的这一说法，其实也就是毛泽东 1937 年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明显据有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过的那个“政治领导”权的主张。但是，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同国民党争群众，同样是要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陈独秀很快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在“五一五”之后，共产党影响下的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明显受到压制，陈独秀即以中央名义写信给广东区委，称：“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

①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报告》，1926 年 7 月 21 日。

② 同上。

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要想发动民众运动，就必须要设法取消蒋介石的权力。[1]

这个时候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北伐战争，战争本身具有革命性质，共产党人不免有一种投鼠忌器的顾虑。鲍罗廷说：我们目前没有实力同蒋介石斗争，最好是等着看“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反对采取任何与蒋介石对抗，或引起蒋介石疑心的作法。而这时直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虽主张“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又害怕刺激蒋介石，强调“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对此，陈独秀的意见是必须让汪精卫回来，促使蒋汪合作，只要汪精卫回来，必可取得党权、政权，这时只要承诺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就能既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同时又便利工农运动的进行。[2] 实际上，不论陈独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蒋介石解释，“迎汪”的呼声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机。

“迎汪”热潮刚刚掀起，受到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顺利进展的刺激，两湖工农运动就迅猛开展起来了。维经斯基坐不住了，他坚持必须立即在南方和整个长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众

---

① 《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15页。

②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69~370，498，503~504页；《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26，340页。

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主张以此来阻止资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果实。陈独秀也致信各级党部，大声疾呼“党到农民中去！”① 但无论维经斯基，还是陈独秀，其实都很清楚：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不要说对中派或所谓新右派蒋介石，“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他们注意到，目前情况下“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是“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关键。

但农民运动已经起来，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难满足农民的愿望。因此，1926 年 11 月初，考虑到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陈独秀提出的，并且得到维经斯基和远东局通过的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还是包括了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武装农民和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给农民等项相当革命的内容。如何既维持统一战线，又能发展工农运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这时显然都有些手足无措。在向莫斯科提交上述草案的同时，维经斯基就不无遗憾地承认，以他们和中共中央的能力，目前难以应付这些令人迎接不暇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请求苏共中央能派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②

1926 年秋冬，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共产党人利用

---

①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 年 10 月 2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589 页；《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1926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636 页。

②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6 年 11 月 5 ~ 6 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 年 11 月 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611，617 ~ 620 页。《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 年 11 月 4 ~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436 ~ 437 页。

北伐军摧毁了占领区城乡各级政权的机会，成功地取得了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工农运动越发展，共产党的声势也越大。表面上看，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实际上，陈独秀看得明白，力量对比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相差甚远，未来政权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加国民党”，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夺取政权。[①] “三二〇”事变以后，陈独秀的这一认识日渐加强。从其此后的一些言论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已不再谈论中国革命从二月革命一步迈向十月革命的可能性了。从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他相信，最好的前途，是争取造成一种政治上几个革命阶级联盟，而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

他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究竟建立一个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资产阶级，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的革命民众政权呢，还是建立一个以反革命的大商人、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为主体，“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②] 把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归结为“二次革命论”，似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10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89，600~601页。

② 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0~171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陈独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乎不能成立。主张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建立革命民众政权，倒更符合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观点。

当然，陈独秀不如后来的毛泽东，他其实连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愿意看到。比较一下陈独秀在 1926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 9 月和 1927 年 1 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它们都谈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都明确肯定中国面临着两种出路，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并且都肯定反革命的出路不能走，说是会在经济上将造成托拉斯（译为道威斯）的资本主义之侵略，但对于革命的出路，1927 年 1 月的文章较前却有了明显的修改。陈在 1926 年肯定：那时可以“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在 1927 年 1 月的文章中，他却避而不提中国的资本主义，仅指出那时将“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①] 不难看出，陈独秀谈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时，由于没有毛泽东后来的那些理论分析做基础，因此显得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可以肯定，他在 1926 年虽然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更多地其实也只是在做逻辑推演而已，感情上却未必真的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②]

不愿意中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是这时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愿望。1926 年底，自年初以来一直担心共产党影响

---

① 陈独秀后一篇文章发表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似乎尚未传到中共中央。维经斯基在《向导》注明的出刊日期当天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特别说明，决议刚刚收到，尚未翻译成中文。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99 页。

② 陈独秀回忆称，1926 年底曾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出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贯彻革命目的，一是资产阶级领导背叛革命，建议强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遭到远东局的反对。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过大，反对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①，突然在它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十分激进的决议。斯大林也在共产国际发表演说，为中国革命迅速左转做鼓吹。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演讲的主旨，在于断言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阶段，走到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盟，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性阶段。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理所应当地"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为实现这一向非资本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废除过去不让共产党员过于突出的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广东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并"在革命军队中占据某些领导职位"。必须"利用国家机关，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归根到底必须做到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并实行土地国有"，以便使农民愈快愈彻底地卷入革命，同时要"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据说是"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权独裁制"。②

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 年 2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54 页。苏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曼努伊斯基在发言中明确讲：如果我们在中国现在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么在现时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触怒国民党。党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程度了呢？"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670～678 页；斯大林在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 年 11 月 30 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36～151 页。

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①]，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②] 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要求从一开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诸如土地国有（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他早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主张。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央决议中，事实上只是集中讨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明过去总“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

① 凯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领袖，20年代初领导土耳其民族运动得到过苏俄政府和土耳其共产党的帮助。革命刚一成功，即大举反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讨论过程中，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有走上土耳其的凯末尔道路的危险”。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30～231页。

② 前引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底前途》。

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①

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充满了革命激情，他们开始断言：“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但是，眼见 1927 年 3 月底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占领上海，陈独秀还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确告诫党内干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未必对革命不利。② 不论陈独秀这时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认识到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的关键在武装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合乎实际的看法。说他这时有意妥协，显然不是事实。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

---

① 根据 1927 年 3 月 6 日广东区委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持有某些保留态度。陈独秀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谈话，见前引《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 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18 ~ 22 页。

②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 年 3 月 19 日；《特委会记录》，1927 年 3 月 24 ~ 25 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 年 3 月 26 日。

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①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腕来暂时缓和矛盾。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陈独秀之所以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转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否认国共有冲突的准备，其目的不外是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

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清共"，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了。但是，共产国际的思维仍旧被它的革命理论和经验禁锢着。明明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和江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特字第72号）记录》，1927年4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167~169，172页。

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围在拥护南京政府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四川诸省区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四伏，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到处都是，处境日趋险恶，莫斯科却继续坚持进攻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维逻辑的陈独秀，最终站出来拒绝共产国际的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期间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倾投降”。而这个罪名最早也是共产国际给加上的。原因很简单，进入到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共产国际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最后，共产党失败，共产国际自然就让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的罪责。然而，共产党的失败真的是因为陈独秀的退却主张造成的吗？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歧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

还在1926年12月，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就不断出现手工业者、店员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国民革命赖以依存的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严重危机。陈独秀虽初遇这类问题，无经验及政策可循，却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并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他专门召集了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决定，主张“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1] 联想到20年后中共土改、进城，有政权、有军

① 中央特别会议：《政治报告决议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569～570页。

队，仍旧反反复复研究颁布各项政策法令，反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时注意引导和规范工农行为，可知陈独秀此时防左的动机未必有多少可以指责之地方。

当然，一方面想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真正进行约束。自共产国际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传到中国以后，工农运动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引起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它们已经直接刺激了大批军官和将领，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据陈独秀说，他4月上旬赶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当时汪精卫到武汉也不过才几天时间，可见当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已相当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问。他明确讲：“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比如在农村，就“不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①

陈独秀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仅武汉一地，两三个月内，有报道的罢工就发生了150余起，由于政府没有约束能力，工会权力极大，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过火”行动。再加上南京政府实施经济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萎缩，结果是企业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倒闭，失业工人猛增至10万以上。湖南农运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大搞贫农专政，

①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7年4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00～201页。

“法律由心，刑戮在口”，不仅随意捕杀，而且罚款、游街、吃大户、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禁养猪鸭、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军粮、抗捐抗税、捣毁税局厘局，一时间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结果，武汉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财政收入较占领前锐减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占领前的360万，锐减为70万。武汉政府这时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来同蒋介石对抗，但恰恰是湖南农运对其部队的军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汉政府欠饷，光是欠唐生智属下一个军的军饷，就在200万元以上①。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为继，就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都被武汉国民党人归罪于共产党了。

5月中旬，汪精卫找陈独秀谈话，尖锐地提出了群众跟谁走的问题。他断言，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才导致武汉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军队状况方面陷入到今天这种困难的地步。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陈独秀很清楚：“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者是和他们决裂。”但这个时候决裂，对共产党究竟更有利还是更不利呢？很明显，没有人做好了决裂的思想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考虑来考虑去，基本的态度还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就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

①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6月20日；《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6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07～208页。

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后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做过不少决定，几个月来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①

鲍罗廷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经验，四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党员发展虽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层党员本来就缺少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各行其是，普通党员鲜有训练，一些工会、农会又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更不要谈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它甚至对中共中央上报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赞成，电令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说是必须“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不得拖延”。②

注意到组建自己军队的重要性，这说明莫斯科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旗下的那些军队并非是可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什么“革命军队”。但是，建立自己几个师的军队，而不是在国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48~250页；前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陈独秀：《告全党同胞书》。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1927年5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52页。

民党的旗帜下偷天换日般地往部队里塞进一些士兵和军官，需要大量的金钱、武器和可靠的军官，同时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更需要武汉政府，特别是它的那些并不听话的将军们有足够的宽容度。所有这些条件，这个时候都不存在。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纸上谈兵。

5月21日，长沙驻军许克祥部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并通电斥责工农运动，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一发生，湖南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地主，都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27日，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因此迅速失去了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因为马日事变，新来不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团长罗易同鲍罗廷、陈独秀大起冲突。鲍罗廷、陈独秀坚持应该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农过火行为的名义前往长沙进行和平调解，平息军队的愤怒，重新控制湖南。罗易却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是“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去‘纠正’它们”。[1]

对此，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在5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因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军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

---

①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96页；《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5月24日，6月9日，罗伯特·诺思等编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第311~312页。

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而且还不限于此，还想平分一切。为此，我们现在需要让步，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是让步政策；不能说我们不赞成分配不动产、房屋等，是让步政策。“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我们所说的让步，是指目前情况下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这样做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有时间逐步“准备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明确讲，如果我们不准备明天就转入地下，就必须要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①

对于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的激烈争论，共产国际6月2日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4．“必须消除对不可靠将军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

① 《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23日。

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1]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进，坚持不得妨碍土地革命、建立新军、改组国民党中央等等，但它却肯定了工农运动存在"过火"的问题，赞成在争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让步政策，约束过火行为。问题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厢情愿地幻想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能够马上组织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个别真正的左派国民党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这不能不让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发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武装递解共产党员出境，并查封工会和农会的严重情况。面对这一更加危急的形势，不要说不准备破裂国共关系，就是有心破裂，要实现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要求也几乎没有可能。在讨论莫斯科来电的专门会议上，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对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国民党人曾经表示赞同解决土地问题的意向，但是，"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动（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也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他同时批评指示的另三项内容称："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

---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98～299页。

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总之，“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①

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解决土地问题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怀疑土地革命的方针，而是因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得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行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里受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②

陈独秀这时很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会同意退出国民党，一方面深知力量对比相差太远，因此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虽不断抱怨“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的道路了”，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情急之际，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袭击租界，占领银行和工厂，引起外国干涉，转移武汉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暂时稳定武汉统一战线

①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08～309页。

②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

的下下策。[1]

罗易对陈独秀的态度异常恼怒。他大概是共产国际里面第一个给陈独秀扣帽子的人了。他直言不讳地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断言陈"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扬言"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罗易同样给鲍罗廷也扣了许多顶帽子，因为他清楚鲍罗廷是陈独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无论他怎样强调现在的一切危机都是鲍罗廷造成的，他却不能提出开除鲍罗廷的想法。在无法取得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理解的情况下，更加书生气的罗易天真地把连同五月指示在内的共产国际的几份密电统统送给了汪精卫，孤注一掷地企图从他所信任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那里找到回天之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6 月 22 日，共产国际在得知了罗易这一愚不可及的行动之后，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2]

共产国际当然也不会满意陈独秀的态度。它在 6 月 20 日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复电当中，尖锐地批评："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3]

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和批评其实都毫无意义。政权和军队都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国际想到并提出组建自己的军队以对抗不可靠的将军，都已经是 5 月中和 6 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汉

---

① 前引《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 年 6 月 23 日。

②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 年 6 月 5 日；1927 年 6 月 17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 30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03，320～323，344 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 112 号（特字第 90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49 页。

国民党中央不反对（实际上不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要组建几个能作战的师，也绝对办不到。何况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质方面的援助，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建这么多的部队？没有自己军队的保护，指望国民党来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国民党中央改组，要汪精卫等人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唐生智手下的军官，纯粹是天方夜谭。

6月17日，武汉政府正式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21日，武汉方面所有人都指望并以为依赖的冯玉祥发表通电，要求遣送鲍罗廷回国并驱逐共产党人，宁汉合作，共同北伐。28日，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公开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旧相信可以拉住汪精卫。它一面决定给汪数百万卢布，以诱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电报谆谆告诫汪说，国民党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改组国民党，并从工人、农民中提拔新的领导人。①

6月26日，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等一同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已不胜其烦。其实，进入武汉政府时期以后，无论进攻，还是妥协，都未必能够找到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了，更何况这样不进不退，争论不休。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右的，一条是左的。右的一条是放弃一切，左的一条是反对一切。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都将垮台。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找到第四条道路？”而他最终表明的态度其实就是：只要我们还参加国民党，我们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汪精卫电》，1927年6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64，366页。

就不能不妥协，就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我们就应当退出国民党”。[1]

没有人赞成退出国民党，鲍罗廷甚至说，莫斯科认为退出国民政府都是冒险。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因为共产党毕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还开展着不少的工作。[2]

6月底，眼见武汉政权陷入危机，国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烧眉毛起来了。又是发电打气，又是大笔汇款，说是要通过武装工农，组建新军来“挽救革命”，为此“应该准备做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并且莫斯科仍旧寄希望于汪精卫，仍旧坚持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仍旧坚持要由国民党来领导革命。它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明确讲：必须“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3]

陈独秀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国民党可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从6月中旬起，他已经在全力部署恢复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对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进行反击，展开抗租运动。对敌军，他主张“大队来则避，小则与之打”，实在站不住的，赞成毛泽东的提议：A. 上山；B. 投入军队中去，认为“可以上山”，“当兵最好”。陈独秀很明白，为应付国共关系破裂非预做准备

---

①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

②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并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③ 莫斯科1927年6月29日已紧急汇出100万美元，并決定日内再汇50万美元，以帮助共产党组建军队，挽救危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1927年6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65，375～377页。

不可了。[1] 可是，陈独秀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7月5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上面国际责难，下面同志非难”，败迹已显，却不知出路何在，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了。区区一介书生，仅凭一腔热血，一肚子墨水，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激流险滩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他始终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变的思路。到了这个时候，他更是适应不了莫斯科的思维方式了。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2]

至此，陈独秀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地为之操劳了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负起了“右倾投降”的罪名。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在陈独秀辞职几天后就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又过几天，《真理报》进一步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的“右派领导人”，说他提出退出国民党就是“将整个革命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投降”。[3] 毫无疑问，俄国人当年的这种批判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这类政治批判的语言来讨论陈独秀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

① 《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6月17，22，23日，7月4日。

② 前引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③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阿斯特罗夫：《论中国革命》，《真理报》，1927年7月27日。

未必多余的话

与1927年共产党所遇到的危机比，共产党在江西时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共产党在偏僻的农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终于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愿望建工农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时间轰轰烈烈。但同时，其消灭一切富裕阶级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左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几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但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重新拾起了曾经被他们抛弃了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取得国民党的谅解和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再行国共合作，他们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并且承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共的基本方针，也从强调两个政权的生死决战，主张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到转而强调"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强调要争取政治领导而非组织领导；强调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毛泽东甚至重提党内合作建议，保证可以照当年蒋介石那个《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决不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党团和秘密支部，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①]很明显，共产党人做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与妥协，但他们换取了国共合作，同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新生。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的政策，只搞减租减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27年2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253，266页；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28年10月12～14日。

息，实行团结争取从贫农到地主的农村统一战线。结果，经过了8年时间，他们从极其弱小的一方，变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大党，有了足以同国民党抗衡的上百万军队。

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对共产党而言是失败的，第二次对共产党而言却是成功的。同样强弱悬殊，何以第一次失败，而第二次成功？

比较的结果，第二次的成功，有许多因素，比如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虽然仍旧容易引起磨擦和冲突，却因为划地为界，因为党员没有双重身份，不能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内身居高位，不能以秘密党团形式实际掌控国民党的党务、政务，不大容易使国民党人感受到太直接、太强烈的威胁，再加上有外敌强大的压力存在，形式上共产党始终还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大容易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全面破裂。但是，第二次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得宜。所谓政策得宜，就在于第二次合作期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共产党都没有实行如同第一次合作时的那些激进的革命措施，没有搞土地革命，从而保护了统一战线，争取了舆论，赢得了人心。

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因为在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干部的情况下，还实行比较温和的社会政策，而指责其“右倾”。同样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陈独秀主张暂时退却妥协，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为“右倾投降”？实际上，在共产党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又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经验、政策、干部等等因素都成问题，根本无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恐怕只能说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盲目的政策选择。共产党后来不是没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经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了，即是在国共关系再度破裂的情况下，在有强大军队的

护卫，又有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指导，并且是在自己占领区内等种种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进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规定也反反复复经过了两三年时间的修订。而当他们终于可以占据城市之后，他们也根本反对把农村的方式搬到城市里去，坚持维持城市现状暂时不变，不仅不触动小资产阶级，而且不触动资产阶级，坚持有政权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缓慢而温和的渐进式的变革。同时他们仍旧特别注意反对工人、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1] 何以陈独秀当年在既无军队，也无政权的情况下，就不能限制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不能主张暂时退却呢？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1927 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之下，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既没有多少神来之笔，也不曾惹下过滔天大祸，他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数情况下陈独秀的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比如，他几次提出的改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比如他较早地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问题；比如他自 1926 年底以来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后几个月坚持退却而不是进攻的策略思路。当然，由于理论、经验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陈独秀的一些主张未必很妥当，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而言，这种独立思考恰恰是推动中共领导人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209 页。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

这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它伤害了很多人，包括一些很有才华的、已经很有名气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几乎可以被视作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它更多的却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

时至今日，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为，它当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留学莫斯科的近千名中国学生的中间。我们今天重新提起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同样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沉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差不多都是来自于当年少数亲历人支离破碎、心态各异的回忆，因此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知识，始终也只能是道听途说、影影绰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今，当我们有机会进入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逐件查阅俄国人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文献档案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派别缘起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发生，严格说来并不是偶然的，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某种派别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搞清楚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经过，不了解或者忽略中国学生内部之间早期矛盾冲突和派别分

歧不谈，是不可能的。

中国学生中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最初的派别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旅莫支部的问题说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前，中国的留苏学生人数有限，最初都是由中共早期组织从国内派送来的，他们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里学习。至1922年12月，中共旅莫学生中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总共只有十一人。至次年4月中国旅欧的学生转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后，党员才增加到二十三人。4月28日，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正式组织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它从一开始就自行管理，独立于联共（布）党之外，直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第一任书记是由国内派去的中共党员罗亦农，至1925年1月罗奉调回国，王一飞接任，仅数月也奉调回国。自1925年6月起，旅莫支部改由从欧洲来的袁庆云、刘伯坚等人负责。

从现有的关于中共旅莫支部的各种资料看来，在1925年上半年以前，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和存在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问题。只是就这个旅莫支部的合法性问题上，俄国人和中共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据旅莫支部这时给中共中央的信说：“大学俄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决定解散中国学生中早已成立的组织，代之以依照俄国党的原则建立的新的组织。而我们认为，这种组织结构不利于今后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与相互的合作，我们请求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就此提出异议”。在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当即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旅莫支部的意见。信称：“我们不了解他们那里组织结构的详细情况，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要为学生开设特别的课程，要研究许多中国的特殊问题，新到的学生不懂俄语等），我们认为，中国学生需要有特殊的、本民族的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在俄共大学党支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在中国学

生中进行工作。"[1] 陈独秀的信发生了一些作用，旅莫支部被暂时保留下来了。但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由此看出一些端倪。

自 1925 年下半年起，情况开始有些不同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自 1924 年下半年到 1925 年上半年，国内来东方大学学习的党员干部日渐其多，而旅莫支部的负责人却换成了清一色的原旅欧支部的领导人，这些人大部分还是当年同赴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的四川同乡。紧接着，1925 年底苏联政府为中国革命开办的中山大学（即孙逸仙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同时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开始招收一年级班，总计约数百名学生陆续到达莫斯科，国内来的学生更占绝对多数，其中甚至有相当一批党龄较长、资历较深的中共党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指定带队来莫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但是，旅莫支部却没有考虑在新组建的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发挥这些来自国内的老干部的作用，而是指定同一时间由欧洲转来的原旅欧支部书记任卓宣[2] 担任中山大学旅莫支部的组建工作。这个任卓宣同样不依靠来自国内的干部，由他选定的中山大学首届旅莫支部的其他几名负责人，也是他此前在旅欧支部中的亲密同事。这种作法，不可避免地在人数较多的国内来的学生与人数较少的从欧洲转来的学生之间，造成了某种人为的隔阂。其二，1925 年底，旅莫支部由于相信大批国内来俄留学者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涣散、个人主义倾向严

① 《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4 年 10 月 28 日。

② 任卓宣，即叶青，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26 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 年底回国，1927 年底被国民党逮捕，后遭枪毙未死。伤愈后自首并开始以叶青为名从事反共宣传工作。1949 年随国民党去台湾。

重[①]，根据中共中央必须把留莫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有关指示，拟定了一个《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明确规定：

"打破家庭乡土民族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方国家的限制"。

"消灭感情的结合——感情上的结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我们的感情是党的利益上的"。

"除努力研究外还应注意俄文——绝对不要存先学俄文后研主义的错误观点"。

"始终要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

"有意见应发表——隐藏意见不发表即是站在团体以外反革命的动机"。

"每次写信不要忘了宣传——宣传是每个共产党人最小限度的义务"。

"对外态度和行动要十分谨慎——泄露团体的秘密即是敌人的侦探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不要处在个人主义和个人意志的地位——在团体生活意志之下，我们的生活和意志要绝对的团体化群众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意志之可言"。

"要严格的批评同志错误，要虚心接受同志的批

---

① 有关这时来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行的报告，可详见于1925年11月6、7、13、17、24、28日党部召集新到组长谈话会记录。在这些记录当中，分批率队前来的各队指导员、书记，根据袁庆云、刘伯坚等旅莫支部负责人的要求，对同队人员品行大多评价不高，较多的评语是"性躁"、"粗暴"、"个性强"、"有个人色彩"、"作事无条理"、"对团体认识不好"、"无政府主义色彩很重"等。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第98～100页（以下简写为530/2/1/98～100）。

评——怕批评或不接受批评和不批评同志都非共产党员的态度。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要以互相监督的关系（共产党员互相的关系即互相监督）批评同志监督同志——批评是达到培养我们成为铁一般的共产党党员的手段。"①

根据这种颇有些极端的“训练”计划，东大和中大的旅莫支部坚持在中共党员和团员学生中贯彻思想改造的原则，强化党内批评制度，甚至鼓励相互之间的揭发批判和打“小报告”。这种作法，更引起过去几乎从未过过集体生活的相当部分青年学生的不满。反对旅莫支部的情绪和斗争很快表面化，在几次支部大会上，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卢贻松等公开与任卓宣等言语冲撞，一些中国学生更是接二连三地致书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求对旅莫支部进行批评。② 终于，俄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很快出面将这个独异于它的领导之外的中共旅莫支部解散了。

确切地说，在大批国内学生来到莫斯科之后，由中共旅莫支部进行管理的时间并不长。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班一年级到1925年12月底才正式开学，大批中国学生也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接受中共旅莫支部的管理，而中共旅莫支部在四个月之后，就因学生反映强烈和它的指导方针与学校相左，被苏共中央明令解散，任卓宣、袁庆云、刘伯坚等也很快回国工作了。因此，一般中国学生与旅莫支部相处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但旅莫支部的解散，并没有使中国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就此消失。恰恰相反，由于按照苏共组织原则新组织起来，并隶属于苏共区党委的新的校总支部委员会，仍旧主要由

---

① 《旅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前引《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801~805页。

② 中心档案，530/1/21。

前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控制着，无论在东大，还是在中大，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仍没有根本解决。渐渐地，中国学生中间日益开始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人过去同情旅莫支部的作法，现在拥护新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反对过去的旅莫支部，现在同样对新的总支部委员会表示不满。只不过，在整个 1926 年乃至 1927 年春，中山大学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派别性质的意见分歧，但这种分歧尚未形成系统，派别界限也不十分明显。

根据规定，东大和中大新成立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均由俄国人来担任。在中大，新任总支部委员会书记为斯可尼柯夫。由于这个斯可尼柯夫来校不久即与教务处主任阿戈尔产生矛盾，从而很快都介入到中国学生原有的矛盾之中，并利用学生间的这种矛盾各自建立自己的系统，因而使中国学生中这种派别的界限日益明朗化。当然，这种派别的对立和斗争，这时只较多的存在于学生干部之间，即表现在支部委员会系统和教务处系统的学生干部之间。至于多数中国学生，他们既不满意支部委员会动辄上纲上线，继续保持旅莫支部的某些工作方法，又不满意教务处指导下的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特别是不满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把持翻译工作，领取高额工资的情况。因此在两派争论中，多数学生的立场并不十分清楚。甚至，他们中许多人最初还往往站在支部委员会一边，要求校方解除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翻译工作，收回发给他们的薪水。①

不过，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毕竟更具号召力。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从国内来的担任过高级职务、有过相当革命实践的学员越来越多，学生中不满总支部委员会掌握在毫无革

---

① 可以查阅的中大党团学生集体反映所谓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问题的信件有两件。即 1926 年 11 月 22 日《第一班党与团全体同志呈党部委员会书》和 1926 年 12 月 12 日《部分党团员联名致阿戈尔同志信》，信中批评俞任宣传部主席、董任翻译委员会主席，俄语不好，却利用他们的地位把持翻译工作，骗取高额薪水。见中心档案，530/2/23/163。

命实践经验的前旅欧支部成员手中的人也就越多，这些人本能地会站在反对旅莫支部所谓"余孽"的斗争的一边；另一方面，旅莫支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就为多数中国学生深恶痛绝，苏共中央解散旅莫支部，更使多数中国学生确信反对旅莫支部是正确的，因此新组成的支部委员会依旧保持着小团体倾向，而且或多或少地坚持旅莫支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众多学生继续保持一种抵触的、甚至是反抗的心理。特别是将近两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许多中国学生深恶痛绝的前中山大学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投降了国民党，这似乎更加证明旅莫支部不是好东西，因此反对旅莫支部更是迅速形成一种潮流。最后，就连共产国际也不得不加入到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中来了。在 1928 年 1 月，共产国际曾专门派库秋莫夫来中大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决议。该决议认定旅莫支部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 1）思想方面——旅莫支部是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产物，同时它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怀疑研究列宁主义的必要，以为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否认苏联的革命性，断定世界中心已移往中国，怀疑联邦共产党[①] 的指导作用；和否认联邦共产党有指导孙大中国共产党员的可能与权利，反对联邦共产党支部及学校校长"官僚式"的指导等等。）
>
> 2）组织方面——旅莫支部是企图组织一个与联邦共产党支部分离的独立的自治的组织。这个组织事实上是与联邦共产党支部并立的第二个党的支部。这

---

① 联邦共产党，即联共或称联共（布），亦即苏共。因为苏俄于 1923 年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联，故苏共渐改称为联共。

个第二个党的（旅莫支部的）内部组织系统，是建立在“小团体式”的组织原则上的。同时，旅莫支部是非常坚决的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工人化而争斗。

3）教育方面——旅莫支部对党员的教育是把个人私德的问题提在第一位，因此，对于政治斗争的问题便很少注意。

在道德观点上（如对于恋爱的观点），旅莫支部是建筑在禁欲与消极上面的。

4）整个的讲起来，旅莫支部的本身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流氓无产阶级、半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与左派士绅等）对党压迫的结果。这些分子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加入的。[1]

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最初只是乘机将旅莫支部解散，并不十分重视旅莫支部遗留的问题，到 1928 年 1 月不得不把旅莫支部问题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并上纲上线到如此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旅莫支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造成了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只是，到这个时候再来进行严厉判决，为时已晚。因为东大和中大内部部分中国学生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乃至派别之对立，早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矛盾激化

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之间的派别斗争逐渐激化，是在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由于“四·一二”事变恰好发生在整个俄国都在热烈欢呼中国革命迅猛发展，莫

① 中心档案，530/2/49/315～317。

斯科的中国学生正充满自豪地预言胜利之际，它给广大中国学生心理上所带来的打击，可以想象是极其沉重的。事情很清楚，蒋介石的叛变必将极大地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甚至给中国革命投下失败的阴影，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地解释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自然会在广大中国学生中间造成空前的思想混乱。多数学生不可避免地把失败的责任归结为中国党领导机关的指导错误，而联系到学校工作，许多学生很自然地把总支部委员会视为中国党错误领导的代言人。这种情况同学生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和派别倾向混合在一起，迅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派别之争。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以支部系统干部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为一方，以教务处系统干部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为一方，双方围绕着许多问题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6月24日晚，中山大学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改选校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因中大国民党执监委实际上全在总支部委员会控制之下，俞秀松、董亦湘等基于对总支部委员会国民党工作的不满，当场发难，批评国民党党部对于国内政治问题毫不注意，特别是宣传部的工作完全失败，致使一般党员对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毫无思想准备，思想陷于严重混乱。对于改选，俞秀松明确表示反对提名自己为国民党执行委员，并根据国民党组织原则拒绝会议组织者要求他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劝告。俞秀松等人的批评态度，自然立即遭到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不仅在大会上进行辩驳，而且于次日联名上书中大联共总支部委员会，强烈要求给予俞秀松等以纪律处分。内称：

1）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每个同志都知道是在我党指导下工作，……他们攻击宣传工作，无异于在群众中攻击我们的党……；

2）煽动的结果，使前届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完

全失掉了一般同志的信仰，……破坏了我们造成“左派”、吸收“左派”参加工作的策略；

3）俞秀松同志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系我们党的指派，……他反对他的工作，以国民党的“原则”来反对党的“命令”，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务望委员会加以严格的纠正！①

紧接着发生的有关选派学生回国及进入军事学校学习的问题，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关于选送学生进军事学校学习的问题，原本应该是由学校人事与党务两方面来决定。但这时原校长拉狄克因反对派问题被免职，副校长米夫前往中国尚未回来，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阿戈尔同时兼校长职务，一方面大权在握，一方面又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与学校负责党务的斯哥尼柯夫素来不和，平时工作上一向较多依靠俞秀松、周达文这些教务处领导下的学生干部，而俞秀松等在他与拉狄克等反对派的斗争中，也鼎力相助，态度鲜明，更加赢得他的信任。故在这一重要人事问题上，他不去与总支部委员会商量，而是首先与俞秀松、周达文进行讨论，然后再根据与俞秀松等讨论的结果自行修改补充，最终确定了选送名单。尽管此一名单最后确实是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像支部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傅钟、李俊哲等，也都在入选名单上。但因最初名单并未公布，风传甚多，斯哥尼柯夫立即利用此一机会大事煽动，批评阿戈尔宁肯相信俞秀松等普通学生，而不肯相信党的领导，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因此愤愤不平。这样，双方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终于，在国民党党员大会刚刚开完不久，两派间的斗争完全公开化了。

7月初，即在放假前召开的二年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

---

① 《傅钟等致孙大联共总支部委员会书》，1927年6月25日，中心档案，530/2/41/26。

一些学生就总支部委员会派（简称党委员会派）与教务处派之间的矛盾提出质问，要求二年级支部书记顾谷宜给予说明。顾谷宜就此“作了答复，并说出组织委员吴近与宣传员郭寿华之间的冲突。吴近是党委员会派的，后面有傅钟等，郭寿华是代表教务处派的，后面有顾谷宜、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等。他们各方面都提出理由。教务处（派）的理由是：党的指导能力薄弱，……党委会（派）的理由是：党应当指导教务处，而教务处脱离党委员会，无论做什么都不同党部商议。”[①] 鉴于冲突已经公开，两派人迅速开始在学生中间进行游说，宣传自己一方的观点。“党派说教务派把教务弄得一塌糊涂，教务派说党派办事无能力，各自宣传，各自煽动”，[②] 从学校一直争论到休养所，终于引起苏共区党委的重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连续争论了五天时间。其实，由于党委员会派和教务派两派干部公开争论，而多数学生既不满意于支部委员会，又不满意于学校的教学方式，因此一些人已经开始独树一帜，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大地左右着多数学生情绪的、举足轻重的所谓“第三派”。而在这个五天大会上，由于这一派人首先支持了支部委员会关于应当撤换教务处领导人及部分俄国教员的意见，因而很快促使苏共区委在这场争论中实际上站在了支部委员会一边，宣布阿戈尔以及另外三名俄国教员应当受到批评，并离开中山大学。尽管无论是与会的多数中国学生，还是苏共区委的代表，事实上都不曾把矛头指向教务处派的学生干部，可解除阿戈尔职务本身毕竟是对教务处派的一个沉重打击。

轻而易举地处罚了教务处领导人和俄国教员，党委员会一派人看起来确实是有些乐不可支，他们显然相信多数学生在支持自己。然而事实上，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误以为学生们

---

① 《88号同志发言》，1928年7月14日，中心档案，495/154/343/86～89。

② 《胡建三致新中央负责诸同志信》，1928年7月14日，中心档案，495/154/342/57～61。

反对学校教务处主任和部分俄国教员，就是反对俞秀松等人。其实，与党委员会一派人相比，教务处一派人通常与一般学生接触更多，也有人缘一些。更何况，大多数学生没有也不可能忘记总支部委员会同旅莫支部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不少人早就在谋划如何把总委员会一派搞下台了。因此，处罚教务处领导人的大会刚刚开完不过一个多星期，所谓第三派人立刻就与教务处一派联起手来。进而，在有苏共区委参加的改选总支部委员会的大会上，斗争的矛头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人意外地转向了党委员会派。据当事人胡建三事后不久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五天大会之后，群众很快看出党委员会派与旅莫支部有关系，因而又掀起了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他说：

当时反对旅莫支部的理由大概有下面几点：

1. 傅钟、李俊哲是旅莫支部的主要人马（他们现在列宁格勒）。

2. 傅钟是总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是四川人，而中山大学的重要工作，都是用四川人负担……。只有同乡关系，没有同志关系，这是旅莫支部的表现。

3. 张闻天、沈泽民与傅钟、李俊哲等联合，欺骗群众，在群众中宣传煽动，弄得中山大学满城风雨。[①]

说“群众”只在五天大会之后才迅速看出党委员会派与旅莫支部有关，转而又来反对党委员会派，多少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其实，下面两个当事人事后不久描述的情况可能更要接近事实一些。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所谓第三派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左右局势。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培吾，一位是苏美一；两位都是工人党员，当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据他们说，还在暑假去休养所之前，第三派就已

---

① 《胡建三致新中央负责诸同志信》。

经开始做他们这些中间派的工作了。把教务处派拉下马之后，他们立即就把矛头指向了党委员会派。王培吾讲述说：

> 一九二七年上学期，中大的党部实在是被一班旅莫支部的余孽所把持着，当时的党部委员是傅钟、李俊哲、左权等；而在教务处方面，也被最坏的分子……如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所把持，两方互争地盘，……这时大半的同志都对他们表示非常大的不满意。同时，恰恰不久前曾有一部分失意的委员想用着这个机会企图复辟，如刘汉清、黎本益、阎玉珍、焦有功、阎玉梅、何尚志、余秀女、林登岳、胡建三等。于是他们就四出煽动。一日，刘汉清、黎本益二人在俱乐部找我谈话，说现在有委员会派、教务处派，如何的坏，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们，将两派都打下台。（中略）总委员会开改选会了，在大会上有一百多人签名谈话。在批评过去工作及旅莫支部余毒的过程中，阎玉梅、刘汉清、焦有功、林登岳、千如常……等，都说由法国来的都是旅莫支部，还有由四川来的都是旅莫支部，理由是由于任卓宣、傅钟是由法国来的，是四川人。同时说凡是怀疑有第三派的人都是旅莫支部的走狗。①

苏美一的说法与王培吾略有不同。在他看来，第三派与教务处派在反对党委员会派问题上其实是站在一起的。他也提到：在放假前刘汉清就找过他，说了旅莫支部许多坏处，要他注意“现在我们中山大学还有旅莫支部哩！”而五天大会过后不几天，

① 《王培吾致中委信》，1928年7月14日，中心档案，495/154/342/50～53。

我就看见一件最奇怪的使我注意的事，就是被打倒的人忽然就同前几天骂他最利害的人交头接耳起来。……有很多同志，如林登岳、阎玉珍、焦有功、刘汉清等，到处宣传，……在这种形势之下，就指出了党部的傅钟、吴近是旅莫支部，张闻天、沈泽民也是旅莫支部。……在未开会前我又得到消息，听说群众领袖有个进攻的计划，第一步推主席团；第二步不让党委的人发言，特别是张闻天、沈泽民；第三步要将会场空气掀扬起来。结果他们（的目的）通通都实现了。①

应当指出，上述三人讲述这些事情的时间已经到了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关键时期，他们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三个人的立场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但他们所讲述的基本情况还是大体一致的。通过他们所讲述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党委员会派和教务处派斗争的结果，并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利益。教务处派首先受到压抑，紧接着党委员会派也倒了台。根据当时的记载，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一片混乱，前几天还得意扬扬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的人，在这次会议上被压得几乎抬不起头来，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激烈。又连着开了三天会，最后苏共区委的代表竟不得不宣布支持多数与会者对上届总支部委员会所做出的指责，宣布撤换前总支部委员会书记斯哥尼柯夫和其他两个从事党务工作的俄国人，并且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张闻天、沈泽民二人给予口头批评，只是他们最终顶住了与会者关于处罚二人的要求，建议将这个问题留给下届总支部委员去考虑。② 很明显，苏共区委对于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这场斗争的策略，实际上是“和稀泥”，双方各打

① 《88号同志发言》。

② 《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记录》，1927年8月，中心档案，530/2/47。

五十大板了事。

在中大出现的这场斗争，几乎很快地也同样在东大发生了。只不过这一次惊动了苏共中央。但很显然，苏共中央对东大中国学生矛盾斗争的处理方式与结果，与苏共区委对中大问题的处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东大中国学生中的矛盾，与中大如出一辙。虽然东大这时的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是 1925 年从国内来莫的武胡景，但支部委员会中的其他三人全都是前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即刘明俨、黄士嘉、宗锡钧。由于这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 1926 年下半年和 1927 年初从国内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曾在国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干部，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同样对东大支部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工作方法看不惯，加上学校的教学内容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生几乎得不到有关中国党的任何中文文件，而支部领导人及其属下的翻译们则对校方的作法一味袒护，因此支部委员会和部分学员之间不断发生意见分歧乃至矛盾冲突。特别是 1927 年 7 月中国革命失败前后有两百多中国党的干部前来东大参加军事班短训，他们刚刚进行入东大就发觉自己已经完全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脱节，不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翻译的态度和水平让人不能接受，而且支部委员会竟连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都不予提供，这种情况迅速激化了东大内部的矛盾。

1927 年十一月底，在一年一度的支部工作年度总结大会上，许多学生尖锐批评党务和教务方面的工作脱离实际，指责支部领导人员从未接触过中国的实际革命斗争，拿着高工资养尊处优，至今奉行的仍是旅莫支部那一套，可支部委员会却反过来批评部分学生中存在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自由主义倾向。总结大会的风波还未平息，12 月中国广州公社暴动失败，东大年轻学员马员生向学校墙报投稿，题目是《中国革命失败了，我们怎么办?》。在这篇短文中，马员生宣称：“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因在巴黎伦敦图书馆仔细研读，才完成马克

思主义。列宁在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也是在巴黎图书馆学习了一遍，因此才完成了列宁主义。所以我们应在国内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头颅的时候，硬着头皮读一点书。"[1] 支部委员会立即抓住此文大做文章，专门组织了一期墙报，公开称马员生的观点为"取消主义"。此举再度引发了中国学生之间的意见冲突，以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童庸生等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高级党代表等重要职务的一些学生迅速站出来，严厉批评支部委员会，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旅莫支部残余的口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介绍，由于"旅莫支部余毒的害处，中国的报纸不给看，秋白的小册子不给看，一切的文件材料不能供给同志们的需要"，加上学校"党内训练和教育工作不积极，弄得同志们愈读愈糊涂，学校教务更是形式的敷衍的（军事班尤甚），无论教材、讲师、翻译，在质量上和数量方面都不能满足一般需要，学校当局执迷不悟，反说是少数人故意煽动捣乱，不去根本改善，反而以消极的高压蒙蔽欺骗应付了事"，东大学生忍无可忍，纷纷上书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质询，而军事班百余学生更于1月中旬集体示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到第三国际请愿"，[2] 弄得共产国际东方部束手无策，不得不请当时正在共产国际总部的向忠发出面调解。经向忠发以中共中央名义劝说之后，示威学生方才退去，同时派出代表正式反映东大中国学生的三条要求，即（1）肃清旅莫支部；（2）改良教育方法，供给中文材料；（3）撤换一切翻译。[3]

结果，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到东方大学，调查处理此一事

---

① 《胡大才致中央信》，1928年7月14日，中心档案，495/154/342/54～56。

②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1928年7月14日，中心档案，495/154/343/94～98；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③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

件。因东方大学校方坚持不承认自己工作上的错误，致使委员会的决议未能实行。最后苏共中央解散了特别委员会，直接派人处理此事，其解决办法是："(一) 撤换教务主任，以后注意供给各项材料；(二) 党的路线并无所谓机会主义，但在工作上确有缺点和错误，因此党的负责人武胡景、黄士嘉、刘明俨、宗锡钧同志均须调开东大；(三) 群众领袖如鲁易、李侠公、马员生、朱代杰、童庸生五位同志亦犯有错误，因此也须调开东大。但结果只是在表面上执行了这桩决议，事实上则完全不似一种处罚，直然是一种奖励。鲁、李、童三同志都送在(往) 党的最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马、朱两同志亦升入列宁学院"。"至于党的负责同志四人，本决定离开东大便送回中国，但……他们还留在苏联"。[1]

节外生枝

▼

在 1927 年暑假之后，包括俞秀松、卢贻松、蒋经国在内的中大二年级学生大多已经毕业离开学校，除少部分留校工作或就读教员班、职员班外，多数学生都被分配到苏联各个军事学校里继续深造。毫无疑问，一些学生在中大期间形成的亲疏关系仍旧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的纽带，有些是建立在同乡关系的基础上的，有些则是同过去在中大时的派别倾向联在一起。显然，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为一些人提出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提供了口实。

"江浙同乡会"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看一看刚刚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的向忠发 1928 年 7 月 14 日向中共代表团所作的报告。

---

① 《胡大才致中央信》。

向忠发是1927年10月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前来俄国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当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来莫时组织部长李维汉还委托他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在参加过10月革命庆祝活动之后，他就前往中大、东大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得知在中国学生中间存在着派别问题。11月底，他特别“向此地一位中国同志问，此地中国同志中是不是有派别”。向忠发在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但据他说，正是这位“中国同志”明确肯定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告诉他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密（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①]

本来，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或者同学间经济方面的友情互助，并不值得特别大惊小怪，更不应当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事件来追查一番。但这件事同向忠发正在调查的派别问题联系在一起，又得了一个秘密组织的印象，自然立即引起向忠发的高度警觉。他当即告诉这位“中国同志”：“不要告诉别人，每个真（忠）实的党员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向忠发又“向东方部去说明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②] 但是，在开始时，此事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俄共方面的重视。

---

①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

②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

12月中旬，向忠发率李震瀛、江浩等前往德国、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委员会扩大会，之后转往苏联南高加索黑海疗养地休养。1928年1月中旬，向忠发得到共产国际要他和李震瀛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再回莫斯科，正好赶上处理东大学潮。这时，向忠发再度得到一个消息，说东大风潮刚一发生，列宁格勒的中国学生竟有人“开会祝胜”。据报，开会之人，恰为此前传闻的“江浙同乡会”中之人，为首者即为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而后得到的莫斯科炮校朱茂榛1月23日给蒋经国的信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信称：

> 东大风潮扩大，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共产国际因恐慌都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在此运动中，军事班只有曾肇时一人指导，政治班内指导人以后都软化动摇了！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不要再闹，他们真正就不作声。真是笑话！①

从得知“江浙同乡会”的消息至此已经将近两个月，就连向忠发自己也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但列宁格勒所发生的这一情况再度引起向忠发高度重视。向忠发后来说明了他因此而采取的行动过程。他说：

> 当着这个风潮起时，列宁格勒有同志开会祝胜，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于是（我）找米夫秘密的谈话，他说我远（原）不大清楚，但你们既然提出了，当然要注意。乃决定检查他们的信件。又找军事学校由党部中国同志负责去搜集材料。

① 《朱茂榛致蒋经国信》，1928年1月23日，中心档案，495/154/341。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与诸多回忆和著作中所说的不同，第一，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并非有人蓄意“制造”，关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多半久已有之，但在向忠发调查中国学生派别情况之前，此事仅仅是传闻而已。① 第二，把有关“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极力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实为向忠发，既非米夫，也非陈绍禹（即王明）。不仅如此，既然米夫迟至1928年1月底尚不了解有关“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可知作为米夫“亲信”的陈绍禹，也并非那个向向忠发介绍或者“制造”此传闻的“中国同志”。事实上，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叫郑家康，周恩来后来曾提到过他的名字，并指出他当时正在苏联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工作，而他的妻子安娥正好又是中大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最先了解这些情况，并把问题讲得那样严重。

说到陈绍禹，后来确是这一“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推波助澜者。不过，在这件事尚未爆棚之前，他的态度却未必十分明朗。这是因为，陈绍禹自入中大以来，就因迅速掌握俄文而与学校里的苏联教员打得火热，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对反对注重学习理论和俄文的旅莫支部抱以反感。相比之下，他同与苏联教员关系较好的教务处派的干部反而更为接近。在中大党部派与教务派斗争最为激烈之际，陈绍禹恰好随米夫去了中国，暑假开始之后才回来。等二人来到休养所的时候，阿戈尔已经被宣布免职，教务处派刚刚被压了下去，党委员会派正在势头上，陈绍禹不加选择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酝酿中的反对党委

---

① 关于在中国学生中有一个以储金互助会为基础的小组织的风言风语，早在向忠发到莫斯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见《屈武致中法（发）、兆征、晨田（震瀛）、玉章、叶挺诸同志并转代表团全体同志》，1928年3月28日，中心档案，495/154/342/24－29。

员会派的行动。据胡建三说："在反对旅莫支部的时候，即反对傅钟、张闻天等的时候，米夫同陈绍禹两同志都从中国回来，陈绍禹同志也是当时反对傅钟、张闻天等最力的一个"。[1]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务处派的合力推举下，当上了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可见第三派和教务处派对他都颇为信任。难怪后来当上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原道明确说：当教务处派与党委员会派较量失利后，"即组织了第三派，与另一派加名以旅莫支部"，要处罚党委员会派之首领，"当时第三派（势）力大"，"陈绍禹也是其中首领之一"。[2]

当然，陈绍禹之加入反对支部委员会的行列，与教务处派或刘汉清等人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其实结合得并不紧密，陈绍禹未必真的可以说是什么第三派的首领，只不过他作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和能够陪校长米夫出访的干部，地位特殊一些罢了。从王培吾下面这段说明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况。王培吾说：当时休养所里到处都有人在游说反对旅莫支部，陈绍禹也很活跃。有一日陈绍禹曾找他谈话，问他对反对党委员会派及教务处派的意见，他说：这两派人我个人是绝对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反对这两派的同时，一定要提防第三派得渔人之利。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绍禹听了这话，就大骂我，说我顾忌，不应该怀疑第三派起作用等"，搞得王培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王解释说刘汉清、黎本益等曾如何如何鼓动他和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将两派统统打倒之后，"陈绍禹才相信"。[3] 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陈绍禹当时对反对党委员会派态度相当坚决，但与第三派的刘汉清等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同时由于他多少有点心怀不轨，又生怕别人怀疑

---

① 《胡建三致新中央负责诸同志信》。

② 《代表团与中大支委的谈话》，1928 年 7 月 25 日，中心档案，495/154/342/78 ~ 90。

③ 《王培吾致中委信》。

自己另有目的，因而显得有些紧张，只是当他得知对方怀疑的不是他，而是与他并非一路的刘汉清等人时，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绍禹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头几天确实与反对党委员会派配合默契，弄得党委员会一派人几乎没有招架的机会。"结果，区委派来的代表认为他们（傅钟、张闻天等）都有错误，犯错误的俄国同志撤职，中国同志交下届委员会处理"。[1] 但在联共（布）区委发话之后，陈绍禹和反对派的态度就开始明显地出现分歧了。联共（布）区委的代表宣传上述决定后，会场上一片反对之声，多数发言认为对总支部委员会的人，特别是对张闻天、沈泽民"处罚很轻"，有些人甚至大呼小叫，主张"不应当用教育的方法，而应当枪毙，而应当开除，而应当充军西伯利亚"。"这时在主席团方面，陈绍禹已是尽力拥护区委决议了"。于是，有人"开始向陈绍禹进攻，说陈绍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众"。[2] 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时，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绍禹却未能人选。

暑期刚刚结束，俞秀松等参加讨论的中大二年级学生选派军校学习名单正式公布，共有七十余名学生被派往各军校。结果，俞秀松等人迅速引起中大众多学生的好感。尽管俞秀松等随后均离开中大，前往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列宁学院深造，但其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之势。这种情况自然使中大众多在校学生对原教务处派表示同情，而对继续留在学校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原党委员会一派的代表人物颇有成见，继续以"旅莫支部余孽"视之。陈绍禹因转而袒护张、沈二人，处境也颇显尴尬。很快，新的总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何尚志再度提议处罚张闻天、沈泽民，以便清算旅莫支部的余毒。但经过几次大小会议的讨论，张、沈二人分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加上

---

① 《胡建三致新中央负责诸同志信》。

② 《88号同志发言》。

米夫出面干预，终于否决了处罚的意见。不料，当随后共产国际派库秋莫夫前来调查处理有关旅莫支部的问题时，张、沈二人竟利用墙报和总结大会重提暑期派别之争，宣称自己和旅莫支部毫不沾边，而“反对旅莫支部的人，自己就是代表旅莫支部的余毒”。这样一来，争论又起，大会小会十来次，你说我是旅莫支部，我说你是旅莫支部，陈绍禹再度偏向张、沈一边，反对组织处理，又一次引起众多学生的不满，连陈绍禹一并斥为旅莫支部“余毒”。这一次一直吵到1928年2月，再由米夫出面，一面批评张、沈二人重兴意气之争，一面向党员们担保张、沈、陈都不是旅莫支部，禁止再行争论。照胡建三的说法就是：“指出张、沈的错误，同时将群众骂一顿了事”。[①]根据米夫意见通过的总支部委员会的决议称：

一、本委员会认为张、沈二同志在此次讨论关于旅莫支部报告的时期中做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使关于问题原则上的讨论，降低到了个人意气争论的水平线。……

二、本委员会在本年一月×日委员会会议上曾经因张、沈二同志在委员会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故认为可以不采取某种处罚。但在最近党员大会上，张、沈二同志的谈话，尤其是张同志的谈话，证明他们不诚恳，并不是完满地把自己错误的问题提出来，反而利用了说话的机会，以继续攻击他人，以在大会上辨护自己，因此破坏了本委员会及本支部积极分子会议的决议案。

三、张、沈二同志既犯了上述不可许可的行为，故委员会决定对他们下以警告，且决定取消其一切党

---

① 《胡建三致新中央负责诸同志信》。

的负责工作（即副指导员与情报编辑的工作）。

四、同时，委员会要解释参加讨论的许多同志们，对张、沈二同志不要用些不适当的名词，如“反对派”、“旅莫支部的人”等等。……本委员会认为，在本校没有形成“旅莫支部”的组织存在，故向本支部一切党员提议，以后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1]

确切地说，这时中大多数学生并不在意米夫的意见怎样，也不在意总支部委员会通过了什么样的决议，其反对肃清旅莫支部“余毒”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问题在于，在为张闻天、沈泽民问题作结论的总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米夫已经公开宣布，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就是“江浙同乡会”。他严厉斥责中大学生过分注重意气之争，告诫他们：现在不要再揪住张、沈的问题不放，“张、沈不是危险物，而危险物是江浙同乡会，它是破坏党的”。[2] 此论一出，像是抛下一颗炸弹，顿时把中大学生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学生们的一切注意力都转到这个“江浙同乡会”问题上来了。

事出有因

向忠发要求米夫秘密调查“江浙同乡会”问题，是在1928年1月底。将近一个月后，米夫公开宣布“江浙同乡会”事件成立，这说明，米夫已经多少掌握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从哪里来的呢？从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米夫这时已经做了中大校长，并且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

---

① 《孙大联共支部关于张闻天、沈泽民二同志错误的决议》，1928年2月，中心档案，530/2/49/319~321。

② 《代表团与中大支委的谈话》。

的副部长。最初，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要求他出面调查“江浙同乡会”时，他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他仍旧通知了格伯乌，请其协助秘密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并检查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没想到，他很快就得到消息：格伯乌已经搜集到若干证据。证据之一，为秘密侦察到的卢贻松 1927 年 9 月致美（黄仲美）、师（张师）、山（刘移山）、山（甘青山）、景（郭景纯）、策（周策）、尤（尤赤）、寿（刘仁寿）、榛（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

> 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时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因此地经济部今晨来问我们 8 月份的零用钱领了没有，这是一笔小小的例外。近接款后，李翔梧等回莫时你们或者可以收到我们的会费。①

证据之二，同样为秘密侦察到的刘宜山、张师、周策等人 9 月 17 日给胡世杰、刘仁寿、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

> 他们的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到分文，实在焦灼得很。②

格伯乌负责此项调查的米利斯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

---

① 《卢贻松致美、师、山、山、景、策、尤、寿、榛信》，1927 年 9 月，中心档案，495/154/343/51。

② 《刘宜山、张师、周策等致胡世杰、刘仁寿、朱茂榛等信》，1927 年 9 月 17 日，中心档案，495/154/343/54。

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这时，恰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面对这样一些证据，米夫不能不相信确有其事，只是最初他还不能断定，这个小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性质。因此，他和新来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别尔曼商量后，于2月26日召开了中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动员党员干部协助查清此一组织的情况，并不顾格伯乌的反对，宣布成立一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决定先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查此事。

要在矛盾重重的中大学生中间搞什么检举揭发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与学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搅在一起。于是，追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刚一开始，学生之间就你攻我，我攻你，你揭发我，我指责你，整个中大搞得像开了锅似的，人人不得安宁。前一时期因一味迎合苏联上级机关的意见而受到学生指责的陈绍禹等人，这时变得异常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动员揭发。陈甚至公开在墙报上撰稿，第一个上纲上线，指责“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不满，五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董亦湘当众批评陈绍禹不负责任，强调“江浙同乡会”有无尚未调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双方因此争论不休，你说我是“旅莫支部余孽”，我说你是“第二条路线”。不几天，就有人写信揭发董亦湘本身就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结果，米夫和别尔曼又再度出面召集党员大会，宣布“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中大就是其大本营，它的正式成员有六十多人。“此种反党的危险组织，有它的党纲，有它的组织—中央与支部—此种组织必须打破它”。因此，关于它的性质也没有必要进行争论，它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性质如此，学校组织调查实属不当，调查委员会即日解散，一切工作交格伯乌解决。随后，向忠发又

赶到中大，在学生大会上明确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了，两周后即可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反革命的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还有会费，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这件事再不许有什么怀疑了，“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①

米夫和向忠发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根据格伯乌的调查结果。3 月 24 日，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一事件的米利斯就将近两个月的调查提出了一个书面的结论。内称，“江浙同乡会”查实者至少有二十二个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文和蒋经国等。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等，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中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并称它已经与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国民党右派发生了关系。按照米利斯的建议，这二十二个人（二十个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在海参崴）都应当马上逮捕。② 但此一结论报到格伯乌总部后，未获得批准，主张继续调查进而报苏共中央提请解决。

一周之后，当米夫专门请米利斯前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和中共代表团报告调查结果时，米利斯的报告又有变化。他宣布，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至少有 121 至 130 个中国学生参与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而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也已经有 130 份之多。而当向忠发索要这些人员的名单时，米利斯却一口回绝了，声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多数人只是教育问题。最后，米利斯只提供了据说是证据确凿的八个首要份子的名单。这就是：

---

①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胡建三致新中央负责诸同志信》。

② 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报告大纲》，1928 年 8 月 10 日，中心档案，495/154/343/24～34。

1. 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2. 朱务善
3. 朱德计（代杰）
4. 六一（卢贻）松
5. 刘仁寿
6. 黄中（仲）美
7. 周辄（策）
8. 陈其可（启科）

“如何蒋经国做首领呢?”根据向忠发后来的解释就是：“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由其母亲名义供给了七次之多”。①

显而易见，与格伯乌的前一名单相比，这个名单里缺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文两人。事实上，格伯乌所有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都是根据一个关于“储金互助会”或“助金互助会”的传言，结合以中大教务处派的成员演绎推理而来的。可是，这个“互助会”，俞秀松和周达文自始至终就没有沾过边。并且，当俞秀松得知卢贻松、蒋经国等在与莫斯科同学的来往信件中拿此事开玩笑，引起原中大学生的风言风语后，还立即写信叮嘱蒋经国、卢贻松：“以后写信给中大要谨慎，不然要引起误会”。② 因此，刚刚从中山大学传来他们二人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有关系的消息之后，他们二人就理直气壮地上书米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进行申辩，否认指责，并明确认为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函称：

近来听说此间中国同志中有一种“互助会”或“江浙同乡

---

①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

② 转见《中共代表团书记周恩来致联共中央政治局》，1928 年 8 月 15 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12 ~ 114。

会”的组织，并传说我们两人间接或直接与此组织发生关系云云。为此，我们不得不郑重声明如下：

> 第一，我们对于此组织的详情不甚清楚，无从下确切的断语，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党内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小组织。……
>
> 第二，我们两人郑重声明，我们绝对没有和小组织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孙大一部分负责同志没有对我们两人的事情调查清楚，任同志们公然在党的群众中宣传，我们认为完全不对的。……
>
> 第三，我们认为此问题……党部应审慎查调办理，不能根据一部分少数同志的私见，……他们以私人为出发点，有意的蒙蔽党部，造出种种谣言，诬害同志的，……此风一长，则党的前途将不堪设想了。①

但是，究竟有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储金互助会”呢？看起来，这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自米夫、向忠发在中大放炮点火之后，不仅中大内部而且在几乎所有前中大同志中都迅速掀起了一场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江浙同乡会”的运动。陈绍禹、沈泽民、李竹声等人迅速成为追查运动的骨干，上窜下跳，惟恐天下不乱。经他们加油添醋地到处散布消息之后，许多多少沾过“储金互助会”的边的人，很快就沉不住气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出来解释或交待事情的经过。从这些解释或交待的情况可以看出，“储金互助会”确有其影子。

3月，因中大风传陆军大学的屈武同“江浙同乡会”有

---

① 《丘古诺夫致米夫同志》，1928年3月7日；《声明书》1928年3月9日，中心档案，495/154/342/8，22～23。

关，屈武曾专门写信给向忠发、苏兆征等，解释自己与“储金互助会”的关系。其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称：

> 储金互助会的来源一当我们去年暑假中野营军事训练完结回来，回到炮兵学校共处一室，军委当日就把派往各军事学校的名单公布出来，共分政治军事大学、陆大、飞机，及步、炮、工六校。但步、炮、工三校就当时所知，生活方面非常苦，每月听说只发一两个卢布，并且饭也不大好。……当随便聊天的时候，前两校的同志（我也在内）提议假若这两校的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当时就有那个同志（大约是炮兵学校的）说，好罢，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来，我们去吃饭好了。并且同时陆大和军政大学两校的全体同学（共十人）同意愿将尚未领得之8月份薪水……完全先给炮兵学校全体同学去吃中国饭（但此薪水后来并未领下）。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后来因为他们生活改善了（除吃中国饭外，每月当发给三十个卢布），所以后来谁也再未曾提起以前的话。我回想当时的谈话，实因生活的不平，同志间亲善关系自然的表现，丝毫莫含有其他的作用。①

同样，在莫斯科的步、炮两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郭景纯、周策、刘仁寿等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上书中共代表团并转中大调查委员会，说明的确是他们提议“助金互助”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听说自己今后每月只有二个半卢布左右的生活费，

---

① 《屈武致中法、兆征、晨因、玉章、叶挺诸同志并转代表团全体同志》。

自然就想到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和飞机学校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因为据说他们的月薪分别在一百卢布和六十卢布以上。

> 于是就有同志在炮兵学校及别处，公开的谈说这个提高生活的好方法。……并有同志在玩笑中称此为“助金委员会”，大家都希望他们（陆大等校）发钱以后能够请我们吃几次中国饭。所以当时我们彼此的信札中多是些“敲竹杠”的玩笑话。后来陆大同志……因为要做军服与买各种日常用具，而没有多剩余的钱可以请我们吃东西。列宁城军事政治大学同志领了两个月的薪水，而且有剩余的钱，可以给我们用的，因此那时卢贻松和蒋经国就托李翔梧同志转给朱茂榛四十个卢布……拿去吃中国饭。又经过几天，军事委员会已决定每人月给卢布三十个，于是我们的生活程度不仅没有减低，而且稍较前提高。当时我们致信各校，宣告“我们的生活独立”。……这些开玩笑的和敲竹杠的话从此消失。①

那么，什么会员、章程、会费之类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显然，所有这些名词，最早都是在一向爱开玩笑的卢贻松给莫斯科军校同学的信中发现的。因此，看看卢贻松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必要的。这时，卢贻松也从列宁格勒写信给中共代表团，说明了这件事的原委。他在讲述了当时在炮校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提出成立一个储蓄会，叫列宁格勒同志寄钱来之后，写道：

---

① 《胡世杰、朱茂榛、郭景纯、周策、刘仁寿致调查委员会诸同志》，1928年3月15日，中心档案，495/154/342/36～40。

> 当时我曾说，只要我们领得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日后，我来到列城，他们就写讯来要价（饭）钱，在我复讯时我记得就写上了会费不久寄来这类的玩笑话。正因为过去在同志中说惯了这类的无聊的玩笑话，亦未曾碰过钉子，因为写得来几个字，提起笔来觉得无多话可说，亦就弄上点花色，因此而发生这样大的误会，（这）自然是下次提笔时一大教训。①

在中山大学也好，东方大学也好，中国学生之间的矛盾磨擦不可谓不多，派别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也不可谓不激烈，但争来斗去，充其量不过是谁对谁错，谁台上谁台下，还从来没有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同学之间，因为几句玩笑话，竟可能转瞬之间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论那些明里暗里被指为"反革命"的学生们怎样解释和争辩，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

查无实据

1928年4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开会，再度听取格伯乌代表说明调查取证情况。格伯乌代表明确提出一个十二人的名单，包括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肯定这十二名军校学生都是"江浙同乡会"的骨干。紧接着，在第二次会议上，联席会议正式决定：

---

① 《卢贴松致中共代表团诸同志》，1928年3月，中心档案，495/154/343/5~6。

(1) 开除蒋经国等十二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4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2) 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联名写信给列宁学院党部，请其对俞秀松、周达明（文）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①

会议通过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议。值得注意的是，该项决议竟出自陈绍禹的手笔。这是因为，这一时期，陈绍禹正做向忠发的俄文翻译，不仅陪同向忠发出席各种重要会议，担任翻译工作，而且事实上也在解决“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扮演着参谋和秘书的角色。决议宣称：

(一) 承认在苏联有一反党的小组织存在，其名称为联合会（互助会）。其分子为军校与大学学生中的青年团同志和党员。该组织虽带有表面上工会的名义，但是毫无疑义的含有政治上的性质。

(二) 认为参加该组织的分子未表现很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倾向于拥护中共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指导。……

(三) 该组织现已吸收那些最动摇的少共团员和党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和联共问题为反对派的分子）加入其内，甚至不拒绝与右派国民党员发生直接的关系。

(四) 认为用党的纯粹教育性质的方法，对于该组织已用尽了。这些同志未曾利用党部给他们的可

① 《中共代表团书记周恩来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能，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停止活动，解散组织，……因此本会认为必须经过相当的机关，采用组织上与法律上的办法，以达肃清此组织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志起草一详细信致中国学生所在学校的党部，该信中应说明该组织的历史和行动，及其有害的性质。……同时委任米夫同志与相当机关发生关系，采取相当办法以肃清该组织。

（六）党部根据此信除相当机关的组织办法以外，应依自身方面的路线采取办法以肃清该联合会在学生中的影响，且对各个参加者为党纪上的处罚。①

这是自“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以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苏联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的第一次处理意见和为事件定性的决议。由于会议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秘密的反党性质的小组织，因此它所采取的处置方法，不仅仅是党纪上的，而且还准备动用专政机关给以制裁。此种态度之严厉，可以想象。

但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米夫就感觉到这次会议的决议不尽成熟。他亲自调阅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却发现在众多格伯乌认为确凿的证据中，没有一件可以直接证明这个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与它的性质的。他随后又专门就此询问了米利斯，问他是否找到了“江浙同乡会”的章程或者其他文件？米利斯告诉他说：“炮兵学生孙发立及王长熙看见朱茂榛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同乡会的‘党纲’（互助会的章程），内中有很多条文。”而且，另外也有中大同学看到同乡会的会员轮流抄写一个同乡会的“工作计划”，米利斯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同乡会的章程或文件。根据格伯乌提供的线索，米夫亲自布置调查了此事。不想，

① 《关于“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决议》，1928年4月，中心档案，495/154/343/75～76。

"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这就可以破获一切'同乡会'的罪人。米夫将这件东西拿给翻译一看，原来是一九二六年党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1] 这件事让米夫深感困惑。结果，"东方部未通知（中共）代表团就停止了这一决定"，把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事情暂时放到一边去了。[2]

火是向忠发和米夫放的，如今米夫忽然住了手，这不能不让向忠发大惑不解。向忠发因此再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要求米夫和东方部迅速实行决议，却得不到米夫的任何答复。迫不得已，中共代表团正式致书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详细说明"江浙同乡会"的反党性质和严重危害，要求立即解决此一问题。函称：

> 1）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之反党的特性，不仅因为它的一切行动绝对秘密，而且因为：
>
> A）它的成分是：反对派、拥护中共机会主义者的人、有各种形式的取消派和先锋主义（倾向）的人，并且与党外的反共产党成分有关系；
>
> B）它的目的：口头上要推翻中共现在的领导，事实上从内部和外部破坏和消灭共产党；
>
> C）它的形成时期是：中共8月会议以后，即中共机会主义者正脱离党之时；
>
> D）它的工作内容是：在苏联各共产大学及军事学校分裂共产党员的队伍，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中共作种种造谣与诽谤，帮助和庆祝东大军事班向共产国际的示威行动，等

---

① 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报告大纲》。

② 《中共代表团书记周恩来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等。……

因此，这种小组织绝对与普通在吾党内因发生某种争论而形成的小组织完全不同。

2）中国现时斗争之剧烈与残酷，不仅在反革命与革命之间，党内斗争也表现特殊激烈的形式。如广东同志反对机会主义者而采取恐怖手段，开除一切知识分子；及北方同志被害事件，……等等。这个小组织的行动早已超出党的范围以外了。试举数例为证：

A）它集中一切力量和精神在军事学校工作，欲依靠军事力量为基础而采取所谓“谁有力量些，谁即胜利”的手段；

B）它经过自己的东大全权代表曾昭示领导军事班反国际示威，而它的会员却在列宁格勒开庆祝会；

C）它的会员刘宜山、黄仲美在海参崴工作，即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机关（国家政治局）及党的机关，驱逐和压迫非它们组织内和不同意它的宣传和煽动的同志。

毫无疑义的，如果这组织到中国去活动，则其危害于中国党更甚百倍，或者成为中共的敌人。所以绝不能如有些同志的意见，以为它的行动是未超出党的范围以外。

3）无论何时我们未曾设想过（现在也还未如此设想）这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已成为共产党不可容纳的仇敌，……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各个人单独行动对党的危害总比他们还保存着整个的党内小组织来活动为小。

4）因此，我们提议用下列方法解散这个反党的组织：

A）对于这组织的首领及最积极的活动分子，不

仅采取党的组织路线，并且根据国家政治局现有的材料，对各个人分别给以党以外的路线的办法；

B）对于这组织的一般会员，按其对于这组织的关系如何等而采取党内组织的和教育的方法。

5）我们提议尽可能的赶快解决这个问题。①

比较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这时再度提出的提议，可以看出，中共代表团对这个“江浙同乡会”的性质的估计，正在进一步升温。根据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代表团渐渐认定：这个“江浙同乡会”“在孙大占多数，东大少些，开会在炮兵学校占多些，步兵学校少些。”“他们也有中央，也有支部，大本营在中山大学，中央在另外地方，孙大是总交通的地方”。② 为此，向忠发一再要求米夫彻查中大学生派别的历史及其现在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深入获取该组织的核心机密。同时，向忠发也几次指令陈绍禹等务必以中大为突破口，查出更可靠的材料，以便促使米夫迅速解决问题。然而，自6月以后，因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甚至中大清查活动的主要骨干，全部集中精力于“六大”的工作，进一步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结果，正当中共“六大”召开之际，米夫忽然在中大宣布：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在中大已经结束了！

这件事首先发生在6月26日，在中大党务报告会上，米夫突然提到“江浙同乡会”问题，称清查“江浙同乡会”并不

---

① 《中共代表团致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解决苏联境内中国党员团员中的反党小组织问题的提议》，1928年5月，中心档案，495/154/343/59~64。

② 向忠发：《江浙同乡会》。

是学校党支部的责任，它是共产国际的事情，而共产国际东方部已经就此得出了结论，即：

1）江浙同乡会是一小组织，是有危险的——它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在将来中国党内增加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破坏这种小组织；
2）同乡会的领袖是必须要加以组织上的处罚的；
3）被影响的同志，我们应当加以解释，不加以处罚。

米夫声称："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已经解散了，本校没有他们的会员"，不能说中大是江浙同乡会的大本营，甚至"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不能说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因此我们学校里用不着很急的解决这个问题。"他明确要求中国学生要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迅速停止互相猜疑和揭发检举，务必着手改善同志关系。[1]

米夫的发言当即引起一些学生的异议。有人大声喊道："你是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这些反党分子不再追查了？"米夫当场答道："江浙同乡会问题已解决了，这个组织已不存在了，他们的首领仅仅在军事学校和列宁学院，可是已经开除了。在中大是没有首领，没有组织，不过有少数同志曾受了一点影响，所以对于中大这部分同志是仅仅采取教育方法，不再用处罚"。对于有人提出"忠发同志曾说江浙同乡会的大本营在中大，难道忠发同志说谎吗？"这一问题，米夫竟回答说："向同志的话我没有听到，我想他不是这样说的，他一定是说江浙同乡会的首领是中大过去的学生。至于中大，是

① 《米夫在党务报告会上的发言》，1928年6月26日，中心档案，530/2163/86～87。

没有它的首领，非它的大本营”。[1]

米夫本来就对是否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格伯乌的材料一度使他多少相信确有其事，但他仍然注意到，没有一件材料能够证实这个组织是否仍然存在，和它除了经济互助以外是否真的具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在几个月揭发检举仍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米夫已开始相信，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即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小组织，也无法给它戴上反党或反革命的帽子，否则必然要在长期存在派别纷争的中国学生中间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为此，东方部通过了上述决议，并决定迅速平息由于此一事件在中国学生中间引起的政治风波。作为中大校长，米夫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写道：目前的清查已经“破坏了许多同志的关系及相互的信仰，因此发生了许多相互猜忌及无根据的谣言，要求枪毙‘互助会’的参加者，等等。”[2]

人人自危

清查“江浙同乡会”，究竟在中国学生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很容易想象的。开始的时候，一些受嫌疑的学生还曾极力抗争，像最初被怀疑的军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周策等人，就曾多次写信要求上级领导注意“野心家”的阴谋。他们宣称：

> 我们希望党能于最近发现在政治上及党组织上有

---

① 《张国庶致韶玉并转中共代表苏、向诸亲爱的同志》，1928 年 7 月 8 日，中心档案，495/154/342/45～48。

② 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

危险性的“助金互助会”以及其他政治组织的集团。我们并且希望党一方面对于这问题急速的解决，把党的这种野心家—小组织不仅以党纪对付之，而且对这种反叛的组织必须以苏维埃革命的法律处罚之。……但要是有同志以捕风捉影的方法，离间同志关系，把玩笑的过程当作撼动波浪的材料，把事实涂抹替上恶意以欺骗党，鱼目混珠的牵涉到我们过去玩笑中所说的“助金互助会”来破坏同志相互的关系，自然我们希望上级……彻底露暴出那些借端造谣欺掩事实的企图。如果一旦这种情形发露时，我们以为对于这些野心家不仅应以党纪处之，而且应该详察其野心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及其已有的事实与将来的倾向。[1]

但是，这样的抗争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用学生自己的话来说，整个形势迅速变得“天昏地暗，阴雳四布”，学生们“整天在‘满城风雨’中过不安的生活”。[2] 不少学生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讲述了这种恐怖的气氛。其中一封信说：

自去年“暴露江浙同乡会”的声浪高唱入云以后，中大就充满着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气。……不但江浙的一般同志不敢谈论其事，低头不敢讲党委的工作和党的生活，即许多各省的同志，也个个自危。同志间互助猜疑，互助嫉视，同志关系变为非同志的互相暗里侦察的关系。[3]

---

① 《胡世杰、朱茂榛、郭景纯、周策、刘仁寿致调查委员会诸同志》。

② 《方绍原致代表团诸同志》，1928 年 7 月 30 日，中心档案，495/154/343/1 ~ 2；《邵世桂致代表团》，1928 年 8 月 17 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44 ~ 148。

③ 《余贯真、梁荆山等致代表团诸同志》，1928 年 8 月 14 日，中心档案，495/154/343/77 ~ 78。

在另一封信中，一个学生在表示他对这种追查不满的同时，也说明了此事所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信称：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再继续这样拖下去，恐怕“可以影响到大部分同志的政治生命”。可惜的是，

> 这件事迁延到这么长久，使同志相互的怀疑、猜想、倾陷、刁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这样继续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据向忠发同志的报告说得怎样严重，如说要枪毙他们的首领等等；如沈泽民、陈绍禹同志向同志们中的宣传说他们的组织怎样严密，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学有一百余人，而炮兵学校、东方大学、列宁格拉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忽而同乡会，忽而储金互助会，捕风捉影，弄得风雨满城，许多同志犯了嫌疑不能参加一切学习和工作，许多同志犯了嫌疑开除党籍和遣派回国。[①]

这里说“许多同志犯了嫌疑”，甚至说“大部分同志的政治生命”受到影响，丝毫不带一点儿夸大的色彩。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究竟指的是哪些人。清查刚一开始不久，有人就揭发说：“要知道中山大学的名单，最好是去找去年暑假时拥护周达文、俞秀松两人的人名单，和今年3月在党大会上拥护第二条路线，反对党委员会的人名单”。[②] 一些人则更直截了当：“以前所谓教务处派，现在就是江浙同乡会的领导了；以前所谓第三派，就是现在同

---

① 《严明杰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信》，1928年8月31日，中心档案，495/154/343/18~21。

② 竺廷璋：《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材料》，1928年3月，中心档案，495/154/343/2~3。

乡会的雏型”。[1] 因此，过去所有教务处派的人，所有在暑期休养所第二次大会上因参加反对党委员会派而被视为第三派的人，包括与俞秀松等人关系较好，或者在3月中大党员大会上一度倾向董亦湘等人意见的人，这时统统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而且随着清查的不断“深入”，这个名单还不断地扩大，今天是我揭发你，明天是他揭发我，后天又有人揭发他。几乎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而且每个人都在提防别人。同学之间过去有过的那种亲密关系荡然无存，就连上厕所时都得小心，因为确实有不少人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到处打小报告，连同学们在厕所里讲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也要拿去汇报一下。一些好事者还主动地根据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写出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报告，别出心裁地提出不仅要搞清楚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名誉会员”，而且还要搞清楚它的“同情者”。按照这个报告绘制的“江浙同乡会”组织系统表，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无论如何要在百人以上。[2] 查最初中大总支部委员会提交的可疑人员名单，只有二十六人被认定为“主要者”，十九人列为“次要者”，四人列为“怀疑者”。到第二次提交的名单即达到七十一人，而且全无主次可疑之分。综合已经查阅到的中大总支部和中共代表团几次提交的可疑人员名单，可以看出，至少有大约一百五十名学生曾被列为嫌疑对象。

如此之多的学生在嫌疑之列，并且被怀疑者还在与日俱

---

① 《王培吾致中委信》。

② 有报告甚至声称，“江浙同乡会”的中央机关为“中央干事会”，下设三个部，即“组织部”、“宣传部”、“宣传煽动部”，还直辖四个组，即“侦探组”、“军事组”、“翻译组”和“交通组”。组织部下还另设有“党部”、“党团组”，管理着各校支部及支部下的各小组。见《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报告》，中心档案，495/154/343/78～83。

②《严明杰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信》。

增，怎么能不使多数中国学生感到人人自危?！何况，那些鼓动者和揭发者又往往表现得比向忠发更革命、更仇恨反革命，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又怎么能不让人心惊胆战？其实，就像一位学生这时所反映的："在莫斯科的同志，他如果头上被人加上了'帨子'（'帽子'），如什么主义、或什么倾向，……特别是犯了江浙同乡会的嫌疑的同志，他根本就失丢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说是没有工作的可能！这是多么的严重而可怕呀！"即使是生命没有危险，因为政治上犯了错误，一生的前途也就葬送了，这在许多被嫌疑者看来，恐怕是最残酷不过的了。几天前还在积极监视、揭发同学们的中大支部委员何尚志听到苏兆征、张国焘说，同乡会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像自己的党的政治的生命死亡了似的"。[①] 军校学生张师因受怀疑被派送回国之前写信给中共代表团，也明确表示：我不怕回国，希望回国参加战斗，"我从未曾在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尸斧前畏缩不前"，"我已准备好一切！准备着与我们阶级的敌人作殊死战！"但问题是，我不希望这样回国。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因为江浙派的关系而被停止学习派回国？倘若是，请将我参加江浙派的证据公开宣布"。[②] 同时受到怀疑的军校学生傅汝霖给代表团的信则明显地给人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感觉。当他被苏俄军方连同几位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集中在一起，准备送回国之际，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中共代表团，大呼冤枉，一方面要求代表团当面询问揭发人，是不是搞错了。"如其证明我亦参与其谋，则请照以前向忠发同志的说法，准予枪毙"。一方面又请求不要把

---

① 《何尚志致兆征、国焘二同志及代表团诸同志信》，1928年8月4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25～127；《何尚志致代表团诸同志信》，1928年7月28日，中心档案，495/154/324/100。

② 《张师致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928年7月23日，中心档案，495/154/342/68～69。

他和这些“小组织”的人放在一起，因为两边的人都不信任他，“真是难过”。日后“纵使回国，定请不要派我同他们一路，免受意外的危险”。①

当然，更多的受怀疑学生的反应是极力证明自己的无辜。蒋经国给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在反复解释同学们搞“助金互助”的经过之后，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因此他“坚决提议处罚任何参加小组织的同志”。在这方面屈武的态度更具典型。他在写给中共领导人的信中一面申辩自己与小组织无关，有时只是“太相信同志了”，一面明确提议：“赶快的解决，公布调查结果，凡参加小组织的同志一律严重处罚，以免同志间相互猜疑”。而“为了表明”他的“积极的态度”，他特别“提出下列几个口号”：

1. 一切小组织从布尔什维克的党中滚开去！
2. 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
3. 要与第三党拼命到底！
4. 共产党是我的家室！
5. 共产主义是我的生命！
6. 为生命与家室和敌人决战而死是我的职责！②

那些被无辜怀疑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学生们的感觉，几乎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但无论抗争也好，申辩也好，在那样一种形势之下，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那些处身事外的同学，往

① 《傅汝霖致中共代表团信》，1928年7月30日，8月15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05，134。

② 《屈武致中法、兆征、晨因、玉章、叶挺诸同志并转代表团全体同志》。

往并不理解那些被怀疑的同学的心情。不仅如此，当米夫和别尔曼公开宣布中大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问题之后，许多学生竟纷纷告状，质问中共代表团："对中大的江浙同乡会会员仅用教育的方法……是否能完全消灭它的组织？""留些敌人在党内……将来这种责任应当谁负？"他们因此大骂米夫"鼠首两端，实有意作恶，他直是不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强烈要求中共代表团不要妥协，追查到底，断言"此等反党的危险组织，有他的党纲，有他的组织—中央与支部—此种组织必须打破它"。"这个反革命组织不彻底地解决"，不仅中大的工作将长期坏下去，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不难葬送在他们手里！"主张"党应当不姑息的将调查的结果严厉执行党的纪律及无产阶级国家的纪律"，要"斩草除根"。[①]

可是，所有这些态度激烈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什么具体的罪证呢？其实，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最关键的证据只有一条，就是上级领导人的"证词"，既然米夫和向忠发都肯定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还能错吗？至于究竟谁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谁可能是这个组织的同情者，那就完全看各个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如何了。但有一点，只要过去反对过总支部委员会的，即教务处派和第三派的学生及其同情者，都可以大胆怀疑。因此，许多揭发纯粹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或大胆想象。试举几例：

（1）一则揭发董亦湘的材料所举的证据，只是董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的发言，因为他在发言中曾批评说："现在领导中国

---

① 《屈武致中法、兆征、晨因、玉章、叶挺诸同志并转代表团全体同志》；《张国庶致韶玉并转中共代表苏、向诸亲爱的同志》；《李桂林、张永生、颜世彬等九人致代表团信》，1928 年 7 月；《杨尚昆、周任难、吴近等致代表团信》，1928 年 7 月；《郭寿华致中央委员会信》，1928 年 7 月 14 日，等，中心档案，495/154/343/12～14，49～50，66。

革命的，都是旅莫支部余孽，中国革命失败，就是这班人弄糟了！”“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有改造的必要”。①

（2）一则揭发蒋经国的材料，完全是道听途说，把蒋经国母亲那里寄来的钱当成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因而断言：“蒋经国现在还秘密地保存着父子的关系，曾有钞票来，数约千余元”。②

（3）几则揭发胡建三，胡锡奎和黎本益、林登岳、相玉梅、郭莹珊、菅尔斌、阎玉珍、林启铎、张玉符的材料纯粹是想象，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对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不特不积极的反对，而且抱着一种对于党的处置不满及辩护的态度”；因为“每天晚上他们回来睡觉很晚”，成天三个五个地一起往人少处去。③

（4）一则揭发何尚志的材料同样武断，它的根据只是在于“当冯弗能、赵显亭二个女子要回国时，何尚志写给他们上海党部的负责人地址。冯、赵是国民党的人，是冯玉祥的亲戚女儿，是反革命的人，何尚志竟这样的勾结他！”④

（5）一则揭发材料更是离奇，它的根据只是有过一个国民党学生曾经给蒋介石写过信，而一个叫潘锡朋的党员与这个国民党学生关系较好，由此推论潘多半是江浙同乡会的，再进而推论江浙同乡会与蒋介石有关，说什么：“我固然不能肯定的证明这些人们（指‘江浙同乡会’的会员—引者）已经与蒋介石有了什么具体的关系，然而我可以断言他们是在企图与蒋勾结”。⑤

---

①② 佚名：《关于江浙同乡会的调查》，1928年，中心档案，495/154/343/78～83。

③ 《何尚志致代表团诸同志信》；《王培吾、曾钟鉴、李运枢致中央政治局信》，1928年7月30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01～103。

④ 竺廷璋：《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材料》。

⑤ 《王崇吾致中共中央代表团信》，1928年，中心档案，495/154/343/7～8。

孰是孰非

"江浙同乡会"事件闹到如此翻天覆地的地步，毫无疑问是向忠发一手促成的。米夫的点火之后又熄火，看来也挡不住向忠发必欲追查到底的决心。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宣告闭幕，向忠发出人意外地在随后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他做了中共最高领袖之后放的第一炮，就是公开向中共代表团宣布"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处此一反党秘密组织的决心。

7月14日，向忠发召集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这一事件发生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要求"同志们绝对不要怀疑，这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此一报告立即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要求"严重调查确实"，然后将这些小组织分子"一个一个判铲除出去"。有人甚至明确主张对这些人应当：

1. 唯一的领袖——枪决；
2. 二等领袖——坐格伯乌；
3. 三等分子——放逐；
4. 四等分子——用教育方法训练他。①

值得注意的，向忠发的报告更多的只是说明情况，而陈绍禹在这一天会议上的发言，则俨然成为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结论。陈的发言分为五个方面，即（1）江浙同乡会的来源；（2）江浙同乡会的实质；（3）江浙同乡会的行动；（4）江浙同乡会的前途；（5）我们对江浙同乡会应采的办法。

---

① 《王培吾致中委信》。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来源，陈绍禹明确认为它起源于中大前此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之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就是教务处派。俞秀松等参予派遣学生学习军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对于组织“江浙同乡会”的一种重要步骤。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江浙同乡会组织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军营中为互助开玩笑，但其历史根源则是与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派人学军事时之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他提出的处理办法是：“首要者除用党纪制裁外，还须采用其他办法，次要者用党的组织办法解决，一般会员用党的教育方法解决”。[1] 会后提出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除了在处理办法上与陈绍禹的意见有区别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陈绍禹的看法。此项《意见》明确认为：

> 一、江浙同乡会的来源和形式原因：
> 1. 主观上的来源：
> (1) 1927 年暑假时孙大发生“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的斗争，结果教务处派被打下去，由是蜕化形成第三派，这是以后江浙同乡会的雏型。
> (2) 1927 年暑假后，东孙两大分派学生到各军校学习同志，多是周达文、俞秀松接近的人，所以在各军校都有江浙同乡会的会员，在野营中以互助为开玩笑，从中有人利用而形成组织。
> 2. 客观上的形成原因：
> (1) 它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反映；
> (2) 它是中共“八七”反机会主义的反响；

① 《陈绍禹发言》，1928 年 3 月 14 日，中心档案，495/154/342/99 - 104。

(3) 它是联共党内反对派的破产。

二、江浙同乡会的性质：

1. 江浙同乡会会员的成份：

(1) 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旅莫支部方法而招党员群众反对的老党员；

(2) 刚从国民党加入CY的分子、右派的国民党员、反对党的领导的先锋主义者；

(3) 反对派分子；

(4) 一部分不注意政治问题而专作个人意气斗争、时时想取得委员地位的分子，企图利用同乡会的势力，结果反为同乡会所利用；

(5) 一切反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中共中央政策表示满意的人……。

2. 他们的理论：

(1) 中国党过去是机会主义的领导，现在的领导不力；

(2) 谁有力量谁就战胜。

3. 他们的组织：

(1) 有章程；(2) 按期缴纳会费；(3) 有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4) 有中央有支部；(5) 在党内秘密组织和行动；(6) 秘密开会……

因此，江浙同乡会是一切反对和不满意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八七”后中共中央的政策的分子的集团；它是有政治作用的、破坏党的组织，有反中国党（甚至是反苏联党）的危险性，在客观上它是反革命性的。①

---

① 《对江浙同乡会的意见》，1928年7月，中心档案，495/154/343/64~67。（此项《意见》中关于“解决办法”一项只提出尽快提交名单给新中央，争取最近期间予以解决，尚未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无疑是中共中央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一项正式文件，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中央解决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基本依据。但是，在这时的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李立三在7月14日会议的讨论中当时就对所谓“江浙同乡会”有理论、有目的的说法表示怀疑。而这时最尖锐地否定“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恐怕要数曾长期与项英、许白昊、刘少奇、林育南等一同在武汉工作的方绍原了。方到中山大学学习还不足一年，但他已经注意到，中大内部同志关系极不正常。他极其尖锐地指出：中大“党的生活、同志间的关系，只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互相拉拢、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好者所不屑有的行动，而我们的同志居然行之若素，毫不以为可耻。此种现象，在孙东两大里，盖已成为很普遍的公开的秘密了”。他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根本就不存在。他认为，之所以闹出这样一场政治风波，根本上只是由于“孙大同志间过去的历史关系”和米夫、向忠发两人不负责任的煽风点火。他在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要求代表团务必格外注意中山大学学生内部历史形成的种种矛盾，说：

孙大同志间的关系，向来是盘散沙，毫无党的整体利益的结合，只有利用封建式的私人情感的联络，不过往往在某一种利害相同的情形之下，各个派别同欲推翻其唯一仇视的一派，暂时才有互相结合的趋势。但时间一过，彼此都依然恢复原状，你攻讦我，我攻讦你，你想推倒我当领袖，我要取消他卖风情，明枪暗战，舌剑唇刀，闹得不可开交了。关于这样的事实，孙大四年内不知要闹了几多回了（东大里也是一样）。什么反党路线派啊，旅莫支部派啊，反旅莫支部派啊……闹到现在的江浙同乡会上，那一次不是

> 因私人得失才引起来的同志纠纷？……很明显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称，就是几个党部负责的造谣生事的主要分子，故意把它煽动扩大起来，准备一网打尽反对他们的同志的一个例子。

据此，他声称："江浙同乡会，我现在敢断定的说，不但党部造谣生事的主要分子将手足无措地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大部分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会员的同志，还不明白他们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被大众所攻击的恶名词。"①

根据新中央的决定，"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委托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负责。中共代表团毫无疑问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决定（即《意见》）来认识和处理此一问题。因此，方绍原或者其他怀疑者的信件事实上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到是6月29日陈启科、左权、胡士杰、尤赤、郭景纯等军校被开除学生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迅速起了作用。7月22日，胡士杰等再度前往克林姆林宫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等因参加共产国际"六大"不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亲自接见了这几位中国军事学生。雅罗斯列夫斯基告诉他们，他已经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过去并不知道关于开除中国军事学生的事，也不知道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他当时即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后者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② 两天后，苏共监察委员会即分别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格伯乌收到了有关的资料。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书记为周恩来，主要负责人有瞿秋白、

---

① 《方绍原致项英并请提交代表团公启》，1928年7月31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06~109。

② 《胡世杰、尤赤、郭景纯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诸同志信》，1928年7月25日，中心档案，495/154/342/33~36。

苏兆征和张国焘。恰好，他们这时也正前往格伯乌要求查阅有关材料，刚看过一次即得到通知，知道所有此一事件的资料要被调往苏共中央监委。到监委后，他们又得知监委已经决定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诉，于近期内召集有关各方人员开联席会议，重新调查解决这一问题。监委并准备为此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以雅罗斯列夫斯基为主席，包括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和格伯乌的负责人。鉴于此，中共代表团不得不立即着手同有关学校党部进行讨论，以便准备材料。而中大党部陈原道、李剑如等反映相当强烈，明确认为代表团不能妥协，“中共代表团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枪决，活动分子应开除”。周恩来等则当场解释说，不能认为代表团有妥协，事实上问题十分复杂，秘密的文件尚未得到，名单也成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人的问题，而“对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他要求中大总支部委员会能够协助提供一个确切的“江浙同乡会”人员名单。①

清查了半年多的时间都不能确定“江浙同乡会”会员的名单，要在几天之内搞出一个“确切的名单”，这当然是做不到的。虽然中大支部委员会很快就提供出一个七十一人的名单，俞秀松、周达文等首当其冲，然而在雅罗斯列夫斯基于7月27日召集的听取俞秀松、周达文等人关于自己与所谓“江浙同乡会”关系的声明书的听证会上，中共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瞿秋白、陈道原等人几乎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俞秀松、周达文的申辩与事实不相符合。②

---

① 《代表团与中大支委的谈话》。

②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听证会》，1928年7月27日，中心档案，495/154/342/112。

无效裁判

7 月 27 日，"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正式组成，中共正式代表为瞿秋白与周恩来（而后中共代表团曾一度建议暂由苏兆征、关向应二人代替，最后主要由周恩来负责，瞿秋白因病未参加）。8 月 1 日，雅罗斯列夫斯基通知委员会有关委员：自当日起到 8 月 6 日止，所有委员都应到监察委员会看材料，并有权向任何与此事件有关的同志提出问题，调查工作由此开始。经过前后近两周的工作，阅读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方面负责人谈话等，雅罗斯列夫斯基于 8 月 10 日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报告说：

> 我很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的材料，与好多与此事有关的中国学生谈话，与我谈话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同志，如格伯乌的负责者库马罗，还有皮亚尼茨基、勃哈林、米夫、中国代表团等，使我觉得多数中国同志所提出来的罪名是没有根据的。……我很相信，江浙同乡会之所以造成的基础，是由于中国学生中间为争夺影响之各派互相的斗争，从中国送来的学生成份和其他在国内所受的革命教育都不甚佳。他们有地方主义的色彩。但对于部分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的同志，最大的罪过（只是）：一方面有互助会的组织，另一方面他们这样组织并没有通知党部，没有用适当的方法来反对这样没有监督的公共组织的存在。

报告接着详细说明了以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为代表的

一派人在反对旅莫支部和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肯定了他们在拥护与帮助阿戈尔及教务处反对拉狄克的斗争中尽到了一个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同时，报告根据大量的信件，说明在军校同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次关于互助问题的议论，因而“断定组织互助会的企图是存在的”。但报告指出：“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的存在是绝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有材料可以证明他现在仍然存在”。报告接着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在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章程问题里，报告做了如下的分析：

章程是任何人都没有看着的。陆贻松的信中曾有章程第一条是缴纳会费这一句话。陆贻松自己现在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笑话。许多其他的同志也这样说过的。李沛泽给委员会的声明书中说，王长熙曾看见章程的。但将李沛泽唤到监察委员会我问她的时候，她说王长熙是看见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说了章程的。格伯乌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曾说了以下一个关于有章程的事实。他说：“炮兵学生孙发立及王长熙看见了朱茂榛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同乡会的‘党纲’（互助会的章程），内中有很多条文”。王长熙及孙发立看见了什么，关于这，一点材料也没有。假使再来看格伯乌的答复，则他又说：“暑假的前几天，张式沅曾看见了一个同乡会的会员，他在抄写一本小书，书面叫做‘工作计划’，有很多条文，很小的字”。……米夫同志曾调查了这件事的，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这就可以破获一切“同乡会”的罪人，米夫将这件东西拿给翻译一看，原来是1926年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这就是所谓秘密章程，这就是张式沅看见的！我请问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

> 各负责的同志：一个一百五十人的组织，存在了一年多，格伯乌以及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件事得了许多报告，格伯乌由“同乡会”的会员也得着了许多的材料（根据格伯乌7月13日调查），而任何人都不知道章程是什么样，这个道理是否讲得过去？我请问：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他有政治的目的（照格伯乌的结论说），是要夺取中国共产党及军事中的领导，而他的章程的第一条偏偏是说的会费，这个道理是否讲得通？我敢断定，谁人也没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互助的企图是有的，不是到处都有组织，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没有章程，也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那么中大党部以及中共中央所列的那众多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报告分析说：

> 在材料中间的所有调查，有许多自相冲突的地方。同是一个人，又是“同乡会”中间的积极分子，而又出来很积极的反对他（何尚志）。甚至于中共中央委员也有被说成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的。有一个调查上说瞿秋白道：“这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在中国共产党分化的时候，夺取了总书记的位置，他想组织自己的一派，来用以进攻其他的负责人”。而在底下又说：“为使同乡会发展起见，必要与瞿秋白这一部分发生部分的关系”。在这一个“同乡会”中间，内中有俞秀松、周达文、刘仁静、彭泽湘，但是稍为比较接近（熟悉）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前两个与后两个中间，都是时常不断的冲突的。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调查？这仅仅是根据着个人的倾轧、猜忌、仇恨吧？
> 结论：这些消息（是）不能相信的，所根据的都不是

事实，而是猜想、谣言、不正确的报告。

报告在逐项否定了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的指认后，最后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件事的正确办法应当是，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同时：

> 1）组织一个委员会，其成分以①皮亚尼茨基、②国际监委、③中国代表团、④雅罗斯列夫斯基、⑤米夫（构成）。委托委员会起草一个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向他们解释在现在中国共产工作困难与白色恐怖之下，虽有一点小的党内斗争，小的派别，小的纪律的破坏，虽有一点组织秘密团体之小的企图，虽然为的互助等等，他都可以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有非常之大的危害。要号召同志们坚决起来肃清到处同志关系中之不健全的地方，加紧理论与实际的工作，认清这种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预备革命工作的一部分。2）在各校中国同志大会中宣读这封信，要与同志们谈话，要完全肃清同志中间之相互不信任的空气，警告苏联境内之中国学生，虽然（如果）有了小的派别，相互的斗争、倾轧、无根据的毁谤……，都要受党之适当的组织的制裁。3）肃清格伯乌关于“同乡会”的材料。[①]

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轻而易举地说服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甚至格伯乌的领导人也主动承认米利斯等负责此一工作的

---

① 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

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只有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苏兆征两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了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为了说服中共的代表，会议几乎是不间断地进行了十一个小时，最后，会议放弃了这种努力，通过了苏共监委提出的决议（草案）。对此，周恩来和苏兆征当场表示，他们不能同意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联席会议上其他同志的态度，尤其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样一种重大的结论，无论如何"过于仓卒"，只不过，他们目前不打算继续在这次会上提出另外的提议，他们将以代表团的名义向俄共中央政治局说明他们的看法。

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肯定："1927 年之'同乡会'是一种苏联境内各校之中国学生企图组织物质上之互助团体，其他的政治目的是没有的"。并且，联席会议"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断定它已经有了成形的组织"。所有关于参加互助的中国学生与反党反革命的右派、第三党相勾结，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凡因此而受到嫌疑被派遣回国或受到处分的学生，一律重新审查。一切有关这一组织的材料均停止生效。并且今后苏联境内任何中国党员团员的反革命罪名，均应由中央监委和国际监委立案审定。[①]

几天之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前此文件和代表团意见起草了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8 月 15 日，代表团正式讨论和通过了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周恩来宣称：中共代表团一直认为此事应该由中共与苏共两党共同组织委员会进行讨论，但没有想到"办理此事的中共代表团差不多仅仅站在一个与闻的地位来参加讨论，并没有一贯地负过什么共同解决的责任"。中共代表团确信："依照中央监委的决议，只有使群众更加愤懑，同

① 联共中央监委、共产国际监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席会议：《江浙同乡会决议》，1928 年 8 月 10 日，中心档案，495/154/343/35～36。

志的关系更将无法改善"。因为，不仅代表团，而且多数中国同志都确信"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信中再次列举了陆贻松等关于"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的信件，肯定"江浙同乡会或是互助会已经存在，它并有名称、会章、会费、会员和登记手续等等"。并且批评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章程第一条不可能是讲会费的说法，说"假如我们从追究这个秘密组织着眼，又乌知他们这种秘密组织不会故意将会费列在第一条?"至于该组织同反革命党派的关系问题，信中一方面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还无材料可以证明"，另一方面又举出蒋经国 1927 年 8 月还得到其母亲所寄的三百元钱，和潘锡朋袒护过国民党右派分子，董亦湘曾主张吸收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邓毅生入党的事，说这几件事都表明，"江浙同乡会的个别分子的确与其他党派还有些牵连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是要有反革命的嫌疑的"。

但是，在苏共中央监委以及格伯乌等各苏联有关部门已经根本上否定了这一事件之后，中共代表团自己要想单方面的继续追查下去，或是坚持对上百名受嫌疑的学生进行处罚，显而易见是不大可能的。何况，通过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联席会议的讨论，周恩来等人也清楚地意识到，前此向忠发等人和格伯乌用来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及其嫌疑者定案的种种证据，确实很难完全成立。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指望，苏共中央政治局会支持自己建立在过去那些"证据"基础上所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中共代表团不能不在两方面作出重要的妥协。

其一，既然前此绝大多数的指控都只是建立在推测和派别观念的基础上，如今只好放弃对众多学生的这种指控。结果，代表团相信有根据可以指认的"江浙同乡会"分子，只剩下了十二个人，因为这十二个人的通信中都明明白白地提到过"互助会"的事情。于是，由于找不到类似的证据，周达文干脆被排除在外了。至于俞秀松，因为是教务处派的首领，又曾对卢贻松、蒋经国说过写信要小心，毕竟仍值得怀疑，但也只能列

入“嫌疑”之中了。信中就此说道：

> 我们现在提到他的分子，只能依据实际的材料指出：蒋经国、卢贻松、朱茂榛、周策、刘仁寿、胡世杰、刘宜山、张师、尤赤、郭景纯、甘青山、黄仲美十二人是有直接证据参加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的。俞秀松则是犯有重大嫌疑的。曾肇时、薛萼果[①]（在东大翻译室会谈的事便是指他的地方，薛当时回答是在他那里烧鸡吃）、陈启科（李沛泽所见的会谈地方便是在陈启科处）、董亦湘、西门中华、潘锡朋是犯有嫌疑的。

其二，根据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代表团自然不能放弃对“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严重怀疑，但既然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组织的存在和它具有政治目的，他们已不能指望苏联专政机关会继续参与对此事的处理，只能把它当作自己内部的问题来定性和处置。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由他们起草的新的决议草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已经从原有的决定上大大后退了。草案称：

> 1. 根据现在所有的材料，证明在苏联境内有一部分中国学生的党员团员于一九二七年秋季曾开始组织了“互助会”（或名江浙同乡会）这一对党秘密的组织。它有名称、会章、会员、会费及登记手续等等。
> 2. 因为过早公开了这个问题，所以未能继续发现这个组织的章程内容和其他更严重的材料，

---

① 薛萼果，即经济学家孙冶方。

以致对于这个组织整个的一定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现在还是不能确实判定。

3. 但这个组织……绝非纯粹的“互助”或“同乡”性质的组织，必然要有政治意义的，至少也已存在了党内小组织的派别。

4. 对于已经证实参加这种秘密组织的分子和嫌疑人，须分别加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前次关于十二个军事学生党的决定，也在这个条件下重新审查。[①]

8月17日，中共代表团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上述文件之后，也向苏共中央监委提交了这一文件的复本。次日，雅罗斯列夫斯基也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有关情况的说明，再度指出，有关“江浙同乡会”问题上，格伯乌的调查人员根据没有证实还不十分可靠的材料即草率得出结论，明显地是错误的，米夫和向忠发“根据还未证实的消息，在学生群众中间作了那么严重的报告”，同样地犯有错误。他不能理解，在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各有关方面重新全面核对了所有事件材料之后，在所有与会的委员“一致同意”中央监委所提出的报告和决议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仍旧根据那些几乎不能成立的材料坚持要处罚俞秀松等同志。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中共代表团坚持要处罚的多数同志，事实上恰恰是“比在苏联学习的一般的中国党团员要好些的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视为“反革命”?[②]

8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受理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并派出代表参加有苏共中央监委、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参加的联

---

① 《中共代表团书记周恩来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② 《雅罗斯列夫斯基致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8年8月18日，中心档案，495/154/342/342～343。

席会议，听取几方面的意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调和苏共监委与中共代表团分歧的努力，显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时，苏共中央监委已经起草了一份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及党团员书，指出中国部分学生只是“企图组织”一种物质上的互助团体，并“把能够引起严重而且有危害的结果的东西当作开玩笑”，肯定“没有证据来确切地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曾经存在过”，但强调这种行动仍旧是错误的，只是“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应采取党的教育方法”。而中共代表团明显地不同意这一文件，经过周恩来修改之后，“企图组织”变成了“曾经组织过”；“……当作开玩笑”变成了“……当作开玩笑来掩饰对党秘密的组织”；“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曾经存在过”，变成了“党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现在还存在没有，但根据党内现有的材料，却能指出这种组织过去曾存在过且是对党秘密的，故党必须对于这种组织给以坚决的裁判”；“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应采取党的教育方法”，变成了“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主要的是采取教育方法，然而，同志们应该了解，如果党的教育方法显出不足时，则党对于不通知党而参加在党的机关监督之外，由苏联境内中国学生所构成的这种互助会组织以及其他任何派别或组织的同志们，不能不采取最后的组织办法”。①

应当指出，周恩来事实上仍旧再度作出了妥协。因为它已经不再坚持该组织“必然要有政治意义”和必须对其成员“加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但他仍旧坚持：(1)“江浙同乡会”事实存在过；(2)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

① 《告苏联境内孙大及其他各校之中国学生、联共、中共、苏联少共、中国少共的正式或候补的党员书》，1928年8月；《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1928年8月，中心档案，495/154/343/39～43，44～45。

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3）对其成员必要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但这时周恩来的处境确实比较难。在一次会议上，鉴于“同志关系坏到万分”，周恩来强调了一句同志间要取消一切政治名词性的无原则的相互攻击，结果就立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说是现在说这种话“很容易被人误解，被人利用之反对党以与党部对立”，迫使周不得不马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毫无否认这种政治名词在必要时的批评作用。[①]

显然，周恩来等人已经让无可让了。再让，不仅新任总书记向忠发过去的一切说法和中共中央就此得出的结论，必将全部推翻，而且各校党部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结果，不仅有可能影响新中央的威信，而且可能使众多因此一事件受到影响的中国学生和前此怀疑他们的其他中国学生，特别是各校党部，形成严重的对立。面对这一极为复杂微妙的情况，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也很快放弃了公开解决这一事件的努力。9月初举行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代表提出的建议，中共代表团必须停止利用前此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同时，联席会议也须停止就此一事件做出公开结论，以免进一步恶化中国学生之间已经极不正常的关系。为了解决中国学生之间的矛盾。联席会议决定发表一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求中国学生必须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学习列宁主义理论和研究苏联及中国革命经验上来，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的教育，根本改变因经济落后而盛行的地方主义情绪，放弃一切无原则的同乡观念乃至派别倾向。[②]

---

① 周恩来：《我的声明》，1928年10月2日，中心档案，514/1/382/97。

② 《告苏联境内孙大及其他各校之中国学生书》，1928年，中心档案，495/154/342/7。

阴云难消

“江浙同乡会”事件，由此不了了之。但“江浙同乡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在多数中国学生中间却没有解决。一些列席联席会议的受嫌疑学生回校以后眉飞色舞，奔走相告，而那些认定存在着一个反党的秘密小组织的学生或党部，则侧目而视，怒不可遏。于是，一边认为有，一边认为没有，中国学生中间很快分裂成两大对立的派别，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逢会必吵，情绪对立日趋激烈。由于学校总支部委员会仍大权在握，并且上级亦无人为过去受嫌疑者公开洗刷罪名，因此，事实上各校中，特别是中大内受嫌疑学生及其同情者仍占少数，甚至继续受到政治歧视。面对这种情况，在暑假休养期间，他们不仅公开游说，而且私下串连，征集签名，准备致信共产国际监委和苏共中央监委，要求立即公布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结论，为受嫌疑学生恢复名誉。结果，这件事为部分工人学生所侦知，并在中大党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谓“反对派文件”为名，演出了一幕强行搜查同学寝室，双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于是，受嫌疑学生的联名信没寄出去，倒引来一个中央调查委员会来解决中国学生之间的打架问题。

中央调查委员会如何解决这一打架事件，严格说来并不重要。既然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与中共代表团等各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件事的解决也只能就事论事，它不会给受嫌疑学生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但在这次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曾召开过学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国学生之间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矛盾，“江浙同乡会”事件究竟在他们中间留下了怎样严重的后遗症。

在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召集的党内同志谈话会上，两种意见

就针锋相对。一种意见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问题是造成此次打架事件的根源，不解决"江浙同乡会"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同志彼此之间的猜疑和对立。而"江浙同乡会"问题，其实是两部分同志造成的，一方面是学校领导，如米夫、别尔曼等轻听轻信所做的不负责任的报告，把事情说得无比严重，另一方面是党支部委员会和一些学生干部，如陈原道、陈绍禹等，搞无原则的斗争，借机蓄意宣传，上纲上线，无根据的鼓动学生们互相在公开和背后揭发检举，造成同学之间的互相猜疑和感情对立。然而陈绍禹、秦邦宪、何子述等人却针逢相对地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都是原则上的斗争；领导者说"江浙同乡会"有反革命的性质，"完全是这些小组织的同志们的错误，而不是领导者的罪过"。"要是米夫不报告出来，现在恐怕已经成为事实了"。①

在调查委员会召集的中大教员班和职员班学员谈话过程中，以西门中华、薛萼果等为一方，以陈绍禹、李竹声、盛忠亮等为一方，双方又再次发生面对面的争吵。西门中华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问题，是"指导机关的大错误"，不仅是学校指导机关，而且也是党支部委员会的原则上的错误，它在同志之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完全破坏了同志关系。直到现在，党支部委员会仍旧不做自我批评。"休养所之事，收（搜）查不是偶然的，而是支部有组织有系统的准备的，目的在于妨碍自我批评"。陈绍禹、秦邦宪等立即反唇相讥，称：什么自我批评，还不是"有一部分同志要在自我批评的口号之下来煽动反党"？休养所事件，说到底就是"联合几个同志专门反对党的决议"。陈甚至明确指责西门中华为"先锋主义的代表"，理由是他身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却一再与党支部唱对台戏，不接受党的领导，公然怀疑党所决定的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

① 《二年级党员干部座谈会》，1928 年 10 月 5 日，中心档案，530/2/54/4～9。

作。他再次宣称："如果没有米夫和向的宣言，这个组织有到反革命组织的可能"。对此，薛萼果等当场反问：请你说明"江浙同乡会""是谁组织的?"你说"党的争斗都是有原则的，一般的是对的，但江浙同乡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和理论呢？没有。不是政治性质的嘛。可是领导机关不能引导争论，却在大会上宣言是反革命的等等，这是正确的吗?"而且，最先在墙报上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说它与第三党有关系的不是陈绍禹吗？米夫和向忠发还说在陈的后头，陈绍禹又是根据什么呢？现在米夫又说"江浙同乡会"不存在了，你们怎么解释呢？对此，陈绍禹等当场群起而攻之，斥责薛萼果等继续为"江浙同乡会"辩护，是严重的"反对党的决议"。薛萼果毫不示弱，称："江浙同乡会"问题根本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是党部为压制批评而挑起的政治纠纷，"支部口头上说赞成自我批评，实际上批评了就说他是第二条路线或江浙（同乡）会"。①

从以上的谈话过程中可以清楚了解的一点是，陈绍禹的地位确实不同一般，他已开始成为中大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派别。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这场反"江浙同乡会"的事件。这一事件最初固然不是他所挑起，但因为他可以接近米夫，因为他一度作为向忠发的俄文翻译早早了解到格伯乌所掌握的各种材料，从而便利了他在中大的这场反"江浙同乡会"的运动中充当一种未卜先知、呼风唤雨的角色，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陈绍禹不仅不会轻易承认这场斗争的错误，并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这种角色演下去。可以肯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稀泥"的决定和中共代表团继续认定"江浙同乡会"为秘密小组织的情况，便利了陈绍禹继续充当反对"江浙同乡会"领袖的角色。与此同时，学校里多数工人出身的学生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学

① 《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与本校教员班、职员班谈话记录》，1928年10月5日，中心档案，530/2/54/13～19。

生之间矛盾的客观存在，也为陈绍禹一派提供了某些群众基础。

在中大，第一届学生中工人学生非常少，第二届则明显增多，但在第二届学生的总数中仍占绝对少数。因此，在前两届学生当中，工人学生与一般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之间，一般看不出明显的矛盾。但在中大的派别斗争之中，由于工人学生通常较为靠近党组织，守纪律，加上自己在理论及俄语学习等方面往往跟不上学习进度，对教务处工作及俄国教员，特别是拿着高薪的翻译的工作不满意，因此，他们多半倾向于党支部委员会一派，事实上多反对教务处一派。只是，因为这时工人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所起作用还不十分明显。可是，到了第三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届学生的成份恰好相反，工人学生已占到了整个学生人数的将近四分之三。这些学生自来校之日起，就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由于他们到校之后，第一届学生多数已经毕业离校，因此他们在学校中的作用自然举足轻重。当清查“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来到时，他们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党支部委员会一边，必欲清算所谓教务处派和第三派。这样一来，陈绍禹更是如鱼得水，他的观点在一年级学生当中颇有市场。而这次强行搜查并打架，也正是一年级的工人学生干出来的。

要了解一年级工人学生这时的心态和倾向，只要看一看10月5日一年级关于打人事件的讨论会发言就可以了解大概。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明显地占据着压倒的优势，不仅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而且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做得对。称：“江浙派竭力宣传，反对学校当局，暗中串连，并有宣传品”，为什么不能搜查？当有发言者讲：“我们有党，应用党的纪律解决一切问题，不应当打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应当展开批评，不应当互相搜查，而应用教育的方法，……对同志不应当加以政治帽子”时，其他人则大声鼓噪：“他们宣传不应该搜索他们，试问我们应当反对他不？他们要反共、反苏联啊！”“工人同志

打人，因我们缺乏知识"，可对于"江浙同乡会"的存在，"我们有证明文件"，谁让他们"说我们造谣的"！况且"每次开会都是乱七八糟，都是反对派挑拨，不是江浙派是谁？"当有人发言说应该尊重事实，"不能不考察事实就乱放炮，说有江浙派"。一些发言者则大呼小叫：江浙派是有的，反党行为、第二条路线都是有的，这些"我们工人看得清楚，他们有知识，来造反对派，我们工人都应该起来与他们奋斗"，"打倒这些王八蛋们！"有些工人发言更坦率：我们没有知识，不会说话，来苏联是想跟大家学习，将来也可以提高地位，但"来此一看，不然了！高等的、中等的、低等的，不平等了"，"你们也有一百多元的，二百多元的，你们要革穷人的命吗？""在预备班提出打倒教员的口号，这是谁提出来的？他们想谋害我们工人同志，不叫我们学习，他们学习得多，他们回国可拿大皮包，我们给他们拿枪。他们只想他们知识阶级学习，不使我们学习"。①

不难想象，一个小小的调查委员会是不能解决中国学生中这许多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前后只进行了不到十天的调查，就草草地宣告调查结束，结论是："休养所事件，有同志搜查同志文件，以为这是很好的事情，被搜查者则以武力相抗，这只有在中共的大学中才会发生。搜查的同志是不对的，是呆的，即使有同志是反对派，或者反革命，可以由格伯乌或党检委去办，所以搜查的同志是不正确的。当然，被搜查的以武装方法来反抗也是不对的。"② 但是，对于学生中反应强烈的"江浙同乡会"问题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只不过，在报告会上，当有人继续指责休养中一些人秘密征集签名为"江浙同乡会"事件翻案是"反党行为"时，报告人还

① 《第一年级年级会议》，1928年10月5日，中心档案，530/2/61/1~3。

② 《中央审查本校工作结果报告》，1928年10月，中心档案，530/2/51/241~242。

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向上级写信反映意见是有权利的"。[1] 问题仅仅在于，当各个中央已经决定放弃公开解决和评价"江浙同乡会"事件之后，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不受重视的。

当然，还是得庆幸受到"江浙同乡会"事件牵连的这些中国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没有变得像后来那样多疑，苏联也尚未开始搞肃反，对反对派也还未大开杀戒。因此，苏共领导人看上去比中共领导人还要清醒许多，从而使得这次被怀疑和处分的那些中国学生，包括俞秀松等，一时多半都得到了解脱。但既然没有人宣布"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中共代表团既然拒绝为一切嫌疑分子解除嫌疑恢复名誉，陈绍禹一派整人者仍可以而且必须要利用这根大棒子打人，在其视力范围所及的那些被嫌疑者也就永远也脱不了干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或新的运动来临，他们必将首当其冲。

中山大学从此后直到最终解散，几乎再无宁日了。不仅学生之间斗来斗去，各种名目的斗争没个完，苏联党也日渐兴起了整肃和清洗之风。纵使逃过了学校内部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大棒子被高高祭起之后，"江浙同乡会"这样的政治帽子随时都可能成为整人的工具。尽管像周达文这样的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同陈绍禹的斗争，但最终仍旧不是对手。后来，"江浙同乡会"之所以被说成是什么托陈分子（即所谓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分子）的秘密组织，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之所以被说成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2] 并先后受此牵连而被捕冤死，

---

① 《第一年级年级会议》。

② 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137 页；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解放》第 30 期，1938 年 2 月 8 日；《海参崴华侨中的托洛茨基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 3 期，第 278～280 页。

何尝不是由于这个倒霉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其实，不要说涉嫌“江浙同乡会”的学生，就是中大那些曾经拥护教务处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松一派的仍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后来又有几个不曾受到迫害的呢？

在整个“江浙同乡会”事件被怀疑人中，唯一没有受到严重政治迫害的，大概也只有蒋经国一个人了。从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出，蒋经国不仅曾被视为“江浙同乡会”的首恶，而且苏联当局还清楚地知道他曾积极参与过莫斯科中国学生中反对派的活动。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的特殊背景及可能的用途，俄国人坚持不能动过他一个指头。至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所描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俄国人在他没有太大用处时将他下放到偏僻地区去“冷藏”了几年而已，与那些先后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被处置，甚至死去的同学们相比，他幸运得太多了。

当然，由于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死亡，由于苏共中央很快介入并在事实上使事件不了了之，因此，“江浙同乡会”事件也许算不上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案件。但是，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后果，联想一下我们后来经历过的种种运动，它是不是仍旧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呢？

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①。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张闻天还进过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但这五任总书记当中，却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是向忠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仅此一位。因此，向忠发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能够在知识分子众多的党的领导人中异军突起，他在何时起过何种作用，等等，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课题。

然而，向忠发到底不能因为其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个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辱。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位最受鄙视的党的领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以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说明，都是相当刻薄的。向忠发的工人出身，被说成是“流氓无产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

---

① 这里仅按习惯称呼。实际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名称并不完全相同，如一大时称书记，二大、三大时称委员长，六大时称主席，等。另外，六届六中全会以前，中共只开过六次代表大会，以届而论，应为六届。除陈独秀一连五届和向忠发第六届为正选外，余均居临危受命，故以人计为五任。

他在党内的作用，自然只是“挂名”；而他的品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据说他自任总书记以来，在那种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竟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妓女叫杨秀贞的整天在他的住处鬼混”，以至“党”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自己总书记的“种种不轨行为”。①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至少，在近两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于向忠发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如，关于向忠发根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关于向忠发“大字识不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向忠发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宁，跟妓女姘居。不过，看起来关于向忠发是“挂名的总书记”的说法是难于改变了，作者只是换了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儿，叫做“名义上的总书记”，并且断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②

过分地贬低共产党的总书记，结果只能是使人对共产党本身的水平与能力产生严重的疑问。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只是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如果说，这纯粹是共产国际的主意的话，那么，第一，难道它就不了解向忠发的能力？难道它就不知道，让一个毫无德

① 见高军：《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等。

② 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8页。

行的人来做中共的领袖，即使不会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信任？第二，稍微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绝不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发生在向忠发就任总书记之时的“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绝不可能听任共产国际安排一个蠢才来做自己的领袖。

事情很清楚，时至今日，人们关于向忠发的种种说法都还不尽准确。对向忠发的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说明。

向忠发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 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 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 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 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 4 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 1921 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 1921 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 3 年，是 1925 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 1925 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

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 1927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 4 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 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 13 个猛增到 270 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一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然而，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于这一步之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

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条①，使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之流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与闻中央之事，致使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了在武汉的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

---

① 关于共产国际和“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对此事的严厉批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281～282，627页。有关此事的情形还可参见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页。

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①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② 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③ 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628页。

② 确切地说，这时被当作工人补入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还有一个顾顺章。但顾顺章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工人，因为其本人虽早年当过工人，但后来已做了职员。并且，顾顺章过去也并非工会组织的领袖，他只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负责人。

③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分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分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① 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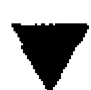
---

① 中心档案，514/1/811。

② 《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日。

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①] 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分？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主张鞭笞党的向忠发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分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

---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181页。

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分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①]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

---

① 在向忠发关于《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的报告》中，曾说明他离开上海前李维汉同意他“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共产国际进行工作，但在向忠发走后的一份中央常委会议记录上，却写明驻国际代表应“以中央委员身分”进行工作。这里从后者。

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① 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② 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 1928 年 1 月间，100 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③ 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分，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

① 参见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的报告》，1928 年 9 月 14 日，中心档案，495/18/917。

② 参见中心档案，495/154/343。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469～472 页。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分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与罗亦农和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

应的措施”。①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②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像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

① 《向忠发致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20日。

② 《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同斯大林、布哈林等谈话纪要》，1928年2月21日。

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 1928 年 3 月 7 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①] 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

① 中心档案，495/18/771。

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3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① 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

① 苏兆征秉性沉稳、不善言辞，共产国际东方部其实早就了解。因为在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十分频繁，但苏兆征实际上从来都很少发言。

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 1928 年 6 月 15 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①] 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 年 6 月 15 日。

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1]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分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 1927 年中共五大时，代表 82 人，工农分子仅 11 人，其余 71 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 84 人，工农分子即占 50 人，知识分子只有 34 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2] 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 6 月 17 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 7 月 10 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 年 6 月 15 日。

② 这些工人代表大多是从当时的暴动分子中挑出来的，多半只是看其勇敢与否。故周恩来有如此说法。另外，周恩来在一次回忆中提到的代表人数有所不同，称，六大时代表 75 人，工人占到 41 个。

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①]

向忠发并非傀儡

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

① 有关情况可参见《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39页注释；1985年第1期，第53页；第4期，第67～70页。

“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1]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一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2]

再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的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像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

① 《中央常委会记录》，1928年10月15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695~710页。

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①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躁、思想方法也较执拗，根本就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包括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如 1929 年 1 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

① 《中央常委会议》，1929 年 1 月 3 日、13 日。

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①] 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当然，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总书记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机会，也还有向忠发的作用。原来，李立三在六大时不仅不是政治局常委，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向忠发作出了开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的决定，为李立三迅速晋升开辟了道路。并且，当1928年10月4日政治局会议正式追认9月15日常委会关于解除蔡和森的职务的决定后，又是向忠发提议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的缺额。[②] 于是，在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回国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国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

李立三早年留学法国，政治活跃，思想敏锐，文字及讲话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

② 《中央常委会议》，1928年10月4日。

能力均较强。他从1922年起就长期从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各种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李立三一向较为偏激，1925年“五卅”运动中作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过指责。[①] 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作为中央代表，在处理暴动善后工作中又因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不顾事实地坚持要搞第二次广州起义而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六大中当选中委。[②] 基于这些情况，李立三在初任政治局常委职务时，还比较注意务实。他之所以能够得出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取得明显进展之类的观点，正是这时观察问题比较实际的结果。但想不到又被总书记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的事实上的肯定，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中共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③]

共产国际在1929年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正式传达到中国更是4个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发提出必须把反右倾当作唯一的任务，则是在1929年3月间，可算是有先见之明。作为党的总书记，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右倾危险，甚至宣布说左倾盲动倾向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自然只能使党的领导层日益左转。说李立三是在这种条件下日益左倾，当不为过。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

---

①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1页。

② 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6页。

③ 《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

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却不料，当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这真是天大的冤枉。①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当即提出了书面的抗议并上书国际控告远东局。② 但在处理与远东局的争论问题上，向忠发自知不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来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辨。于是，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将一切有关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统统委托李立三去处理。紧接着，因政治局确信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些隔膜，又派周恩来于1930年2月底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组织部工作亦交给李立三代管，从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现其才能的条件。

当然，“立三路线”要想形成，还需要共产国际“批准”。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惊天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正合向忠发的口味。恰巧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血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这一套革命设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爆发。因

①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2月。

② 《中央给国际的报告——关于远东局第十次全会决议对中国问题部分决议的意见》，1929年12月。

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①

不过，如果说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②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在向忠发的鼓励

① 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1930年6月12日。

② 关于共产国际文件上提到的"革命高潮"的定义问题，中共中央曾反复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参见《中共中央政治会议记录第8号》，1930年4月7日。

和推动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甚至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十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全国暴动计划，打算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组织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中共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到全国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 1930 年 6 月 11 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①

6 月 11 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却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此种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同时还要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

①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1930 年 6 月 12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卷，第 122～123，136 页。

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贯彻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①

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批评有根据地的发展的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割据”观念，断言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全面围攻，非有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不能巩固，结果只能得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非有苏联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不能真正胜利的观点。7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平行组织南京士兵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而以武汉暴动为中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正式出台，李立三不能不开始设想苏联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问题。但这样一来，不仅立即引起以陈绍禹、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回国学生的公开反对，而且再度造成与远东局的激烈争执。

7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

① 《向忠发致周恩来的信》，1930年6月25日。

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①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尽管在按规定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里，向忠发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丝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远东局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位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② 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

①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8月3、5日。

②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0年8月5日。

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① 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 8 月 5 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② 向忠发起草并属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

---

①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 年 8 月 6 日。

② 《中央政治局致远东局信》，1930 年 8 月 7 日；《关于立三同志发言的附件》，1930 年 8 月 7 日。

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责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①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覆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②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

---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局8月5日来信的决议》，1930年8月7日。

② 《远东局、中共中央联名给国际电》，1930年8月7日；《中共中央致斯大林同志的信》，1930年8月8日。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置。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①] 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

①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9月29日。

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 11 月 17 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 8 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①] 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 11 月 18 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 22 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 12 月 6 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 12 月 16 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②]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

---

①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11 月 16 日收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卷，644～655 页。

②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 年 12 月 6 日。

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惟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①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

---

①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38~39，129页。

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逞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

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①] 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

① 中心档案，514/1/821。

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绍禹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 36 个，其中工人占了 22 个，而这 22 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 1931 年 6 月 22 日被捕并被杀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 14 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1] 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

① 参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85 页。（本文收入此选集时曾做了较多的删改）

“左”倾路线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亡

按照中共党史上传统的讲法，自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就几度出现了“左”倾的情况。而这种“左”倾形成为一条完整的路线，在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完备的，则要自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算起。因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特别是 1931 年秋天以后成立的临时中央，基本上被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少数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留苏学生所把持，亦步亦趋地按照莫斯科的教条行事，所作所为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结果，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就是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自然也是它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年的历史的话，我们应该不难发觉，在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组成之后，过去曾经被忽视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一度也因此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酝酿多年，直到 1931 年 11 月才得以宣告成立，也与此不无关系。这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六届四中全会及其留苏学生干部的头上了事。就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而言，应该还有着比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重心转向苏区和红军？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有了一个较明显的转变。1930 年以前，由于几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始

终迷恋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相信过分看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是“割据保守观念”，因此投入的力量十分有限。包括对已经开始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农红军，中共中央也因其农民军队的性质而不那么重视。先是根据中共六大精神，使其尽量分散，后又出于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需要，要求其配合城市工人暴动集中攻坚，始终未能真正有意识地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军。

1930年春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中国新兴的红军及农村根据地，到这一年10月已经明确提出应当在有红军拱卫的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设想。[①]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也因此开始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大力发展红军、巩固地扩展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加强了对红军及苏区工作的指导。但是，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存在时间很短，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基本上还是由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逐步实现的。

四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得益于共产国际自1931年1月起的一系列电报指示。在这些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大力督促中共中央务必加紧选派得力干部到各主要苏区去，组成以集体领导的方式进行工作的中央局，同时务必成批输送军事人员及工人到苏区去加强其军队战斗力，改组其各级领导成分，且再三要求尽快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②] 因此，中共中央于2月以后不能不陆续从各大城市中选派了大批干部分赴赣西南、赣东北、湘鄂西、鄂东北、鄂豫皖等各个根据地，并按照国际指示，把60%的党务人才统统派遣到中央苏区去。

把大批党的各级干部和城市工人骨干派遣到苏区去，无疑对城市工人运动及中心城市的地下工作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电》，1930年1月15日，等。

响。但共产国际这时显然更寄希望于苏区红军的发展，而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相对长久的工作。至4月份得到的统计数字，全国党员总数除苏区外，仅有不足11500人，城市中党员仅4000人左右，其中工人党员不足一半，受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除满洲外，尚不足1000人。[①]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减少。上海赤色工会会员数从2月至4月不足两个月，就进一步减少了200余人，即从513人减少到只有300人左右。这样一来，由于工作的停顿、组织的分裂、干部的减少以及惧于对"立三路线"及"调和路线"的批判，思想方式更加僵化等种种复杂原因，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人斗争规模迅速开始萎缩，群众基础越来越小，以至渐渐党的工会组织已成为空架子，不得不在远东局的督促和资助下通过在工厂周围开办茶馆、夜校等消极方式，重新去接近和影响工人群众。与此相反，国民党仅在上海就已建立起120多个大小工会组织，他们通过支持各工厂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反帝斗争，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等等，动辄就可以发动起数千工人的示威游行。而共产党人却逐渐失去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各种条件，竟不得不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级党员干部及群众骨干冒险举行各种飞行集会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1931年，共产党在红军、苏区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几乎是同它在城市工作方面影响力的缩小一样明显的。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红军在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围剿"，歼敌数以万计，将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4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主

① 《李竹声关于四中全会后全国组织状况的报告》，1931年4月。

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1] 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国红军已达到 10 万人以上，其所控制的区域已有数万平方公里。

苏区的发展，无疑是以红军的不断巩固和壮大为前提的，而红军的巩固和壮大，也离不开苏区的发展，特别是离不开苏区有效的政权建设和正确的政策实施。没有苏区为依托，红军势将疲于奔命，难于长久支撑。没有苏区的发展扩大，及其有效的政权管理和正确的政策，在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愈来愈大的情况下，红军也绝难应付日渐加剧的物资需求和人员损耗。仅以江西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役为例，第一次红军伤亡约 2000 人，第二次即增至 4000 人，第三次更达到 6000 人，总计 12000 人。其中死亡约 2000 人，残废约 1000 多，并死亡军长一人，师长二人，中下级干部伤亡数目尤甚。而第一次战役时，士兵尚有每天 0.15 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费平均不足 1 元，加上医院费用，总计开支可达 25 万。但此役之后，伤病大增，兵员亦急需扩充，而筹款及物资却日渐困难，以至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 0.1 元乃至 0.08 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 18 万元。但即便如此，情况仍旧十分困难。加上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兵兴之后，宣告免收土地税”，“红色区域无款可筹”，苏区政权及武装月需约 30 万元全部要靠红军在敌人“围剿”间隙之际，向外扩张或到白区

---

① 通常史书均认为，至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江西中央苏区已扩大至 21 县，拥有 250 万人口（见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4 页，等。），但查苏区中央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后于 10 月 3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此时“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分尚是白色”。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 21 县中的其他如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宁化、清流、归化等，还全在国民党手中。电报称，对这些地区“须用一长时间去夺取他”。结合欧阳钦 9 月 1 日报告，似可肯定，此时除瑞金外，周围各县多数尚处于拉锯状态中，一时还未能成为真正的根据地。

去打土豪才能获得。而打土豪毕竟也是范围有限，数量有限，不能持久。可是扩张越多，政权、武装等各种消耗和负担越大。因此，红军及苏区最终还要靠自身条件来解决主要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共产国际过去曾反对红军集中，对建立和保持农村根据地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集聚了那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结果他们必然“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最终难免要和农民“发生相当的误会”。所以，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认为，必须将红军分散到各个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①] 然而，随着斯大林对中国红军作用逐渐重视，以及人们对中国革命特点的逐渐了解，共产国际在1930年以后明显改变了前此的看法，开始确信在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和集中红军一步一步向外扩张的方法，来推进革命，直至“以农村暴动包围城市（包括较大的和最大的城市）”，最后“由起义工人和红军去夺取这些城市”。[②] 而这样一来，在根据地大致建立起来之后，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的问题，自然应当得到格外的重视。

可以肯定，共产国际这时对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军事工作等等，都是极为关切的。自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提出把苏维埃政权立即建立到有红军拱卫的农村根据地去之后，它就一直在不断地催促中共中央尽快召集各地苏区代表会议推举代表，以便尽快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初，它甚至亲自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了《土地法令草案》、《劳动法草案》、《关于经济政策草案》、

① 见《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草案》，以及有关苏维埃组织建设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文件。① 同时，它还专门为中共中央军委派来了军事顾问，以便可以就近指导中国红军应付大规模的战争。

这个时候的共产国际显然没有再从它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那个角度考虑问题。在它看来，此时重要的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生存条件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地发展，即如何进攻的问题。因此，它这时似乎特别在意如何使红军及其政权正规化，以达到同国民党政权抗衡，和号召中国劳苦群众。所以，共产国际急匆匆地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却很少为之考虑应当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和建立必需的税收财政制度等重要问题。很明显，急于立即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着一种乐观的估计。在他们看来，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快就可以将分散的军事行动和零散的根据地统一集中起来的程度了。中国共产党也惟有如此才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形成巨大的政治号召力，进而准备同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因此，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一到上海，就立即支持中共中央提出以“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为“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②

1930 年底，注意到红军已经有能力进攻像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调集兵力发动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围剿”。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们也一度注意到形势的严峻。为此，他们在提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击溃敌人实力，以实现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中

① 上列文件分别可见于 1931 年 3 月 9 日和 9 月 7 日的《红旗周报》第 1 期和第 15 期等。

② 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设想，最早是中共三中全会提出的。但把它作为现阶段“中心任务”，却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起草《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时公开宣布的目标。

心任务的同时，也一再叮嘱红军务必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如"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策略"。"我们要红军主力军打破游击主义的传统，但我们决不是主张放弃游击战术的运用"。"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尤其不应忘记，"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据此，他们甚至预先就为主力红军放弃现有根据地安排好了退却的方向和地域。[①] 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现实的。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的偏远地区存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的和地理的背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多数地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便利于造成割据的局面。而由于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这种情况仍未发生太大的改变，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或致力于争夺中央政权，或致力于防卫某交通要道及城市，很难有更多的实力把其统治伸入到其

① 分别见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起草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分函》，1931年3月2日；《中央对苏区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

所占区域的偏远角落，这就更进一步为共产党人进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①

但是，在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仍有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根据地虽处于几省偏远地区，但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国家整个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势必要以大力加以清剿。这就使得根据地和红军不能不经常处于战争之中。其次，由于敌人志在必得，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势必不断扩充，而根据地亦须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员及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但根据地越扩大，必然越接近交通干线及主要中心城市，从而更加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愈发扩大和残酷。如此则必然形成恶性循环，迅速造成总决战的局面，使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无必要的回旋余地的红军很快陷于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使红军保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以"保全红军实力"为原则，而不以死守一地为原则，确有重大意义。事实上，过去红军正是在这样一些军事思想指导下成功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自从共产国际三番五次地主张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付诸实施之后，继续着重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很快就变得不那么现实了。因为，所谓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就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而所谓苏区、根据地等等，实际上也就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现有的区域和领土。土在国存，土失国亡，人们因此很难再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了，一切都难免要政治化。红军的进退胜败，将不再是军事问题或实力消长及存否的问题，而将成为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也就是说，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

① 毛泽东1928年11月2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特别谈到过红军割据与中国分裂、军阀混战这一特殊背景的关系问题。见毛泽东：《井岗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页。

会使红军和苏区，特别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被一种政治的和地域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渐渐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政权和国家观念的提出，还必然要激起人们进攻和决战的强烈心理，从而再度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情绪，以至日渐对形势发展、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阶级关系的状况等等，发生“左”的估计。

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责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同时，明显地开始主张改变前此军事上的灵活策略，要求红军必须“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必须致力于“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即使红军在其它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必须以坚壁清野和群众游击战争的办法去困扰敌人，抽调出红军主力“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①

8月30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还没建立”，红军“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时，依旧主张“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它宣称：“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而其解决军事危机的办法，却是什么“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愈加紧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才愈能加强”，从而“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

---

① 《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1930年6月16日。

进”。而只要群众都自愿地投身于革命战争，就不愁打不败敌人。[1]

就在中共中央雄心勃勃地重新主张占领一两个顶大的城市之际，国民党两广军队联合发动了讨蒋战争，日本关东军又悍然攻占了东北沈阳等地，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也受挫而终，虽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这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临时中央宣告组成，但是，由年仅 24 岁、刚从莫斯科回国不到一年的留苏学生博古领导的这个新的权力机构，进攻的欲望明显较前中央更强。他们更是充满激情地声称：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赶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胜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2] 很快，他们抓紧指导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酝酿已久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赶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 11 月 7 日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3]

苏维埃中国的成立，无异于向国民党中国发出决战和进攻的政治号令。临时中央宣称：目前客观形势“极端胜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黔边苏区“完成

①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卷，第 355 ~ 375 页。

②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日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卷，第 401 ~ 415 页。

③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瑞金召开，会议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保守和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①

应当看到，临时中央这时提出的"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并不完全是对突出强调城市中心论的"立三路线"的简单复制。他们至少暂时还没有走到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地步，还没有像李立三那样坚信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必然紧接着全国总暴动乃至引发世界革命，还没有妄乎所以到命令红军可以离开根据地去夺取大城市。他们并且还注意到"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绝不是（只要）客观形势的发展，不需要主观力量"，注意到没有无产阶级大多数在我们手里，我们便不能引导群众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他们同李立三一样，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简单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极端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把世界经济形势的动荡，中国民族情绪的激昂，以及红军反"围剿"的暂时胜利和苏维埃全国政权的建立，统统当成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即将死亡的证明和依据。

---

① 《中央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536～543，544～549页。

“十月革命”降临了?

这时，最让临时中央感到振奋的因素有二。第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严重经济危机。“1929 年美国的债券价格指数约为 200—210，1932 年已下跌到 3—40。同时期商品价格一般下跌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世界上主要工业制造业国家的生产，各种制造品都缩减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 1932 年的世界贸易值只及三年前的三分之一”。[①] 这一空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共产党人看来，不仅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共产国际“六大”所指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预言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而且似乎到处推进着革命高潮，使“深刻的革命危机”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也“迅速成熟”。[②]

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悍然发动了夺取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民众掀起的空前强烈的反日运动。这场以罢工、罢课、抵制日货、进京请愿、组织反日团体和广泛宣传抗日主张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反日运动，与蒋介石南京政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的公理判决”的解决方针相矛盾，因此不断与南京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出现了捣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和殴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等重要官员的情况，许多重要城市陷于混乱，就连蒋介石也被迫辞职下台。[③]

---

① L.罗宾斯：《1929—1934 年的大萧条》，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72 年版，转引自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7 页。

②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3 册，第 255 ~ 256 页；并见《博古关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的报告》，1931 年 12 月 18 日。

③ 见《申报》1931 年 9 月 27，28，29，30 日，12 月 10 日；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 1 卷，第 423 页。

这种情况自然也被临时中央看成是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的重要标志，他们深信：群众斗争已经“走上了直接反国民党的冲突”，统治阶级的崩溃正在到来。①

不能否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给了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共产党人一个大好的宣传时机。而由于日本人侵中国东北三省，群众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尖锐对立，也存在着引导群众走上反国民党的革命道路的某种可能性。据 1932 年 2 月中共上海党组织统计，此前上海有党员 700 余人，至 4 月统计已达 1200 人左右；至 10 月统计，竟增加到 2726 人。可见这一阶段革命的影响确在急剧地扩大。甚至，由于南京政府的内战政策和排斥异己的作法，相当一批国民党人也开始同蒋离心离德，冯玉祥等人并且还秘密与共产党人联络，一些高级军官也密谋发动以联共抗日反蒋为目的的兵变。这些都使苦于应付国民党强大军事压力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某种转机。但是，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既不准备利用各种反蒋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屑于接过中间阶层的“停止内战”的口号来打击蒋介石南京政府，争取和团结更广大的民众。他们甚至于固执地认定：“一切国民党的派别，都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与屠杀民众的能手”。而所有中间阶层及其在野派别，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②

对于临时中央“九一八”事变以后所采取的策略，共产国际显然是支持的。不仅如此，当 1932 年 1 月 28 日上海事变发

① 《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1931 年 11 月 15 日；《博古关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卷，第 512~523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 年 1 月 1 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 年 1 月 9 日。

生时，共产国际甚至头脑发昏地认为另一个十月革命的情景开始在中国出现了[①]，因而把外国入侵当成了共产党人推翻国民党政权，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大好时机。尽管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并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支持，战争打得异常惨烈，临时中央却号召劳苦群众立起革命战争，“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十九路军的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并且断言：“要救中国，要救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②]

在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号召群众乘机四处夺取武器，向国民党及其军官发起袭击，无论如何是让人难于理解的。上海部分地方干部显然对此表示消极。他们明确认为，在十九路军作革命战争时，各区不应发动斗争，否则将成为捣乱后方。共产国际表面上似乎也不主张发动那些可能妨碍十九路军作战的工人（如铁路运输工人）起来斗争，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③]与这些‘抗日军官’的个人的口号”，不主张在战区内发动兵变，但是，他们却十分郑重地主张立即在全国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进而组织全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指示里，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此时希望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他们同样相信国民党及其军

---

① 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对外战争严重失利的情况下爆发的。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96~99、100~102页。

③ 蔡廷锴，即“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十九路军军长。

官是不可能抗日的，因此共产党人将很容易利用“士兵群众不再服从投降的军官及一切民族情绪之高涨”等条件，“打入军队”和“争取士兵群众”，以至建立起武力拥卫的革命政权。[1]

据事后统计，“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共共组织义勇军约700人，有长短枪不足100枝，送入十九路军约100人，但多半从事于运输工作，党员及宣传很少能接近前线和士兵。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确想抓住士兵工作，进而组织起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扩大成为武装暴动，最终成立苏维埃政权，结果却一无所成。至3月2日十九路军退却后，中共虽宣告成立过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义勇军去闸北和南市去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也纯粹只是纸上谈兵。十分明显，事情并不像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主观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泾渭分明，更不像他们计划的那样容易实现。然而，这仍旧不能使他们考虑问题变得多少客观一点，复杂一点。他们依旧武断地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来欺骗士兵和民众，造成马占山[2]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3] 而当十九路军被迫后撤后，他们更进一步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

①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608～609页。

② 马占山，前东北军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最先率军抵抗日军于嫩江桥，受到全国各界的欢呼。

③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胜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142～145页。

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正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十九路军的兵士撤退”，去攻苏区，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同时“要日本军事用到满洲去进攻苏联”。尽管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去做士兵工作，他们仍旧四处散发传单，呼吁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1]

由于日本方面此时尚无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计划和准备，在十九路军被迫后撤后，上海的战争很快就停止了。这样，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所希望发生的种种革命性突变，也自然失去了凭藉。相反，他们又开始相信，停战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日本加紧“反苏战争”的步骤，并会同列强“占领上海，及广州、汕头、汉口”，以便“包围及封锁中国苏维埃”。[2] 可是，这似乎也并不能使他们感受到多少压力。共产国际在其8月初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中国红军必须注重夺取诸如南昌之类的大城市，以便（1）使革命进到更高阶段；（2）使敌人失去进攻苏区的基础；（3）使城市与农村经济流通。而临时中央也开始大批特批所谓“对于国民党统治过分的估计，与对于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宣称那些“以为中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断言中国革命实际已不存在革命发展不平衡，之所以存在着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的不平衡现象，纯粹“是由于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薄弱与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决死斗争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就是“必须绝对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

---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② 《德法英美捷波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保卫中国革命及苏联告工人劳功群众书》，载《红旗周报》，第34期，1932年4月1日。

倾向做斗争”，同时“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①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对日宣战，但其真正目的却是要以此号召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② 临时中央明确认为：“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是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③ 而临时中央的指示到了苏区中央局，也就变成了“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更加直接和大胆设想了。④

莫斯科的信号混乱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取得极大的发展。至4月，仅江西苏区面积已达约70000平方公里，跨有18个县的范围，并占有

① 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红旗周报》第37～38期，1932年4月25日。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636～638页。

③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220～222页。

④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209～219、240～261页。

七个全县及县城，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1] 加上闽西苏区近10县，总共已有面积近100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300余万。红军甚至一度占领了福建重镇漳州，把自己的势力伸向了沿海地区。与此同时，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但是，苏区的这种发展既不表明红军已有夺取中心城市的能力，也不表明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面转变。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宁粤双方重新和解，国民党的力量已变得更加强大。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国民党人这时疲于应付日本军队的入侵分不开的。[2] 而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刚一签字，蒋介石便立即调集大军，重新开始策划第四次“围剿”。[3] 由于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仍旧盲目坚持所谓“积极的进攻策略”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均先后被国民党军队攻占，两部红军被迫离开湘鄂豫皖这一要害地区，退往偏远的川黔一带重新开辟根据地。中央苏区则因国民党最初军事进攻的重心在鄂豫皖，中共军事领导人继续保持了机动灵活的战术特点，再加上随后日军攻陷热河并试图大举攻入长城，国民党被迫分兵，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但是，在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被敌各个击破之后，不要说继续坚持进攻策略和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继续保持中央苏区的存在，在军事上也是很少可能了。这是因为，无论从

---

① 见《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内称已占有瑞金、兴国、云都、寻邬、会昌、石城、宁都、广昌“七个全县，七个县城”，并跨有赣县、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乐安、安远、南丰、宜黄等“十八个县的范围”。

②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二），第280～282页。

③ 蒋介石5月21日就任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并前往庐山亲自部署第四次“围剿”计划。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发，还是从其巩固自身，统一中国，以及建立“自强的空间”的战略设想出发，国民党都已决定要以共产党为“最大而且最近的一个敌人”。[1] 在1932年12月，蒋更进一步宣称：“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肃清赣匪，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因为“强国之国防，重边陲，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中国必须“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如今则首先必须统一长江流域，以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苏区所在之处，恰是蒋介石所谓的“中心的区域”和“中国的中枢”，因此国民党是志在必得的。[2] 即便日军进犯华北，蒋介石只要有可能对日求得暂时妥协，也势必会集全力对中央苏区作最后的打击，以期完成其建立所谓“自强的空间”和统一长江流域，进而统一中国的计划。特别是在第四次围剿之后，不仅中央苏区已失其倚角之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大苏区，更形孤立，而且中央苏区本身也日陷于被分割和封锁之中[3]，在国民党军力更加集中和强大的情况下，蒋介石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所谓总体战策略，显然会对中央苏区构成更为严重的军事压力。

对于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没有共产党人看出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公开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

---

① 转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708页。

② 转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676，747页；《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蒋介石：《剿匪的成败如何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1932年6月22日。

③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中央红军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有吉水、峡江、兴国、乐安、宁都、石城、云都、会昌、黎川、建宁、宁化、连城及瑞金。比较1932年5月情形，可知中央苏区面积已缩小约一半，并已遭严重分割。

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广东军和十九路军[①] 的欺骗宣传怎么会不发生效力呢?面对这种情况，就是“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②]

共产国际自然不可能了解苏区群众的心理，他们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他们也已清楚地看到，红军不仅还不具备向城市进攻的实力，而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也只能处于战略上的守势。为此，他们开始反复告诫中共中央："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因此，必须“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他们批评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进攻南昌等大城市的总战略，认为现在只应“力争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对大城市，在具有足够的力量和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包围的策略”，但目的也仅限于扰乱敌人并把它的军队从苏区诱开”。因为他们确信，依照红军目前的力量，红军首要的任务只能是设法“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而不是向外进攻。他们甚至委婉地对鄂豫皖苏区红军放弃原有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赏，鼓励人们必要时向西退却，声称“扩大四

---

① 十九路军1932年5月下旬即被调往福建剿共前线。

② 转见《中央局关于寻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斗争》第8期，1933年2月12日，等。

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①

最足以证明共产国际较临时中央要现实一些的，是它这时破天荒地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这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在这些以中共中央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起草的文件中，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旧在重复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② 但与此同时，它又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声称可以公开提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宣言在此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尽管共产国际提出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打破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但它毕竟注意到中国党此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意识到只有重新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才有可能使共产党人适应中国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满洲这一特殊环境，他们甚至提出了“一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 年 3 月 28 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 年 4 月 14 日。

②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卷，第 21～45 页。

利的前途”的策略方针。[1] 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又重新开始具有了某些灵活性。

很难简单地断言，究竟是哪些原因促使共产国际又重新拾起了统一战线这一实际上早已被摈弃的策略武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共产国际已经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仍旧处于劣势，远未争取到广大群众。“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说明绝大多数群众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还相差甚远。如果说人们并非完全站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一边呼吁统一和平的话，至少多数群众是主张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斗争，国共冲突让位于抵御外侮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固然不得人心，共产党的“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样难以发生宣传效力。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接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让顽固坚持反共宣传的蒋介石国民党成为众矢之的。

共产国际的这一策略，即使仅仅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对于正处于严重军事危险之中的共产党人和苏区红军，应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三条件”宣言，若能付诸实施，必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分化乃至混乱。不论这在实质上是否有利于抗日，但显然有助于共产党和红军暂时摆脱危机，以至利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联合一切不满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剿共战争的党派团体，动摇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可是，仅仅根据“三条件”之类的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乃至共产国际远东局，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

---

①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 年 1 月 17 日；米夫：《中国革命危机发展中的新现象》，《共产国际》第 4 卷，第 4～5 期，1933 年 5 月 31 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 年 1 月 26 日。

还在1932年12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到共产国际要他们搬到中央苏区去的电报指示，开始分别动身前往苏区了。新设立的上海中央局负有同远东局联系的使命，但由于交通及通讯不便，对白区工作的指导乃至整个党的指导工作，实际上都由远东局承担起来了。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然而，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来指挥中国革命，结果也并不比临时中央在上海时好多少，有时甚至可能更糟。中央苏区乃至苏维埃革命最后的一线转机，就葬送在了他们手里。

苏维埃国土的沦丧

1933年初，冯玉祥因不满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试图以抗日为号召重新聚集旧部，开创局面，故与中共北方特科秘密结盟，并组成了作为共同领导机构的工作委员会。鉴于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冯迫切希望苏联再度从外蒙给予援助，因而对中共人员的帮助和意见极为重视，甚至愿意“由我们党来主张一切的办法，他绝对服从”。[①] 8月初，冯玉祥正式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提出的《抗日同盟军纲领草案》，并经过中共人员的具体帮助，在5月26日正式于张家口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由冯就任总司令。

从中共北方党组织最初的策略看，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苏维埃和红军的前途，但其开始毕竟意识到应以抗日为号召，以“抗日反蒋”为手段，联合可能反蒋的国民党军人，“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发动和扩大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战争”。尽管他们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同盟军

---

① 《马同志关于张家口事变的经过报告》，1934年1月30日。

的直接作战目标只能首先“严重打击蒋和张（学良）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但提出联合反蒋派“推翻蒋介石”的策略思想，至少对分裂国民党、打击蒋介石，缓解中央苏区所面临的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压力有利。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这样一种试图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统战策略，在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那里也不能通过。尤其当抗日同盟军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下，不顾一切，首先挥师北上，恢复失地之后，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局竟以中央名义对这一作法接二连三地提出批评，声称：第一，组织抗日同盟军必须以“在华北创建新苏区”为目的，故军事上只能向南移动，“不能与日本军队作战”，否则不便于提出攻打南京政府的口号和使其与南京政府的军队进行战争。而“不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则我们反对日本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是不能胜利的”。第二，不论冯玉祥、方振武，或吉鸿昌对抗日和革命有何种忠诚的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我们的敌人”，至多只是“比较有远见的敌人”，他们之抗日，既是同蒋在帝国主义面前争宠，更是借此来发动“争夺北方领导权的新军阀的战争”。因此，对这些上层领袖不能有任何信任，应把工作重心放到下层士兵群众中去，发动士兵群众进行“反冯及其他反动军阀的斗争”，孤立冯并打击冯，甚至举行以兵变为中心的暴动，逮捕冯和其他的要人。② 结果，冯玉祥联合共产党抗日反蒋，反遭共产党人的孤立与打击，苏联也不予援助，并且斥责其有意挑起苏日冲突。冯终于走投无路，不得不

---

① 《关于抗日同盟军纲领等问题的报告》，1933 年 3 月 10 日。

② 《关于抗日同盟军纲领等问题的报告》，1933 年 3 月 10 日；《中央给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1933 年 6 月 13 日；《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 年 7 月 3 日；《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 年 7 月 17 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八一”宣传大纲》1933 年 7 月 5 日；《中央八月份第一号指示信》，1933 年 8 月 5 日；《中央八月份第二号指示信》，1933 年 8 月 9 日。

在8月初被迫重新宣布下野。冯去后，抗日同盟军立即分崩离析，共产党最后一无所成。

就在抗日同盟军举事不久，秘密准备与中共及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的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远东局及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等，先是指示上海中央局拒绝了蔡廷锴的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继而在明知十九路军有联共企图的条件下，下令中央红军组织东方军，乘蒋介石为应付抗日同盟军尚无力南下，广东方面亦因与蒋矛盾重重，不会主动进攻的机会，转而向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了攻势。至9月下旬抗日同盟军濒临失败，蒋介石重又聚集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远东局才终于明白十九路的利用价值，因此不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尽快与十九路军达成停战协议，以便抽调东方军回防。

但是，远东局和临时中央依旧把这些决心公开反蒋的将军们，看成自己的敌人，害怕他们与自己争夺群众，因而不仅不对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抱以希望，而且同样主张用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对付福建事变的领导者及其将军们。① 11月下旬，福建十九路军开始受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后，红军亦只是受命"假装帮助十九路军"，实际上却乘人之危扩张根据地。到1934年1月中旬，十九路军已陷于内外交困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临时中央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争取其最大部分群众和武装的行动原则，主张发表宣言和口号，"使十九路军哗变"，"用暗杀的方法，瞒着十九路军指挥者，解除不可靠

① 见《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电》，1933年6月13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方面军改变原作战计划的意见》，1933年7月；《中央关于同十九路军谈判的指示电》，1933年9月27日；《中央关于迅速与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的指示》，1933年10月；《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1933年11月18日。

的部队的武装”，把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拉过来，等等。[①] 然而，随着十九路军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迅速瓦解，不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企图乘人之危，从中渔利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中央苏区更是彻底暴露在南京政府军队的攻击之下，使红军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当然，红军及中央苏区之失败，并不仅仅取决于上述政治谋略严重失误之一点。实际上，这时苏维埃政策及中共军事指导方针各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客观形势也极端不利。特别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机械的阶级关系分析法，不能面对敌我力量极端悬殊这一严酷的现实，从实际出发为自己寻找出路。他们机械地把政治上的分野看得高于一切，盲目追求革命的彻底性而反对任何一种妥协和退让，竟至极端主观地相信敌我力量的对比主要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其对阶级力量的估计，又简单化地只是从形式上对立阶级双方人数多少上来看问题，进而相信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切基于阶级革命的政治工作，都具有鼓动和吸引广大劳苦民众为自己的政权而奋斗的神奇效力。因此，尽管国民党大军深入，苏区实际面积锐减，他们还是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荒谬口号，并且大搞“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复分田、查田，一再打乱阶级划分，以明确所谓阶级路线，同时还在军事上提出了“保卫苏区的每寸领土”，“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划地为牢的纯粹防御战略，雄心勃勃地摆出了一副一战“决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生死的斗争”的架式，自信“民众的革命力量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与一切现代武装所不能战胜

---

① 《中央局关于今后任务的指示》，1934 年 1 月 8 日；《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的意见》，1931 年 1 月 20 日；《中央局关于抵御福建军阀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策略》，1934 年 1 月 20 日；《中央局转发国际对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的意见》，1934 年 1 月 26 日。

的力量”。[1] 然而，1934 年 3 月中三溪圩、三坑作战，一、三军团损失 2200 余人；4 月一个广昌保卫战，红军主力一、三、五、九军团 30000 余人，竟损失约 5500 人，至 8 月高虎垴、高兴圩一战，三、五军团又损失约 2300 人。[2]

还在 1933 年 10 月，因为信不过中共领导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军事总顾问已经为中央苏区派来了一个中文名叫李德的德国人。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几乎全是在那位驻在上海的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这个德国人的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对共产国际领导的驯服和迷信，使临时中央政治局把一切军事指挥大权统统交了出去。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失利，特别是有通往红色首都瑞金门户之称的广昌失陷后，终于使博古等人开始意识到敌人的强大，并多少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权威性开始有所动摇。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博古等人虽开始秘密考虑撤出苏区问题，但各种策略方针仍无丝毫变化。相反，越是形势紧迫，他们的“左”倾作法越变本加厉。自 5 月以后，其不仅极力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没收征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一再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变相克扣农民，以应战争之需。据不完全统计，自 1933 年底至 1934 年 9 月，中央苏区共征新兵 10 余万，发行公债 300 多万，强行“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约 100 万。

① 《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案》，1933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1933 年 6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对北面军分区的密令》，1933 年 8 月 12 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1934 年 2 月 1 日。

② 参见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中央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2～506 页；蒋纬国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第四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2 年版，等。

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1] 特别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在群众中更造成严重影响。至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岁—55岁左右），仅当兵、作挑夫及出外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2] 若以200万农民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至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3] 而一面竭泽而渔，一面又极力加剧内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20天内即在1512家里查出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4] 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均被强行编入永久劳役队，或“驱逐出境”，或“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均遭没收。由于大批中农不可避免地被错划为富农或小地主，从而造成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以至连田也宁肯荒掉的恐慌情绪。[5]

1932年7月1日，天津《大公报》曾有则社论这样说：

---

① 见陈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1933年7月22日；《财政人民委员会林伯渠关于二期公债的谈话》，《红色中华》报，1934年5月24日；《红色中华》报，1934年7月5日，8月8日，5月3日。

② 包括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可知苏区乡村中男劳动力所占人口比例约为25%左右（长冈乡407：1785；上才溪554：2318；下才溪765：2610），外出工作及当红军者已占70%～88%左右。

③ 关于1933年底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人口总数，很难有确切统计，初时或有200—300万人口，广昌失守后实已大大少于200万，即以200万为平均数，青壮年男子也只有50万左右。故若以农村男劳力外出80%之数计，可知再征兵10万，从城乡两方面人口数看，也已无法承担了。

④ 《红色中华》报，1934年7月5日，8月8日，6月8日。

⑤ 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34年6月。

"共党占地，首重分粮分田，故贫民趋之。然战斗无已，生产不兴，粮尽后则如何？此事实问题也。是以共党之飘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军事上之避冲，实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国现在之经济环境下，共党苟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区域，外无战事，内有建设，则其势力不足久支，久则穷矣"。[1] 这种看法虽过于简单武断，但其说确实抓住了红军及苏区生存的两大基本要件。即第一，土地政策；第二，游击战争。前者使自己在贫苦农民中得以立稳脚跟，获得兵源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种种支持；后者则可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免强敌所击，同时通过打土豪及四处筹款的办法来维持战争所需，不致过分挤压农民。固守一地，不论所在地区富庶与否，在敌我各方面实力相距甚远的情况下，终必造成竭泽而渔，殊求无已，生产不兴，人心背离的局面。而即使内部政策对头，军事上策略灵活，在国共双方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苏区和红军的存住，尚须有赖军阀割据局面的长期存在和统战策略的灵活运用，通过纵横捭阖的策略手腕来不断扩展自己的阵线，以保证自己有足以和对方抗衡的实力。可是，临时中央这不仅划地为牢，竭泽而渔，而且外拒友邻，为丛驱雀，这当然要走到捉襟见肘，内囊掏尽，弱不抵强，失土亡国的地步。

1934 年 7 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 7 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紧迫。为便利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做退出苏区，向西突围的准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开辟苏区，以此调动敌军并减缓其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随后又命令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并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为保证突围的高度机密

① 《大公报》，1932 年 7 月 1 日。

与安全，李德、博古等突然变得极其小心，他们不仅向外界，而且向党内，包括中央政治局严密封锁消息。他们还把干部分为几类，除必须带走者外，决定把其信不过的干部，如瞿秋白等留在苏区，对他们怀疑可能成为隐患者，则干脆下令杀掉。于是，相当一批红军学校教员、被俘军官，和各种人等被秘密处决。与此同时，他们在公开场合，乃至在军事干部会议上，仍旧摆出一幅准备死拼到底的架式，要求部队按计划与敌决战，要求地方务必再送3万名新战士上前线去。① 然而，除粮食尚可暂时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等各种物资供应这时已完全陷入绝境，甚至民心也开动动摇，仅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至上万人之多。② 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的军事政治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万多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从瑞金及其附近那些村镇和尚未被炮火摧毁的堑壕中、掩体中涌了出来，极其秘密地向西潜去。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银行、医院、印刷厂等等渐渐远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地图上消失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只存在了1070天。但是，为了这个“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的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却已经历时七年。七年的暴动、战争和流血牺牲，以数十万人的生命所换取的成果，竟至毁于一旦，这当然

---

① 《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1934年9月3日。

② 参见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军委总参谋部第五局局长及军委动员武装部长杨岳彬叛变后的文章。载《申报》1934年10月13日。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第154—158页所列表格可知：除苏区危机阶段普通士兵有所动摇外，这段时间白区中共党员中动摇者也较以往成倍增加。如1931—1933年秋，各地中共党员自首者仅276人，而1933年秋—1934年9月，除被捕4505人外，自首者就达到4213。

是一种悲剧。然而，更大的悲剧却在于，那些匆匆离去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这时还不知道失败的原因所在。还必须等到西征中遭遇更大的惨败，党和红军的生存也陷入到更为严重的灾难中之后，才会逼出一个遵义会议，出现一个历史的转折。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蒋抗日"方针

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是否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个问题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起过相当热烈的讨论。许多人相信，既然遵义会议已经召开，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中共中央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当然不会再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人们甚至认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如果还有什么影响的话，也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右倾投降式的影响，因此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一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抵制和反对其错误影响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什么关系。①

198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其中首次公布了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问题所发出的一批重要电报指示。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在1935—1937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仍旧深受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不仅众所周知的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制定的，就是1936年所谓"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确立，事实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那么，中共中央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呢，其意义如何，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

① 在这方面，向青教授的文章和著作有一定的代表性。

无法回避的事实

▼

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和联蒋抗日，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严格地说，它在1936年上半年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把抗日与反蒋并提，实行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并举，存在相当的矛盾性。为此，中共中央也尝试着做了一些宣传手法上的改变。但是，根本方针的改变，仍然是1936年8、9月间的事情了。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实行这一重大的策略方针的调整，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的政治指示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汇编》公开发表了这封电报，注意一下此后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转变策略方针的指示和决议，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确立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问题上，确实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对此，只要把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的内容，与中共中央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9月17日《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的内容加以对照，就可知道，后者的基本内容都是依照前者的指示而来的。后者的一些重要文字甚至也大段大段地由前者直接摘引而来。[①] 这说明，中共中央是在得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后，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批评和建议的基本内容，起草和制定自己关于逼蒋和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更进一步的证明。

---

① 如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第四、五、九、十部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第一、二、五部分，几乎全部抄录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的前3点内容。

1936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后，致电在外地的红军主要领导人称：今后“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①] 紧接着，中共中央在9月8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说明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精神和中央依照国际指示决定根本变换前此方针的意图。[②]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对照国际指示全面检讨过去统一战线的工作，确认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承认自己以往在对联合蒋介石抗日问题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就前此抗日反蒋口号和在西南事变问题处置上的错误，发出了自我批评的通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曾对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发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包括（1）根本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明确推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必要性；（2）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使之成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党派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和权力机关，统一指挥抗日战争和协调党派关系的新设想；（3）突出强调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和军队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纯洁性，防止自身统一和团结遭到损坏的各项原则和具体方法。

---

① 见《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1936年8月20日。

② 见《洛、周、博、泽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8日。

不容否认的局限

应该承认，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对中共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共中央为此进行自我批评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因为，问题确如季米特洛夫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所说："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① 按照"抗日反蒋"的方针去工作，是不能够迅速达到把全国90%以上的人口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个目的的。坚持"抗日反蒋"就意味着"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意味着要把蒋介石及其指挥下的军队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意味着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主要力量和主要工作首先放在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上，放在与各个反蒋派别结成局部统一战线，诸如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方针上来，这当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尽快造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

但是，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忽略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当时在陕甘北部地区的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进攻，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如何抗日的问题，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蒋介石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生存问题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问题放在首位。也只有使自己真正具备了足够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显示出足够的实力，才能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坐到谈判桌前来，才有团结抗日的可能；其二，为中共规定

①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抗日反蒋”的统战策略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基本任务的，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本人。被共产国际视为有重要错误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根据张浩传达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而中共中央1936年初陆续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也表明，共产国际仍旧坚持着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显然，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反蒋”的决定和“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决定，以及扩大苏区、发展红军和联合反蒋势力的作法，都是符合共产国际当时的要求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中共中央，都并非不想与南京方面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但一来事情由不得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二来要坚持苏维埃革命及其政权形式与军队形式，甚至试图以苏维埃为中心，蒋介石也决不会答应。因此，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尽管都曾秘密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了政治接触，结果却令人失望。[①] 他们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抗日人民阵线”的主张，也因此成为幻想。

在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其实远较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要实际得多，他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实力和特长，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组织西北大联合和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之初，就明确主张按照实力原则推举张学良为未来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在接到共产国际必须与南京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立刻“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但是，弱小的共产党要同强大的国民党达成真正的协议，他们必须作更多的让步。在这方面，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表现出脱离实际的缺点。他们盲目地认为，只要“正确地加以扭转‘中

---

① 有关这一时期秘密接触的情况，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

共’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具体地规定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军事原则，提出比较可行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使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就足以“动员全国舆论”，使一切爱国者拒绝“剿共”内战，从而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仍然幻想要取消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心地位，通过普选来召集新的“中华全国议会”，通过这样的广泛代表民主力量的国民议会继续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解决土地问题”，并成立真正代表各个党派组织的新的“全国国防政府”，进而在全国实行区别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制度。[①] 他们还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主张“可以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可以据此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②]

极其困难的选择

共产国际 8 月 15 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

① 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 年 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 年 8 月 15 日。

② 参见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救国时报》1936 年 9 月 18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36 年 7 月 23 日。

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

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有天壤之别，而需要变化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问题的认识。从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后最初发表的文件看，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他们确信，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以此来动员全国舆论，将有可能“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否定国民政府及其所谓“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实现“继续巩固苏维埃”和“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的目的。[①] 在上述文件里，唯一与共产国际有所区别的仅仅在于，中共中央认识到了实现以上任务的极端艰巨性。为此，他们不得不突出强调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要造成一种运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面，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思想，准备继续坚持对南京政府政策的批评态度，同时保持与各反蒋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联合，试图以此来作为巩固自身实力和促使南京方面作出妥协的重要筹码。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想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必须正视国民党人提出的条件，采取更为实际的步骤。

1936 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为与国民党进行比较实际的谈判，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该草案中，中共中央虽继续主张“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进而组织“民主国会”和“民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

① 见《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卷第 77～78、79～91、92～99 页。

国”，但对于妥协基础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却明确表示可以接受用国民政府已有的“国防会议”的形式来替代。而在具体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方面，中共中央更是明显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作出大的让步。草案公开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①] 这一态度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指示所要求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尽管仍抱有希望，甚至仍旧认为有可能促成“民主国会”、“民主政府”之产生，但是，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认识到，根据目前的实力对比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决不可能平等的。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②]，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革命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③] 但是，由于此后军事形势的骤然恶化和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约8万人在甘北会师，但为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军事援助而组织的“宁夏战役”却因

---

① 《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3页。

② 《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1月8日。

③ 分别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1936年9月22日，《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

种种原因而告失利。面对蒋介石重兵“围剿”和粮食、冬装以及军用物资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进一步下决心向国民党让步，一面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转战内地，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在11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开始考虑不再以“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谈判协约之前提条件，准备接受国民党侧重于军事统一的办法，承认改编红军接受蒋介石指挥，以消弭战祸，保存实力。

中共中央此时了解到的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条件，是张子华10月中旬由广州面见国民党方面代表曾养甫后自己归纳的4条。即（1）党可公开活动；（2）政府继续存在；（3）参加国会；（4）红军改编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中共中央认为，可照此条件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电已赴上海之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请其立即依此条件与国民党方面负责人谈判。① 同时准备必要时派周恩来前往南京，以求加快这一进程。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重大的让步，共产国际显然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而面临如此严重的军事局面，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他们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认为在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条件下，国民党人的谈判或者是一种特务手腕，或者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在红军问题上所作的让步。但他们告诫中共中央；必须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并且只有在对日武装作战的情况下，才可以同意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的总司令部。而红军接受其指挥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可照曾谈原则协定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13日。

对日作战计划才可以服从统一指挥。①

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很快对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发生了影响。由于这时军事形势极端不利于共产党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决心一时陡增。他一方面准备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也咄咄逼人，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实行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并限制红军改编后的总人数，否认谈判双方的平等地位。② 中共中央显然难以接受在军队改名以外的其他要求。红军此时已退到甘北与陕北交界之盐池、定边、环县一线，甘北基本丧失，陕北苏区亦大部陷于敌手并遭敌军分割，现有地区已难以维持生存，万一定、盐一线不保，后果难以想象。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准备实施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的最后方案，一面接连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其指示解决办法，同时则力促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设法阻止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③

显而易见，此时中国共产党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蒋联合；二是利用与张学良、杨虎城秘密结盟的关系，策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共同创立西北独立局面，并争取阎锡山、傅作义两部之同情；三是分路突围，转入内地，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以保存红军主力。但第一条道路被蒋介石堵死了，第二条道路共产国际又不赞成，结果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行。可是事实上，红军一旦打入内地，不仅军事形势更加险峻，前途难测，而且再要想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妥协，就更加困难了。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

②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致洛甫电》，1936年12月8日。

③ 有关情况可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三章第四节。

难以避免的摇摆

1936年12月初，国共两党关系已走入绝境。12月4日，蒋介石率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亲自实施“剿共”战争的新部署。由于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致使早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于万般无奈之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再度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它可能是国共两党关系新的转机，但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内战，使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泡影。因此，如何把握，关系重大。

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其基本方针是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中共中央在事变一开始，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①] 不难看出，此一策略如果成功，不仅共产党人不必作出任何重大让步，而且共产国际提出的各项政治目标都可能实现。甚至共产党人还有可能“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使西北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②]

中共中央是不是又回到“抗日反蒋”的方针上去了呢？当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12月14日。

② 见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

然不是。"抗日反蒋"方针包含着坚持进行国内战争的内容，而这时共产党人却"绝对反对一切内战"。"抗日反蒋"方针包含着另立中心，与南京对抗的成分，而这时共产党人却"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希望以西安为中心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把矛头对准蒋介石一人。然而，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国民党内部派别之间矛盾的估计，以及对蒋介石个人作用及威望的估计，都不尽妥当。他们忽略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学良，都无法迅速取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地位。事实上，西安事变本身在客观上必然要造成与南京政府的对立，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大规模内战，而除蒋策略不仅不能缓和这一局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险。

12月12日晚，南京政府针对事变采取了强硬态度，褫夺了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下令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发。14日，尽管中共中央仍旧主张"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①]，但显然已感觉到双方公开对立可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故不能不提议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名曰援绥，实则准备与张、杨公开联合，对抗讨伐军，"与敌决战"。[②] 然而，无论张、杨及中共，显然都没有想到对蒋介石的扣押，会引起全国绝大多数党派和人民的反对。随着事变的持续而渐渐形成的"拥蒋潮流"，使中共中央和张、杨开始感到严重不安。因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西安与南京之间将无法调和，而且预想中的多数派别及人民拥护事变的情况也无法出现，如此则不仅内战绵延有碍抗战，而且西安将日渐陷于孤立，这无疑有违人们的初衷。为此，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发表通电，试图以第三者身份呼吁南京

---

①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给各方面军电》，1936年12月14日。

②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我们的行动方针致汉卿、虎城两将军电》，1936年12月14日。

方面“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1]，并致函阎锡山，请其“周旋宁陕之间”，阻止内战发生。[2] 但是，中共中央仍旧认为，必须“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3]，否则不能根本改变南京方面“剿共”内战政策，实现国共合作。故力劝张学良“坚持到底”，甚至不惜在西安被攻时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破釜沉舟，以争取胜利前途。[4]

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中央，之所以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及除蒋策略有可能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此举将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即使在意识到“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计，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时，也仍旧鼓励张相信，当国际了解到事变真相时，“当寄以同情”。[5] 因此，直至周恩来赴西安见到张、杨，三方共同认识到有必要以蒋之安全问题作为迫使南京方面停止进攻，改组政府的筹码之后，其除蒋策略事实上仍未真正改变。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赴西安之后，对蒋介石态度的松动、苏联的不满以及各派倾向有了更深入的全面的了解，已开始认识到对蒋处置问题实际上是和战的关键，因此在除蒋策略上有了明显变化。中共中央12月18日致国民党中央通电虽继续坚持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政治条件，但已不再坚持

---

①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卷，第123～125页。

② 《毛泽东致阎百川函》，1936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0页。

③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我们的行动方针致汉卿、虎城两将军电》，1936年12月14日。

④ 《周恩来关于到西安后与张学良所谈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

⑤ 《毛泽东致李毅电》，1936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2页。

把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1]

12月1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开始指出，西安事变固然是因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而发生的革命义举，但它也助长了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因此事变发生后自己所提出的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2] 紧接着收到的共产国际的电报，使这一看法更加明确。共产国际的来电明确批评事变客观上只会有损于中国人民各种抗日力量的团结，同时却仍主张应在改组政府，要求南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停止"剿共"并与红军合作抗日等条件下和平解决事变。[3] 鉴于此，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修正了自己以前的除蒋策略，在肯定张、杨发动事变的主观愿望之后，指出了事变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4] 随后，中共中央接连致电周恩来和潘汉年，要求他们以共产国际所提条件与南京方面谈判，并声明在有关条件获得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同时，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具体工作方针。[5]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12月23日与张、杨一起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进行了具体谈判，提出了停战撤兵，改组政府，召开救国会议及联合红军抗日等项条件，并明确表示

---

①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同上引书，第218～219页。

② 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6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于国际来电之后）。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电》，1936年12月21日，等，《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52页。

中共愿意协助蒋“统一中国，一致对日”。[①] 由于宋子文急于救蒋，且对南京政府前此政策及人事多有不满，故谈判进展竟异常顺利，宋主动表示愿“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组抗日政府”，并具体提供了改组的名单，保证“肃清亲日派”和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方针。随后，双方又进一步商定了共产党公开，红军在抗日时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协定。蒋介石亦向周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②] 至此，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蒋亦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经洛阳飞回了南京。

来而复归的决定

▼

西安事变的结果，尽管没有达到中共中央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预想，却明显地符合此前逼蒋抗日方针所要争取的目标。不仅如此，因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实现了事实上公开的军事合作，陕北苏区全面恢复和扩大，“剿共”战争被制止，南京政府即将改组，中共中央又高度乐观起来。中共中央确信，事变的结果表明，中共在事变中实际上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西北已经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蒋介石的许诺与投降无异，其威信已经扫地，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已经不能再继续，故应加紧“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逼迫蒋不折不扣地实践

---

① 《周恩来关于与宋子文谈判情况致中共中央电》，1936 年 12 月 23 日，同上引书，第 262~263 页。

② 《周、博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 年 12 月 25 日，同上引书，第 272~273 页。

自己的许诺。[①]

但是，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迅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在 1937 年 1 月初的一份电报中认为，中共的这种态度将可能使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果前功尽弃。来电批评中共中央仍未彻底摆脱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的影响。认为“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来电甚至改变了共产国际在事变期间给中共指示中所强调的政治条件，宣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也在所不计。[②]

共产国际来电的批评，明显地存在着过火的成分，但来电的指示精神在主要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自释蒋回京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证明，寄希望于蒋之许诺和并无实权的宋子文的握保，是根本靠不住的。在张学良被扣、中央军重新集结进攻西安的危险再度出现之后，人们不能不从根本上放弃了以西北为中心来影响全国的幻想。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目前不仅“改组政府暂时无望”，而且仍旧必须以全力争取切实停止内战。在内战危险尚未真正制止，与南京共同抗日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情况下，过分夸大自己的胜利，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行为。[③] 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盟，以威慑南京的军事进攻，一方面全力投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攻势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再度重申了自己

---

① 《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年 12 月 28 日等，同上引书，第 277 ~ 278，283 ~ 285 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 年 1 月 2 日。

③ 参见 1937 年 1—4 月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人的电报。

在事变中的第三者立场，力图避免南京方面以反对共产党人的介入为理由，来对西安方面进行军事报复。

面对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形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渐渐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具体协议的出路。在这方面，过去所坚持的种种政治方案都过于脱离实际了。事实上，还必须作出让步的主要并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为人们还没有力量迫使国民党赞同和实施那些民主化的主张。民主国会、民主政府，甚至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等，都还只能是一种斗争的方向，而不可能是实际的斗争目标。为了使国共两党尽快合作起来，应该以和平和抗日为中心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寻找使双方政治上易于合作的具体方式。

1937 年 1 月 20 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放弃苏维埃制度，放弃普遍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的重要提议。这一提议表明，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运动，是不适应当前建立全国范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要求的。尽管共产国际仍旧希望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保留作为群众组织的苏维埃[1]，幻想未来的革命权力仍将会像俄国一样从那里产生，但这一重大提议显然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出路。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在抗日与和平的方针之下，准备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南京政府，同时向各方表示，红军和苏维埃可以不待民主政府和民主共和国建立，就改变名称和番号，苏区可以统一于中央政府并实行民主制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放弃逼蒋方针，实行正确的联蒋、拥蒋抗日策略。[2]

2 月上旬，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 年 1 月 20 日。

② 《中共中央对叶询各点的答复》，1937 年 1 月 23 日，等。

电，明确提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等条件下中共愿做出四项郑重承诺。这包括：（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① 毫无疑问，正如中共中央所承认的，上述保证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②，它大大超出了共产国际提议的内容，直接具体化为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并统一于其领导和制度之下的完整妥协方案。对于这样一种原则上的让步，共产国际一时都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吃惊地提出疑问：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呢？事实上，共产国际本身就缺乏准备，甚至怀疑这种让步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目前只要声明共产党和红军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支持其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准备与之协商民主改组苏区政权，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权的基础上调整二者关系就足够了。关于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问题，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③

但在放弃了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并不认为这种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有仔细讨论的必要。在他们看来，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尽快实现国内和平和团结御侮，同时使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在实际上得以保存。因此，在苏维埃革命方针改变之后，一切形式上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了。中国共产党方面最低限

---

①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376 ~ 377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传解释大纲》，1937 年 2 月 15 日，同上引书，第 380 ~ 382 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 年 2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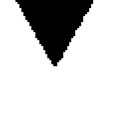
度的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其实就确定了，即必须保存苏区和红军。当时因种种形式方面的束缚，人们事实上很难真正由此出发做出决定，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约束了。中共中央于2月9日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全文，并决定次日公开发表，昭示全国。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来换取国内和平统一，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态度。而它所公开作出的四项承诺或保证，一方面满足了国民党近一年来为谋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所提出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则为切实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找到了最便利和适宜的形式。尽管在如何按照四项保证同国民党具体谈判解决两党关系的问题上，还有许多斗争，但这一原则性的让步的确定，无疑打通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实际道路，成为国共两党以后实现合作的关键。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军事方针的争论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很快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参加对日作战。由于国共两党刚刚结束十年内战，相互还缺乏足够的信任，红军这时总共也只有三四万人，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战法配合友军，对强敌日本作战，成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深感困难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内部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军事战略方针也随着战争的开始，依据实践几度修正和变化。深入剖析这一事件及其中共中央认识从分歧到统一的具体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已经过去的历史。

问题的初步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是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期间。当时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考虑的还是对蒋介石军队的作战问题。直到1936年夏，随着自身政策和政治形势的改变，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才开始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这一年夏天公开发表谈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落后国家，经济上不统一、不平衡，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当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同时，还应“在农民中间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敌后打击和牵制敌人，

“使之疲于奔命”。[1]

毛泽东此时关于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红军近十年战争经验得出来的，它一方面高度重视运动战机动灵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特别强调了实行敌后农民游击战的意义。但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他这时显然认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将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因而也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阵地战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农民游击战争则是在正规部队进行运动战、阵地战同时的又一种辅助的战争形式。[2] 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其战略考虑还比较简单。加上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在国共合作谈判中坚持红军应独立担任一定防线，以便于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3]，因此，中共中央最初的战略设想显然还是以正规战为主的。随着战争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想法渐渐地有了一些更实际的考虑。

1937 年 7 月 8 日，鉴于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朱德等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蒋介石，公开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与日寇决一死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4] 随后，毛泽东电令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当时决定立即派 4000 人

---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 ~ 116 页。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红军问题谈判原则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 年 11 月 20 日；并见《王明选集》第 4 卷，日本汲古书院 1974 年版，第 22 页。

④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1937 年 7 月 8 日。

赶赴华北参战，同时命令主力一个月准备完毕，改编出发。[①] 紧接着，中共中央了解到南京政府有意使红军担任平绥线防卫后，当即于14日命令红军主力各部，“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②] 但毛泽东等当天已经在要叶剑英转告蒋介石，请其注意红军的特长了。电报称：“同意担任平绥防线，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在于（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③]

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制定出了红军最初的参战方案，准备“（甲）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而以廿七军、廿八军、廿九军、卅军、卅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地方武装”，留置后方，“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乙）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廿七军、廿八军、卅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出，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去，扩大义勇军运动。”[④] 考虑到两天前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毛泽东等给叶剑英的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态度是既准备打正规战，又准备打游击战。许可出动主力，就以主力全体出动，担任一线防御；不许主力参战，则派小部队前往，做游击战准备。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为着适应南京政府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而制定的。

但是，鉴于大批日军涌入华北地区，平津局势异常危险，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据此，他们一面

---

① 参见《毛、朱关于拟派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军等先行出发抗日问题致彭、任等电》，1937年7月11日；《毛泽东关于应同中央军等积极接洽协商抗战办法等问题致叶剑英等电》，1937年7月13日。

② 《军委主席团命令》，1937年7月14日。

③ 《毛、朱、彭等关于拥蒋抗日问题致剑英同志电》，1937年7月14日。括号内为笔者所加，□为原字不清。

④ 《毛、朱关于红军编制问题给彭、任等人的指示》，1937年7月16日。

公开呼吁南京速派飞机、重炮和大军赴前线应援，“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一面开始公开主张“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而要克服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能够依据战争需要灵活地前进或后退，不仅不让敌人占领寸土做不到，而且必须大力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造成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因此，游击战争开始受到了相应的重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把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强调不仅应当“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而且应当“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①] 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的提出，为此后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里所说的“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说到底还是运动战的方针，它反对的是被动挨打的消极的阵地战、防御战，主张机动灵活的积极主动的运动战、进攻战；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辅之以广泛的游击战和有条件的阵地战，来达到挫败敌人攻势的目的。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实际上考虑和针对的仍旧是全国抗战的军事部署，而不是专门为红军自身设想的。因此，我们在中共中央 7 月 28 日给周恩来等人的指示当中仍旧可以看到，他们仍在做着加入正规战的战斗准备。电报说明：（1）红军主力三个师将于 8 月 15 日编好，20 日全部出动；（2）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3）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②]

---

① 参见《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拟定宣传鼓动提纲》，1937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选集》，第 332 页。

② 《洛、毛关于提交国民党之红军改编原则问题给周、博、林的指示》，1937 年 7 月 28 日。

新方针的形成

▼

中共中央上述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是在 1937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之间。在此期间，当红军积极改编，准备出动主力参加华北防卫战争之际，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宋哲元部遭到进攻日军的严重打击，损失惨重。平津抗战从发动起不过三天时间即告瓦解，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其实，此前在设想红军参战的问题上，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高度重视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关系问题以及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问题了。从提出要求调赴河北，到表示愿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从强调红军特长在运动战、游击战，要求深入敌后，到声明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都显示出毛泽东等人已有颇多顾虑。7 月 31 日，即平津刚一失守，毛泽东就紧急指示已经开拔的红军各将领注意：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且“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可下令从 8 月 5 日起（或更迟几天）开始东移，每天走五十里左右，每走三天休息一天，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①十分明显，毛泽东首先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对前此的部署有所担心了。

毛泽东等人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是有深刻了解的。除中央军以外，毛泽东深知如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部队战力不强，对日作战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但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几十万大军对日作战不数日而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仍旧出乎意料之外。考虑到能出动的红军主力不足 4 万人，枪弹奇缺，装备

---

①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等问题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 年 7 月 31 日。

落后，以其战斗力虽可与部分日军一拼，但对整个华北防线来说仍不过杯水车薪。何况在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的情况下，若国民党军如此不能战，在战场上更会陷红军于严重困境，直至遭受重大牺牲。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决定根本放弃原定方案。8月1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专电周恩来、博古等，主张根据当前敌我情况，重新向国民党提出红军作战原则问题。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①

上述作战原则无疑同前此方针有了根本性的重要区别。第一，它排除了以红军担任一线防卫，打阵地战的可能性。第二，它第一次把主力红军同游击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不打阵地战，甚至没有提到过去特别强调的红军的"特长"，即运动战。第三，它明确提出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否定了前此关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的要求。第四，它第一次要求实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反对南京政府在战役战术上"束缚"红军。这意味着，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毛泽东等人已经清楚地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为此，他们不能不考虑改变前此的军事方针，改取适当的作战方式，保存红军的实力，以适应坚持长期战争的战略需要。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等开始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出动"宜缓不宜急"和"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的策略考虑。强调"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

① 《洛、毛关于红军作战原则致周、博、林电》，1937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页。

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量，方不吃亏。"① 提出这样一些策略考虑，自然也包含着政治上对蒋介石的严重担心在内。因为，这段时间两党谈判进展缓慢，特别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谈判中要价颇高，两党关系问题、边区以及共产党的地位问题，甚至包括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问题等，始终得不到解决。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会加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再加上这时又发生了中共闽粤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以改编为名全体缴械的严重事件，这就更加促使毛泽东等在军队问题上要保持高度警惕性了。

8月3日，为参加南京国防会议，朱德、周恩来等初步拟定了出席会议的提案题目，准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关于全国以及华北抗战战略的建议。据此，毛泽东和洛甫第二天联名致电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将领，说明了他们对抗日军事战略问题的看法。主要包括：(1) 分别在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以及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分设三道防线，并首先在第二线，特别是第一线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决战。(2) 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3) "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且游击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依现在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4) "发动人民的武装

① 《洛、毛关于红军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给周、博的指示》，1937年8月1日；《洛、毛关于红军抗日出动及作战问题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布给朱、周转彭、任电》，1937年8月1日。

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①]

对于毛泽东和洛甫的上述种种意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多数领导人在基本精神上并无多少不同看法。但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红军主力应缓出，作战应分散游击的考虑，在外面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经过多日讨论，颇感难于接受。在接到毛泽东等上述电报的当天，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以及林伯渠等人接连两次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洛甫，说明（1）"关于红军只出动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如此不仅"政治影响好"，而且"易要求独立自主的作战任务"。同时，"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2）红军对参战不应迟疑，并应当"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当然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②] 考虑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和当前抗战的情势，毛泽东等于5日复电表示了部分的赞同，即同意红军应当结合以运动战，并且"承认开拔主力"。但他们在电报中仍旧明确主张：第一，红军宜"担任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即是说应以游击战为主，并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第二，承认开拔主力也是必须在国民党同意我可"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下"。而为使在外面的政治局成员了解他们的隐忧，毛泽东等特别在电报中说明："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

---

① 《洛、毛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朱、叶的电报》，1937年8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页。

② 《朱、周等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致毛、洛电》，1937年8月4日；《朱、周等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致洛、毛电》，1937年8月4日。

等等问题”。[1]

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依据商定的方针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同时，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也在两党谈判问题上开始让步，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国防师及特区警卫部队，并颁发了三个师的番号，命令红军至迟于8月20日出发，25日到大同集中。7月，毛泽东下令红军各部准备开动。至此，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局面开始见诸于事实了。鉴于红军作战在即，毛泽东再度强调了红军作战的特殊性问题。他指出：目前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中日大战已经到来，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战的决心，但其应战主义是很危险的，我们固然提出三层设防，主张保卫绥远、保卫张家口，并希望这些地方成为马德里，但眼前还没有这种条件。由于国民党坚持单纯防御的方针，并且害怕民众起来，不仅华北城市可能丢掉，南京也可能失去。因此，红军目前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有着重大的意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扬红军的长处”，只有分散的进行游击战争才能“保障红军之发展壮大”。因此，毛泽东要求红军干部向对红军期望甚殷的各方说明：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他，致失去其长处。”[2]

正当红军准备不待改编即行出动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忽然一面接连催促红军按其指定路线分割出动，一面阻碍中共发表宣言，这使得毛泽东等进一步对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感到严重怀疑，红军出动再度受阻。

8月17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希望红军立即以主力集中

---

① 《洛、毛关于红军参加抗战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给朱、周、博、林、彭、任的电报》，1937年8月5日。

②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致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页。

于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邱地区，准备作战。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明确认为应当接受此一方案，因为，第一，此“原为我们所要求作战地域，为山地，背靠太行山脉，向南口、张家口线及张家口、大同线，均居高临下，便于机动”；第二，该地域人多地富易于扩大和发展游击战争，较张家口、大同线以北为便利；第三，“该地域依傍太行山，以山西为后方，以绥东、察北、热河、冀东为前进地区，极便活动”，完全可能成为我们今后第二根据地。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也当即复电国民党代表张冲表示同意，只是提出红军应走同蒲路而不走平汉路。当日，毛泽东并电令红军各部“二十四日准备完毕，二十五日出动”。[1]

然而，17日当晚毛泽东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电，得知蒋忽然“缓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不免深感疑惑，担心国民党此时催促红军出动包藏祸心，因而第二天即下令取消前令。他并说服这时负总责的洛甫一同发电劝说前方领导人拒绝此案。其电报说：“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据此，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令周恩来等：必须使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一并解决，并要求国民党方面承认“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第一批出动红

---

① 《朱、周、叶致毛、洛并转博、林、彭、任电》，1937年8月17日。

② 在8月12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见当中，蒋曾坚持《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不必提“民主”，不必解释民族、民权和民生，不必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但双方已商定等一二日即可公开发表，以利红军参战。不意17日蒋又变卦。参见《朱、周、叶致毛、洛转博、林电》，1937年8月12日；《周、叶致毛、洛电》，1937年8月17日。

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①

为统一领导人的思想，毛泽东等已明确提议在红军出动前应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大问题”。因此，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均于8月22日赶回陕北，齐集洛川冯家村参加会议。此即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参加者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彭德怀、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林伯渠、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徐向前和傅钟。会议于22日晚召开，议程原定为“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军事和两党关系问题。首先即由毛泽东报告“军事外交问题”。而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会上明显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洛甫、林彪、凯丰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1) 国共两党毕竟代表两个向来敌对的阶级，防人之心不可无，目前有必要以红军的出动问题来压迫国民党公开承认共产党和边区的地位，红军出动快慢不会影响红军的声望；(2) 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不会根本改变，他总是要试图控制或削弱红军的，现在全部出动，可能会上蒋的当，而先只出动一个师，待其他问题解决后再陆续出动，或对共产党有利，且战争是长期的，打仗的机会有的是；(3) 红军作战主要形式还是游击战争，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固然“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山地游击战争是主要的。而彭德怀、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则认为：(1) 红军不应拘泥于宣言和边区组织的发表，而应顺应战争形

① 《毛泽东关于同意接受白黄方案事致张淮南先生电》，1937年8月17日；《毛关于白黄案含有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给周、叶的电报》，1937年8月18日；《洛、毛关于国民党阴谋问题给博、林、彭、任的电报》，1937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周、叶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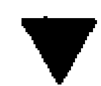
势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及早出动，避免因拖延过久在政治上反陷于被动；（2）在留下足够的部队保卫边区之后，红军主力应全部开赴前线，担心国民党集中兵力打边区的主意，是不必要的，过分的警觉是不对的，靠消极的办法来保存红军的力量也是不妥当的；（3）红军现在的基本任务是开赴前线打胜仗，壮声威，鼓士气，依目前敌情，战术上固须十分谨慎，多打山地游击战，但日本军队也并非那样强大，完全可以打垮一些，活捉一些，因此还是要打运动战，运动战和游击战应该是与红军密不可分的，红军的作战原则应该是“运动游击战”。

毛泽东对此的解释是：目前靠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和办法，是不能战胜日本的。因此，保存与扩大红军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总目的是要“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因而目前必须注意通过“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来“保存与扩大红军”，并努力“创造根据地”。而这个“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则是达到最终目标的必由之路。据此，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军事原则。包括战略原则—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但着重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指挥原则—争取战略方针与国民党共同商量，但在总的战略指挥之下实行相对的独立自主；作战原则—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当然，毛泽东在突出强调“防人之心不可无”和争取自己成为抗战核心时，也没有忘记强调“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军”“是中国的实力派，这是大哥”，“要靠拢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不要无端地引起中央军、蒋介石的疑忌。与此同时，在出兵多少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没有坚持过去只出一个师的意见。①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24日。

由于负总责的洛甫和负责军事统战工作的毛泽东坚持必须保持对国民党的高度警觉，会后形成的决定明显地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但十分明显的是，这次会议以及27日召开的中央座谈会虽然提高了党内领导人的阶级警觉性，在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上却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同对毛泽东8月1日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一样，不少人对毛泽东这次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也仍旧感到有些怀疑。

游击战与运动战并举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公布了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命令。随后，蒋介石接连两电朱、彭，着令其立即率部赶赴山西前线。根据中央军委的紧急讨论，决定（1）115师（其343旅已先行出发）、120师及八路军总部立即准备出发。129师待国共间主要问题，特别是宣言发表后再开赴前线。（2）八路军主力以恒山山脉为中心，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创造游击根据地，配合友军在平绥线和平汉线作战。紧接着，部队相继出发，周恩来等亦赶赴太原，向阎锡山解释和说明八路军的游击战略。

8月下旬，张家口、南口一线失守，日军前锋已进抵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区域。八路军总部判断，敌或乘胜进攻大同、归绥等地，切断中苏联络；或在张家口、南口一线取守势，部分向大同、平地泉方向佯动吸引我主力，敌主力则沿津浦路略取山东半岛并相机占领上海。据此，朱德、彭德怀等决定八路军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向靠近恒山山脉之涞源、大营、灵邱一带集结，小部向张家口、北平方向游击前进，破坏铁路，大部准备

相机侧击向大同或向保定推进之敌军。[①]

八路军的上述部署，表明其作战方针仍侧重于正规战。注意到日军正大踏步向恒山方向推进，国民党在边区等问题上仍旧多方刁难，毛泽东颇感担心，反复致电前方将领，要求各部务必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并希望国民党方面同意：（1）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②]

9月中旬，日军先后进占蔚县、广灵、阳原、大同，并迅速逼近八路军计划中的集结地带—涞源、灵邱、大营一线。至此，八路军不得不改变原定方案。1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认为原定我三个师集中晋东北一处之计划已不可能，故除已赶往晋东之115师可暂时开往灵邱、涞源一线以南地区外，120师和129师均应改向。115师也应避免加入正面作战，因日军必将继续攻取太原，晋东北绝难保持，阎锡山的部队也难以阻止日军进攻。[③]

然而，前方将领对日军迅速攻取太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主张支持阎锡山坚决抵抗的决心，因此表示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仍应使主力置于晋东北，以便配合友军“尽可能保持太原，固守雁门关及沿长城之各口”，“争取华北局部之持久”。[④] 对

---

① 《朱、彭、任关于敌情判断及我方行动部署致毛泽东电》，1937年8月30日。

②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问题给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12页。

③ 《毛泽东关于我三个师集中晋东北已无可能致朱、任电》，1937年9月16日。

④ 《朱、任关于尽可能保持太原、固守雁门关争取华北局部之持久及我军行动部署之建议给毛泽东等电》，1937年9月16日。

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出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敌我情况变化下已根本不适用，必须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的战略部署：（1）我二方面军（即 120 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在取得阎锡山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2）我四方面军（即 129 师）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3）我一方面军（即 115 师）则及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依情况可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于 9 月 20 日赶往太原见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商谈 120 师出晋西北，115 师出晋东北之事，得到了阎的同意。阎并且表示，他将集中 24 个团在沙河与敌决战，并在灵邱、平型关、大营一线首先进行抵抗，要求 115 师抄敌左侧背予以打击。彭德怀虽然并不十分相信阎有此决心，但仍表示愿积极配合。

这时，毛泽东自信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整个战局的发展趋势了，因而更加明确和坚定了此前的认识。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不管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的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必难持久"，"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他为此再度告诫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

①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问题致朱、彭、任等电》，1937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15～17 页。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他甚至坦率地告诉彭德怀说：“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当然，他也不反对少数部队（如一个旅）暂时集中配合阎军作战，但他强调说：当这种暂时的集中在许久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①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问题的反复说明和强调，终于引起前方将领的重视。华北军分会和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要求部队“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发展游击战争，使敌陷于我群众和游击战争围困中，断绝敌之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怖和疲劳，分散敌人兵力”，从而“便利于主力打击以致最后战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由于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宣言》公开发表，国共合作正式成立，以及随后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重要胜利，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再度出现了一些变化。

9月25日当天，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现在就要“设想在敌整个的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因此，“目前不宜过早暴露”我之实力，而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

---

① 《毛泽东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给德怀同志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20页。

蓄锐”，准备留在华北与敌人打持久战。[①] 但是，在得知平型关战斗中115师不足三个团，歼敌近千人，缴获汽车74辆，炮1门，炮弹上千发[②] 的消息后，毛泽东显然颇感兴奋，其军事观点发生了某些与前不同的变化。几乎就在得到战报的当天，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向敌后举行大规模侧后袭击战，以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几天后，即9月29日，毛泽东进一步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在强调“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我之根本方针仍应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的同时，明确指出：阎锡山若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在坚持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总方针下，可以“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不仅如此，毛泽东又特别提到其25日“关于使用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大、蔚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认为此着实行，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③] 显而易见，毛泽东这时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其9月21日关于不同意集中兵力的打运动战的意见。

事实上，华北日军这时确实因战事进展势如破竹，国民党

---

① 参见《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给周并胡服、尚昆、朱瑞并告朱、彭、任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问题给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26页。

② 《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③ 《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给朱、彭、任、周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给周、朱、彭、任的电报》，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26，28~29页。

军往往不堪一击而轻狂自负，以致经常是冒进，后方空虚，战术上存在许多可乘之隙。鉴于此，中共中央对阎锡山固守晋北的作战计划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朱德、彭德怀等明确认为："敌人指挥并不强，最易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因而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提议以两个师配合友军4个师向敌后突破，以"争取山西局面相当持久"。毛泽东也再三表示："山西现已处在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这一仗。""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故主张"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要求卫立煌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向忻口地区）之主区"，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我任守备"。同时，指示"红军主力林彪、贺龙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之任务，并希望国民党能有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①] 毛泽东这种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促使前方将领重新激起积极参加晋北决战的热情。华北军分会10月8日发布训令指出："目前山西成为华北战局中最后争夺的主要目标，如能打击深入雁门关以南敌人，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保卫太原、巩固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地区，则可依托山西高原地带为堡垒，争取将来向平汉线（作）战以至战略上的反攻，以改变华北战局，求得华北抗战的持久"。"在目前晋北决战中，我们虽在决战的军事上仍然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我们正确的运用运动游击战，对敌侧后的袭击与捣乱，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供给的积极行动，以打击钳制分散敌人，配合友军歼灭敌人"，必将"成为达成晋北战役计划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朱德、彭德怀等前方将领重新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方针，明确强调"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才能"争取新的

① 《朱、彭关于阎决心以决死队为骨干组织新军及其内部略情给毛泽东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致周、朱、彭电》，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33～35页。

胜利”。①

对于晋北决战，毛泽东无疑看得更远些。他一方面积极改变以往部署，指示八路军主力各师集中兵力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争取战役胜利；另一面却突出地强调“暂时”二字，告诫前方将领不可有轻敌速胜的思想，亦不可根本改变战略方针。因此，对于军分会重提“运动游击战”问题，洛甫、毛泽东等很快即表示了不同的看法。② 同时，10 月 13 日，忻口战役一打响，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问题。当然，毛泽东并不反对运动战，相反，他这时明确认为，包括八路军在内，中国军队在此阶段均应以运动战和集中打击敌人为主，惟有如此，才有利于实现“支持华北持久战”和“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据此，他明确主张向蒋介石建议，太原失守后，应立即实行以下部署：“一、以现有太行山脉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五个至十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以黄绍竑为总司令，并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达确保该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之目的；二、以卫立煌、郝梦麟、刘茂恩各部，另加川军两个师，以卫立煌为总司令，位于太原以东寿阳、盂县地区，除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外，以运动歼灭战对付太原之敌；三、以红军一一五师、晋军陈长捷部，另加桂军两师，骑兵一师，位于五台山区，以一部除向平型关、沙河、代县、盂县、原平线出击外，主力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四、以红军一二九师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昔阳至榆次南部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万一不利时之南面防御战；五、以红军一二〇师主力配合晋军主力十五个团左右，位于晋西北直至外长城一带，确保该地区，袭击太原、大同线；六、

---

① 《军分会关于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1937 年 10 月 8 日。

② 洛甫、毛泽东 10 月 17 日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明确认为 10 月 8 日军分会指示“有原则错误”，应“停止传达”。

以晋军二十个团左右，及十五军、一二〇师之陈伯钧配合，于太原以西之汾阳、孝义直至离石、中阳地区，反抗敌军西进；七、以晋军之余部位于太原以东之太谷、平遥地区，完成对太原之四面包围。”①

不难看出，这无疑又是毛泽东的一个十分大胆且极富想象力的战略计划。这样的“大手笔”无疑是当时的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必须到10年后毛才有机会一展身手。但问题是，在这一计划中，八路军显然担负着极为艰巨的战役作战任务。这说明毛泽东这时确有打大仗的雄心。当然，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八路军的整个军事战略方针应该由此而根本改变。第一，这个计划是从整个战略全局出发的，它首先要求国民党军队具有足够的勇气和作战能力，并且要求他们能够“学会八路军的打法，就是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而正面防御部队亦主要应采取反突击的战法，主动去打敌人。在毛泽东看来，这已不单是运动战，而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叫做“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或“独立自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② 第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坚持持久战和克敌制胜的根本办法，这就是，要“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只有这个力量发动起来了，“中国才能打胜仗”。而在华北及其敌后实现这个办法，毫无疑问只能靠共产党和八路军。所以，毛泽东这时尽管公开场合在说八路军的战法是“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实际上仍旧明确希望国民党“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

① 《毛泽东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致周、朱、彭、博、叶五同志电》，1937年10月13日。

② 毛泽东：《目前的时局》，《新中华报》1937年11月4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解放》第23期，第5页。（注：此文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明显的改动。）

击战以辅助之”，并认为如此“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1] 因此，毛泽东一方面积极主张八路军主力参加到华北抗战的整个战略部署当中去，一方面仍旧高度重视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准备在国民党军队不能在华北支撑时，独立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八路军主力积极投入到山西忻口战役中去了，不仅配合阎锡山主力做防御战，而且在山西及河北敌之侧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此同时，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大批小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开始在晋察冀边、晋东北、晋西北以及冀中等地区着手建立游击根据地。于是，当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紧接着上海陷落，国民党军事上已无力在华北组织有效抵抗之时，中共中央的军事方针迅速回复到原先的部署上来。它公开宣称，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已经开始，要求各部队立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上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与日军频繁作战和开辟根据地的实践，毛泽东等这时不再强调“山地”和不打运动战问题了。相反，他提出：八路军应该“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同时要相对集中部队，“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并据此对各部队调动作了具体的部署。[2]

---

① 毛泽东：《目前的时局》，《新中华报》1937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 年 10 月 25 日，《解放》第 23 期，第 5 页。（注：此文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明显的改动。）

② 《毛泽东关于形势估计及红军任务给朱、彭、任及周、刘、杨等电》，1937 年 11 月 18 日。

由分歧走向统一

尽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他在洛川会议上，特别是在9月21日电报指示中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的内容，八路军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相对集中的兵力在同时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但是，围绕着这一方针所形成的分歧，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不仅如此，由于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国，并批评中共中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过多预言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失败，主张更进一步赞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因而竟使分歧明朗化了。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并且认为这是太多地受到十年内战的消极影响和太怕吃国民党亏的表现。他们坚持认为还是提“运动游击战”的好。对此，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全国抗战中，要以运动战为主，但红军的战略方针，却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然，他同意应当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说明。他指出，坚持这一方针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对国民党的必要的警惕，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存军事力量，以便坚持持久抗战。他明确认为，在持久抗战中，军队和领土，军队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不仅共产党人要懂得，国民党也要懂得。[①] 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相距甚远。

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对持久战的必要性存在多少疑问，甚至也不在于人们这时对处于劣势情况下的

①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12月9~12日。

八路军应注意保存实力有什么异议，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及其优劣的估计相当不同。

八路军主力出动抗日时，总人数 34 000，枪 10 000 余支。到 1937 年 12 月，正规军发展到 92 000 人，枪 20 000 余支，地方部队及游击队 25 000 人。在此期间，八路军作战数百次，毙伤日军近万人，自己伤亡约 4 000 人，部队的这种发展速度和战果，显然使相当部分军事干部感到振奋。特别是八路军在敌之侧后穿插奔袭，毁路攻城，应付自如，使日军防不胜防，这更使部分前方将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轻视敌人的思想。他们认为，过去一度以为日本军事战术有很高的水平，现在看来是完全错了。日军指挥能力并不强，军官多是纸上谈兵的英雄，虽然八路军技术装备方面是中国军队中最差的，但日军至今还没有能使八路军受到打击，而八路军却从日军那里缴获了大批武器弹和军用物资，并给予日军以大量杀伤。[①] 甚至，当他们缴获了板垣师团部队清册和侍从官日记，了解到其自动化程度之武器装备之强，远远超出自己想象时，首先看到的仍旧是敌人的弱点，认为“此种机械化兵团一入山地其战车、大炮等即大部分消失其效力”，且其“行军力很弱”，因此，“此种部队在山地在运动中，以我现有一一五师人数（注约 19 000 人），打得好可能解决。”[②]

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主张看到敌人的弱点和

---

① 参见八路军代理司令员彭德怀的谈话：《胜利是我们的》，《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 7 期，第 18 页；《朱、彭关于阎决心以决死队为骨干组织新军及其内部略情给毛泽东的报告》，1937 年 9 月 30 日；朱德：《实行对日作战》，1937 年 7 月 15 日，等。

② 该师团人数这时约 22 000，步枪手 5 200，占 1/4 弱，其余均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射手。该师团每营三个步兵连队，一个重机枪连队，每一步兵连队 155 人，除步枪外，有 6 挺轻机枪和 6 个掷弹筒。《朱、彭、任关于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及我军之作战部署致洛、毛、周电》，1937 年 12 月。

自己的长处，以便树立必胜的信心。但他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了敌人方面的优势和自身方面的明显不足，并据此来规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他看来，中日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战争，而且是政治力和经济力的较量。以两国综合国力比较，日本明显地要强大得多。他并且注意到日本民族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士兵的武士道精神在战斗时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注意到中国军队构成及指挥的不统一，大多数国民党军的无斗志。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预计到，敌之正面进攻一旦停顿，就必然会设法从占领区掠取各种物资和资源，因而必将加强对占领区的军事统治，实行修路筑堡，使我大部队无法活动，根据地也将大大缩小。对此，也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平型关一战八路军伤亡达400人，这种比例也是高度重视八路军未来作用的毛泽东所难以接受的。

当然，这时双方的分歧还表现在对八路军主力（即正规部队）作战形式和任务的不同估计上。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认为，华北（主要指山西）游击战争的任务应该由八路军来承担，并且应当成为其唯一的作战形式。正是从这一估计出发，他一度坚决主张“分散作战”和不打运动战，甚至要求部队分割成许多小部队，首先分散去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去打仗。但由于山西抗战形势的需要和战争实践的允许，此一方针没有完全贯彻。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毛泽东这时已经修正了前此的认识，提出了“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补充意见，但在关于八路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分工和形式问题上双方仍未取得一致。在一些领导人看来，八路军固然担负着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中心任务，但其主要职能仍应放在打仗上，不能简单地说八路军不起决定作用，也不能因为暂时的敌强我弱而避战。事实上，发动群众也好，建立根据地也好，扩大自身也好，都要从胜利中得来。因此，过分分散兵力根本上是不利于完成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中心任务的。据此，他们在实际工作

中一方面大量派出团以下副职干部、政治工作人员以及教导团组成各种地方工作队，并派小部队加以掩护，以开展地方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地方武装，组织游击军，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仍旧以团、旅以至师为单位大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由于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他们这时显然更进一步认为，八路军主力应该专任作战，并且不应把自己局限在游击战的作战形式上。正规部队应当以运动战为主，结合以游击战；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则应以游击战为主，并适当结合以运动战。所以，他们又重提“运动游击战”问题，并明令八路军主力部队按照“运动游击战”的方针和原则指挥部队作战。通过积极有效的作战，配合正面防御，鼓舞和坚定友军士气，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以推动华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① 于是，在12月政治局会议以后，实际上又出现了两种战略方针并存的情况。

但是，到了1938年，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八路军主力分守几大战略支点，已难以像山西抗战初期那样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了。相反，无论八路军主力，还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均终日陷于各自独立的游击战争之中。与此同时，创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确保巩固的抗日后方，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配合和掩护八路军作战的问题，也尖锐地提上了八路军的议事日程。这样，尽管部分前方将领主张实行“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事实上却在进行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主要工作甚至已在相当程度上在渐渐向发动群众和创立根据地方面转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和表述，并着手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和解决双方认识上的分歧。

---

① 《朱、彭关于运动游击战指挥基本原则给徐、黄电》，1938年2月4日；《朱德关于敌情与我方布置致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电》，1938年3月4日。

1938年2月，毛泽东首先公开澄清了一些人对他所提出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误解，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配合。"问题是，除在正面应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部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这样才能遏止敌人的进攻并最终打败敌人。靠阵地战和敌人拼实力、拼消耗是不行的。[①] 而鉴于国民党军队难以改变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他一面多次要求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告诫蒋介石目前不宜与敌决战和消极保守城市，应注意保存军事实力，准备打持久战；一面根据晋察冀边区武装发展的经验告诫全党：(1)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以运动战为主，但在目前华北敌后，则还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今后打败日本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大都要从游击队和游击战中创造出来。因此大力发展游击队和游击战有巨大意义。[②] 事实证明，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基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因此，凡是国民党丢掉了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开展工作，支持抗日局面。目前即必须以大力投入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鄂豫陕、湘鄂赣、陕甘等六大长期抗日战略支点和苏鲁边、热冀边、大青山脉等

---

①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②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军战略部署致朱、彭、任等电》，1938年2月18日。

辅助支点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作。[①] 而对于八路军主力，毛泽东这时显然同意把它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区别开来，以旅或师为单位集中作战，作战方式以游击战为主，有利条件下则应积极进行运动战。他承认，以这种野战兵团的形式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的方针，"不但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②]

紧接着，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文章，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游击战争将成为相持阶段主要作战方针的论断，要求全党全军高度重视抗日游击战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完善地规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表述和规定，较其8月1日（"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22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9月21日（"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12月9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种种表述和规定，显然要更加科学和准确，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因而也更容易为全党全军所正确了解和执行。由此，自抗战爆发以来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争论终于不复存在了。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此一方针也逐渐为全党全军所确认。

---

① 《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问题致朱、彭、林师、贺师、刘师、汉口电》，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关于与蒋介石谈华北军事时应注意问题给周、叶、朱、彭电》，1938年3月17日；《毛、洛、刘关于平原游击战争问题致刘、徐、邓等同志电》，1938年4月21日。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6页。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与策略变动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人距离他们的 1949 年看来还相当遥远。接连不断的挫折使他们几乎无法再提出任何直接革命的任务。最彻底的苏维埃革命的形式放弃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也停止了，人们甚至不能不穿上国民党的军装，戴上国民党的帽徽，以国民党的政府为中央政府，公开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以此来作为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①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这种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与妥协，首先是由于中国所面临的抗日斗争的需要。② 但是，不是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不是两党在对等条件下的合作，而是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这毫无疑问是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结果。③

① 1936 年，中共北方局最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承认国民党“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即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表示同意国民党人在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在 1937 年的国共两党正式谈判中，中共中央正式将此一表示在文字上确定为：“承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分别见《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 8 月 29 日；《洛甫、毛泽东二同志致朱、张、徐等同志电》，1936 年 10 月 11日；《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7～289，429～430 页。

②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 年 2 月 15 日，同上，第 389 页。

③ 了解这段历史可以知道，中共在最初提出统一战线时也曾经一再主张以苏维埃为中心和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但这样的努力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可能。中共在 1937 年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成立时的实际兵力只有 4 万人左右了，而国民党的兵力却有 150 万人以上。

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抗战开始一年之后，尽管中共的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始终重视阶级斗争并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警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仍旧不能不把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承认“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和将来建立一个“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作为党的路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下来。① 而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不会使共产党人更加接近于他们十几年来所极力争取的革命目标。

不过，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妥协，显然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促成的。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条件发生改变，都有可能使这种妥协发生改变。而其中最可能导致两党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无疑有三点。第一，国民党的态度，这包括对日和对共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民党对日态度决定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另一方面，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更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第二，双方的实力对比，这包括总体力量的对比和局部力量的对比。任何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局部力量对比的变化，都会使两党关系趋于紧张。但在总体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关系仍然容易保持。第三，国际的影响，这包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国际形势的影响。前者直接影响着中共的政策倾向，后者则直接影响着中共对国内形势以及国民党政策动向的判断。不难想象，无论是国民党的态度，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是国际的影响，都不可能不发生变化，由此也就决定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改变。就在 1938 年秋中共六中全会刚刚决定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路线不久，随着 1939 年至 1941 年上半年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发生，毛泽东就不能不开始全面修正此前的统一战线政策了。值得重视的是，正

---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14 日，同注 1，（下），第 139～160 页。

是毛泽东的这种努力，导致中国革命从此开始走向它的 1949 年。

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初步改变

毛泽东对国民党态度的初步改变，明显地起因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在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度积极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国共关系，以至进一步争取实现组织上的密切合作。但随着武汉陷落，日军大举进攻暂告停顿，以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放弃对军队政权之控制和地盘之割据[①] 为契机，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较前开始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至 12 月中旬，蒋介石不仅拒绝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密切两党组织上合作关系的建议[②]，而且第一次赤裸裸地告诉中共代表：将中共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共产党做多少让步也不行。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诸如两党磨擦之类的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③] 随后，国民党开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方针。蒋不仅下令禁止八路军跨越战区，纵容和鼓励河北等地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与八路军磨擦，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地，而且在 1939 年 1 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开始鼓励各部会及

---

① 转见《中央日报》，1938 年 12 月 25 日。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

③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谈判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下），第 183～184 页；(4)《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及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9 年 1 月 21 日，同上，第 192～193 页。

地方当局提出各种“防共”、“限共”的秘密方案，从而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矛盾和冲突渐渐变得白热化起来。①

蒋介石之所以开始“防共”、“限共”，无疑是国民党丧城失地太多，而共产党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以至不仅从抗战开始时的陕北一隅迅速发展到整个华北地区，而且其军队也从抗战之初的4万余人迅速扩充到20万人之多。这种情况使国民党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②，再不加紧抑制，抗战胜利后自己必将失去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而蒋介石相信，只要“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中下层予以事实上之‘打击’”，国民党还来得及抑制共产党势力的进一步漫延。③

蒋介石突如其来的“反共”、“限共”行动，给了正在计划与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考虑到武汉和广州相继丧失，国民党军事上陷于严重困境，历来重视把国内的政治动向与国际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事实上，还在1938年9月29日欧洲慕尼黑协定出笼之后，中共中央就十分担心英法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虽然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估计“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

---

① 见《朱、杨、左、傅关于国共磨擦日渐增加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19日，同上，第190页；国民党这一阶段先后制定和颁发的秘密“限共”文件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处理异党实施办法》，1939年11月等，参阅《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1981年印刷，第8册，第318～333页。

②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39年，同前引书，第35页。

③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同前引书，第321页。另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3辑所录《陈诚致徐永昌函附办法》（1939年6月26日）和《徐永昌复陈诚函附修正办法》（1939年6月28日）两件可知，此一秘密文件是于6月以后下发的。

度上的区别”，利用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能①，但面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突然加剧，毛泽东开始作最坏的设想。这是因为，共产党人从来认为，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它们多半都是取决于某些帝国主义的态度的。故毛泽东估计，目前“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英美”，中共中央因此断定：“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② 由于英法在欧洲的妥协政策打破了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毛泽东认为已经失去了建立世界性和平阵线的任何可能，他自然相信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也要相应地日趋严重，国民党内反共势力公然抬头或许就是其妥协倾向恶性发展的一种反映。当中共中央进一步从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了解到蒋介石准备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到底”的标志，和国民党计划依靠英美的压力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情报，毛泽东甚至怀疑：蒋介石可能想要造成“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美”，“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③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的态度可想而知。

对于国民党加紧“防共”“限共”，共产党必然会以强调独立和斗争相对抗。但是，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显然并没有改变自抗战以来对国民党的积极评价。鉴于1938年12月底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叛变投降，蒋介石不仅没有步其后尘，而且公开拒绝了以“共同防共”为基础的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毛泽东依然肯定国民党在总的发展方向上还是“在进步”，只是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因此，他仍旧主张对国民党“要亲爱，要团结”。与前有所区别的只是，毛泽东开始特别强调了在统一战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

② 见《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5日。

③ 参阅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4月29日。

线的原则中，还要加上“反磨擦这一条”，要加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主张：“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我）二个，我们捉他四个”，用加倍的惩罚打击那些国民党反共势力，用发展进步势力的办法来造成“压服”退步逆流的实力。但很显然，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态度仍旧是“和为贵”，仍旧是“亲爱团结”。只不过他认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必须坚持斗争和合作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他形象地比喻说：“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①] 换言之，面对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措施和蒋介石一心想吃掉共产党的野心，如果不全力反抗和斗争，结果不仅合作不能保持，最后恐怕连共产党也要被消灭掉。

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仍旧注意“亲爱团结”，坚持“合作”，这多少也是同这时中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相联系着的。因为，尽管人们开始把慕尼黑协定出笼后国际形势中出现的一些不利情况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变动联系了起来，但国际形势的变动似乎还并不是十分糟糕，而共产国际看起来也还没有停止争取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与社会主义苏联团结合作的努力，因此，毛泽东也同样希望英美等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当 1939 年 3—4 月西班牙受德意支持的佛朗哥政权在内战中获胜，捷克斯洛伐克与阿尔巴尼亚先后被德意吞并，英法两国政府被迫开始放弃绥靖政策，整军备战，并试图与苏联进行有关集体安全问题的谈判，这种情况再度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受到鼓舞，甚

① 毛泽东：《对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总结会议时之演词》，1939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向》，1939 年 5 月 5 日。

至据此开始相信国际反侵略阵线“现在有其前途了”。[①] 但是，这种乐观的估计几乎立刻就不得不改变了。这是因为，在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已经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它已经准备放弃集体安全的努力，决心置身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并开始把防备英法等所谓“民主国家”的渔人政策作为自己头等重要的外交目的了。[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只是在斯大林讲话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了解到其讲话的具体内容的。[③] 但是，在5月份以后，获知苏联外交政策的新动向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而5月30日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种政策的转换和它所带来的影响。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指出：（一）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二）中共应当全力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要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反共阴谋，因为反共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三）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在开展反对妥协投降，揭穿反共即投降准备的同时，应注意不给统一战线的破裂造成任何借口。[④]

不难想象，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形势估计势必要把中

---

① 参见《欧美十六国共产党号召实际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宣言》，1939年1月27日、《解放》，第66期，1939年3月20日；毛泽东：《对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之演说》；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演讲词》。

② 参阅《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215～220页。

③ 中共中央了解到斯大林3月18日讲话的具体内容至少晚了两个月以上，在5月1日其机关刊物《解放》发表专门声明解释之所以未能刊斯大林讲话的原因是因为未能得到讲话全文之后，又隔了将近两个月，即6月25日《解放》才正式刊出斯大林讲话的全文。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共对国民党以及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认识，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事实也确是如此。在1939年6月以后，毛泽东此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全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及其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其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强调国民党“光明前途”的方针改变了，开始明确肯定“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当然，毛泽东并非希望国民党真的投降，他还是要争取国民党大多数坚持抗战，因此，在策略上，他仍旧主张不放弃“拥蒋”口号，主张“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①

革命目标的提出与策略转变的完成

共产国际的指示显然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岁”的激动人心的情景。但是，什么时候才是“战争与革命”的局面呢？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

①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并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反投降提纲》。

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这当然就是“战争与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明确认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以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①

战争引起革命，这对于共产党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新的世界大战的结果可想而知。斯大林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预言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早就使共产党人渴望着新的“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的出现，因为他们相信，根据以往革命的经验，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预言，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后，必将伴随着更广泛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诞生。②

既然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将导致更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将往何处去呢？尽管中国尚属落后国家，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国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之日，难道中国还会步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后尘，在世界革命的大潮之外，独树一帜地建立一个资

---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

②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中文版，第246页；所谓“第三时期理论”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的关于世界当前发展形势的革命性预言，它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战争和革命的时期”，伴随而来的将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空前高涨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

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吗？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注意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把中国引上何种发展道路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二者绝无调和的余地。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只能取决于整个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动和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如今，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共产党的力量也较两年前增长了四倍以上，毛泽东相信，争取中国革命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前途变化的条件已经出现了。[①]

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共重提意识形态的目标，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在继续民族战争，继续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应如何看待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呢？值得注意的是，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提防国民党叛变投降的可能性之日起，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国民党了。国民党"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的作法，以至不惜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并挑起冲突，更是激起他对国民党的极端不满。[②]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的到来，自然促使他迅速开始从阶级的角度重新评价国民党的作用了。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认定它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而

① 根据中共1939年对外公开宣传的说法，其军事力量仅八路军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见《中共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但根据1940年6月的内部说明，可知它这时的军队总计已经发展到50万人，相当于国民党的五分之一，见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政策》，1939年6月25日。

②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并见毛泽东在1939年7月的一次号召保卫边区的讲演。他当时即断言："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混帐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毛泽东：《保卫边区—你们是第一责任》，1939年7月12日。

且必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的”。因此，毛泽东断言：国民党及其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不仅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还“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今后革命的发展方向，也绝不可能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它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①

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并准备取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的发言权，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相信国民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了呢？显而易见，在国共双方实力对比仍旧十分悬殊而双方又共同面对着同一个强大敌人的情况下，这样做不符合共产党的基本利益。而更为实际的是，毛泽东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无论在对日本侵略还是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其内部都还有明显不同，因而共产党对它们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不能一概予以排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资产阶级态度的不同，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开始时仍旧沿袭中共前此的分析方法，认为抗日的国民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第1期，1939年10月4日。

党主要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不过相信国民党的一部分反映着“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一部分”，而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反映着大地主的利益，因而“是妥协性很大很不可靠的部分”。[①] 但是，按照这种区分方法，仍旧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的蒋介石集团虽然不属于“中国革命的对象”，这自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新的策略方针。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 1940 年 7 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②] 事实也确是如此。当 1940 年 3 月毛泽东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以及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设想之后，人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笼统地视为一体来考虑自己的政策了，因为既然断定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当然要被确定为反对和孤立的对象。毛泽东因此认定：“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故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在这种条件下，根本区别应当反对的蒋介石集团和应当争取作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不可避免的理论选择。到 1940 年 9 月 6 日，毛泽东终于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断定：“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他们是现时的主要当权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 5 期，1940 年 4 月 25 日。（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没有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字，而是直接引用了当时最初发表时的文字，因为《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字是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认识加以修改过的。这一时期有关的文章，如《新民主主义论》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均是如此。）

② 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40 年 12 月 4 日。

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即过去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① 把大资产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中划分出来，将其等同于买办资产阶级，而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整个的中间阶级，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从理论完成了他对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即不仅确定了新的革命目标—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确定了联合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也确定了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

变化的形势与困难的决定

考虑到实力对比的现实情况，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毛泽东判断国内形势和确定策略方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毛泽东把蒋介石国民党当权派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把大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阶级之后，他自然要更加重视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动向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还在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以前，毛泽东就断定蒋介石发动反共磨擦有国际背景，认为这是“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法国战败后，考虑到英法已经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蒋介石失去了组织反苏反共集团的帝国主义支持，于是他断定“发动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的中国大地主

①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选集》，第 740～741 页；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目前时局问题的结论》，1940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军官进行调查致恩来电》，1940 年 9 月 6 日；《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940 年 9 月 10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 册，第 355～357 页。

大资产阶级，将要被迫着重新来考虑其政策”了，他们有可能“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根据这样一种判断，考虑到中共已经发展到50万军队、60万党员，而“大资产阶级不统一不强大”，国民党内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也竭力反抗，以至蒋介石不得不“被迫让步”，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实力地位，一方面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实施宪政的必要，毛泽东很快决定，不仅要迫使这个初步好转得以实现，而且“还要争取彻底好转，即大资产阶级下台代以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得一票”。①

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然而，国民党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提出，表明国民党不仅不想向共产党妥协，反而在向共产党进攻。《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扫数”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中共编八路军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② 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度全面分析了国际局势，虽然注意到蒋介石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的可能，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这种情况会在近期内发生，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划界（以新黄河为限），但在其他方面仍旧不打算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1940年6月；毛泽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1940年7月6日；由于在1939年开始的恢复管辖权力的“限共”行动不能约束华北地区共产党的八路军，1940年4月16日白崇禧上书蒋介石，主张用划界的办法把共产党的军队集中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据此开始制定划界方案；毛泽东：《时局与边区问题》，1940年9月23日。

② 《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27～230页。

退让。[1] 殊不料，国民党毫无商量余地，最后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电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2]

如何看待国民党在英法两国已无力东顾的情况下加紧反共部署的原因，这对共产党人明显地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尽管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但作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是否会离开英美集团去加入德意日集团呢？毛泽东对此颇多疑问。但是，蒋介石会不会加入英美集团去反对德意日呢？其强硬态度会不会与此有关呢？考虑到英美联合的力量远大于德意日，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有利于迅速打败日本，毛泽东颇感担心。他相信，一旦英美派的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必使"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而日本若投降美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国共两党必"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将占尽优势，"最黑暗莫过如此"了。[3]

其实，由于世界大战爆发一年之后欧洲仍然没有发生革命，苏联继续坚持中立立场，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有利变化又由于蒋介石可能加入英美集团而大打折扣，毛泽东已经开始修正"孤立和打击顽固派"的策略，提出"分化与拉拢一部分可能起变化的顽固派，尖锐批评维持现状的顽固派，而坚决反对投降派与可能的贝当政府，以期实现初步的政治好转"。[4] 至

---

① 《中国共产党复案》，1940年8月，中共南方局编：《国共两党谈判重要文件》，原件存重庆红岩纪念馆。

②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的皓代电》，1949年10月1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8页。

③ 《毛泽东关于形势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问题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第35页。

④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940年10月，前引《皖南事变》，第19页。

10月20日前后，他更明确断定：国民党"目前的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因而要求全党开始进入全面的防御状态，要稳健的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的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①

自10月19日何白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共产党既不能答应国民党关于一个月内将全部军队撤过旧黄河以北的"最后通牒"，就必须迅速准备对付国民党可能的大举进攻。因此，正确判断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及其背景，就显得异常重要。为此，毛泽东不能不反复权衡，以至当他刚刚确定蒋介石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依靠英美来对付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又马上觉得不妥。因为他注意到："美国现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目前还不可能立即打败日本"。而"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在【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做贝当的"，"故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但判断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其结果却使事态更形严重。因为这样一来，共产党不仅要立即准备"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全面战争，特别要防止"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军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封锁线是五道），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②

① 《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第35页。

② 《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10月30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恩来、德怀、胡服、项英电》，1940年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加紧准备对付蒋介石的严重进攻给周、秦、何、叶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注意到中共军队有受“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这使毛泽东联想到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过旧黄河以北必有重大阴谋。随着国民党再度通知中共中央，山东及华中的中共军队必须在11月20日之前全部开至华北，苏联大使通报国民党正在与德国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中共中央更深感事态严重。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①] 为此，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供看法。而中心问题就是军事上是“坐以待毙”，还是制敌机先，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②]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采取进攻的办法，但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故又难下决心。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时确像毛泽东所说，“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从资产阶级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③] 但既然注意到蒋介石在向德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毛泽东就不能不做最坏的设想。甚至，当毛泽东接连致电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大使都提出“蒋目前仍处在三角交叉点上”，还没有下投降决心之后，他仍旧坚持认为：“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

---

① 《毛泽东关于书记处对时局意见致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前引《皖南事变》，第75～76页。

② 《毛、王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策略考虑致德怀电》，11月3日，前引《皖南事变》第76～77页。

③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3日，前引《皖南事变》，第38～39页。

……而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的，蒋是等不到两年的。"①

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拿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冒险，这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本钱。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情况下，军事进攻也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赶过黄河，"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到底是危险性稍小的一种冒险。②

11月3日，毛泽东决心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行动的时间；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剿，"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③为了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一切引弦待发。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种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决胜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向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请求"指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决定必须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谅解和支持，也只有如此，才有备而无患，并有利于在"内战形式的民

---

①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0年11月2日；《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

② 《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

③ 《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1940年11月7日，前引《皖南事变》第83~87页；《毛、朱、王关于新四军北移致叶、项电》，1940年11月3日，前引第78页；《毛、王关于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策略考虑致德怀电》。

族革命战争”爆发后长期作战。①

11月4日，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说明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步骤的必要性。他说：“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取退让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②

必须指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并不是要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两党力量对比都还没有达到这样做的条件。采取这一重大步骤完全是国民党的军事威胁所迫，况且他相信：“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等，未必一定就会破裂两党关系。③ 但问题是，只要有破裂国共关系以至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的任何可能，就是强烈担心两面作战危险的苏联所不愿意见到的。因此，他们对于毛泽东的计划明显地持反对的立场。斯大林明确认为：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

①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中央书记处关于行动布置致恩来同志电》，1940年11月3日，前引《皖南事变》第78页；《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恩来同志电》。

②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

③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恩来同志电》。

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1] 因此，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函电中的形势估计和策略方针，明确地表示不赞成。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

共产国际的指示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他开始设法通过“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的态度，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通过改变外交策略，鼓动中美英苏联合一致，防止蒋介石加入德意日集团来争取国民党放弃和日幻想。中共中央也于 11 月 7 日发出正式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挽救时局危机。它开始相信：“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2] 当然，距离蒋介石的最后时限越来越近，毛泽东对此还是多少有些怀疑的，相信国共关系“好转前途很少”。但随着他不断得到国民党公开联合英美的情报，他也不能不决心放弃军事进攻的计划，“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力求不爆发

---

① 《崔可夫赴华使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3，35～36 页。

②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剿共降日致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电》，1940 年 11 月 6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80 页；《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恩来电》，1940 年 11 月 6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81 页；《中央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7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40～43 页。

大冲突”，以便“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①

从失败中找到成功

在确定了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性质，并确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为革命对象之后，毛泽东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国共关系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在抗日战争的情况下，双方的实力对比，国民党的对日态度与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仍然对中共的政策和策略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 1940 年秋天所发生的这一切复杂变化表明，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毫无疑问还要继续下去。在 11 月 20 日这个国民党规定的共产党军队移动的最后期限过去了之后，毛泽东对这种前景也不再表示怀疑了。他显然更加重视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他开始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而“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他甚至断言：蒋介石除了“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以外，“并无其他法宝”，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力量比上次更强大了，蒋决不敢“撕破脸皮乱打”。随着

① 在中共中央 11 月 7 日发布党内指示的当天，毛泽东却告诉周恩来说：我虽“为蒋留余地”，“但恐蒋不争气耳”。《毛泽东关于撤退桂林办事处时间问题致周电》，1940 年 11 月 7 日；参见《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 年 1 月 4 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变化及我之对策致恩来、德怀、胡服电》，1941 年 1 月 20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183 页；《毛朱王关于军事上应取自卫的防御战致德怀电》，1940 年 11 月 13 日；《泽东关于力求不爆发大冲突致周电》，1940 年 11 月 14 日。

收到季米特洛夫 11 月 25 日进一步强调巩固国共统一战线的来电，和得到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消息，毛泽东只能相信蒋介石已无投降之可能，进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①

1940 年 12 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援华，日汪又签订条约，国际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因此，尽管何应钦、白崇禧 8 日有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蒋介石 9 日又有手令限期 12 月 31 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毛泽东还是估计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② 虽然毛泽东并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国民党仍旧在加紧反共的部署，也很快注意到“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下降了”，甚至，考虑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与无产阶级共产党根本上势不两立，他还特别致电季米特洛夫，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使他不能不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毛泽东当然也看不出蒋介石目前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他只能把蒋介石的反共部

---

① 《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致周恩来等电》，1940 年 11 月 21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101～102 页；《毛泽东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之实质及我之方针致周恩来等电》，1940 年 11 月 30 日，前引《皖南事变》103～104 页；《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关于利用日汪合流时机准备政治攻势致周叶电》，1940 年 11 月 30 日。

② 《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彭叶项齐代电》，1940 年 12 月 8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89～97 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236 页；《毛、朱、王关于目前局势致胡陈并告叶项电》，1940 年 12 月 16 日；《毛、朱、王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之形势致彭左、叶项等电》，1940 年 12 月 19 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政策问题的报告》，1940 年 12 月 13 日。

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1] 殊不料，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一次预谋已久的既不大也不小的剿共战争，一举消灭了新四军皖南军部北移部队近万人，俘虏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甚至，蒋介石还迅速下令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并宣布其为“叛军”。[2]

再也没有比这种打击来得更沉重的了。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他不是没有预见到这可能到来的反共战争，他也不是没有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但是，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他相信了共产国际！甚至，他并不是没有过怀疑，但季米特洛夫刚刚批评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破裂就来了！如今，蒋介石的进攻开始了，而共产党却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他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3]

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会把蒋介石的这种进攻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进攻刚一发生，他立刻就意识到应当马上“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蒋介石“一一七”命令一经宣布，他立即怀疑蒋介石“有与我党破裂决心”，蒋介石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其“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进而，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毛泽东认定：“蒋介石已把我们推以和他完全对立的地

① 参阅《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及其军队中各派系情况致恩来电》，1940年12月25日。

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70～172页。

③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毛泽东关于将皖南事变告崔可夫并征询意见致周叶电》，1941年1月15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47页。

位，一切已无话可说”，因此，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他告诫全党：对此，“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甚至，对于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所表示的怀疑态度，他也毫不客气地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这些苏联人：“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①]

然而，中共这时有没有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全面进攻的可能呢？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人们显然注意到军事上的反攻缺乏必要的准备。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而更主要的是，“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

---

① 《毛、朱、王关于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致胡、陈电》，1941年1月13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39页；《毛、朱、王关于我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80页；《毛泽东关于考虑与蒋介石根本破裂问题致德怀电》，1941年1月23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87页；《毛泽东关于我们不能怕破裂致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90页；《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董、叶电》，1941年1月23日。

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人攻势”。[①]

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②] 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仍旧对中共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中共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为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③]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促使毛泽东重提利用日蒋矛盾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只是他注意到日本军队仍旧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而蒋介石本人看起来也尽力把皖南事变局部化，这使得“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当然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况且，毛泽东进一步注意到：军事上未来进攻的主动性，也还“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

---

① 《毛泽东关于考虑与蒋介石根本破裂致德怀电》，1941年1月23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恩来、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23日。

②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0日。

③ 《毛泽东关于询问崔可夫公开援助事宜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于处理两党关系必须坚持十二条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但无论如何，他希望苏联人能够明白："蒋介石反革命是定了的"。[1]

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思想提出之后，把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争夺实力领导地位当作共产党的重要斗争目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了。至于何时明白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来提出它，这充其量只是个时机问题。如今，这样的时机已经出现了。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提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尽管，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2]

从 1939 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 1941 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美英苏

---

① 见《毛泽东关于须尽量利用日蒋矛盾致德怀同志电》，1941 年 2 月 1 日。

②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 年 1 月 29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197～220 页。

援蒋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的不理解，特别是德国入侵苏联后国际环境转为不利，而“百团大战”后国内敌后战场的条件也极度恶化等等，许多原因使得毛泽东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积极实现他的新策略，但是，放弃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在 1945 年，当毛泽东正式决定向夺取全国政权迈进之际，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这种策略变动的意义。他说：在抗战开始阶段，我们一度试图“改造国民党，改造他的军队，改造他的政府”，那时，“我们估计国民党能改造，结果国民党未改造，我们在估计上犯了一个错误”。直到国民党“以后出来了一个‘限制异党办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同志才觉悟起来了。① 可以肯定，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人从“错误”到“觉悟”的转变，指的正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情况。同样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恐怕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 1949 年。

---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央党校油印件。

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

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连续7年来始终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这一公开挑战曾经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内国际各种民主势力的响应和支持，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由此一去不复返。就此作一历史的回顾与说明是有意义的。

"联合政府"口号的由来

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合作是建立在中共公开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

关于中共事实上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种种表示，自两党合作开始以来，在许多政治文件中都有所记载。如1937年国共商谈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四项保证"，表示它所领导的陕北特区政府和红军愿意接受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① 而后，中共中央虽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责任"，但它明确承认在实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力原则下，共产党目前的“政治领导”地位还只限于“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它只能“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来实现它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要走到“实力领导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它这时多次指示其谈判代表：在保证中共组织独立的条件下，应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或承认“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①

又如，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也提出过国共两党关系应当向着“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向努力，但它仍再三表示“拥护”依然是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并很快就提出：“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要“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肯定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②

又如，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尽管在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上已经根本破裂，毛泽东已经开始决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政权”，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共中央仍旧继续“争取以蒋为统帅”，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直至1944年春，毛泽东仍旧

---

① 《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3页；《洛毛致周并告彭任电》，1937年3月1日；《苏区党代表大会》，1937年5月；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29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41，16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670页。

公开宣称："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1]

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述中共对自身地位以及对国民党态度的措辞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渐变的痕迹。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实力对比的改变。毛泽东是重视"实力原则"的。早在1936年1月，当得知张学良有可能领导人数众多的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合作时，他就曾依据实力原则力主由张学良来担任未来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2] 1937年国共谈判合作，毛泽东也清楚地了解，当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1/20的共产党只能改制改编，服从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南京中央政府。即使在1938年，八路军的力量发展到20余万人，毛泽东依然承认，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力量上10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是，当1940年前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50万人左右，并且可能迅速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依据实力原则争取相应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共这时明确提出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等项政治要求[3]。毛泽东这时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更鲜明地反映出军事上开始举足轻重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想要改变前此的不平等地位，并一展鸿图的强烈冲动。虽然，考虑到国民党的军力仍四五倍于自己，再加上还有强大的日伪军需要抵抗，中共最终仍旧不能不表示："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但仅仅承认蒋个人的领袖作用，而不再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74，605，67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8~30页。

② 《毛泽东致德怀转克农电》，1936年1月20日。

③ 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四章。

这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前此的一党专政已经在根本上予以否定。由此可知，从1937年初承认国民党领导，到1944年秋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导致这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政党必然要逐渐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共中央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向国民党要求合理分配政权，却是1944年春夏以来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

到1944年上半年为止，中共军事力量仍在50万左右，而国民党的军队数量这时比它的4倍还多。而且，1943年底，蒋介石刚刚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出席了开罗会议，取得了"大国领袖"的资格，政治上风头正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根据苏联党的要求，接连来电劝告毛泽东注意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不仅没有设想过刺激国民党的问题，而且估计今年"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决定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之门，并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①] 所以，在1944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不仅明确提出派林伯渠前往重庆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而且对于大后方掀起的宪政运动，积极参加，要求开放党禁，重选国大，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毫无涉及。

联合政府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源于当时意外出现的两大因素。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河南战役的惨败。河南战役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作战。它开始于1944年4月中旬，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党一战区40万军队中许多部队竟不战自溃，以致损失人数达20万人以上，郑州、洛阳等38座市县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这一仗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作战

①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77页。

能力和士气的低落，而且也是国民党军事上和政治上种种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因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河南战役开始之际，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刚刚从延安出发。当时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还着重于缓和两党关系，因此所提条件政治上不外要求承认中共党、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军事上则只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武装，并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到五军十六师，最低限度则为四军十二师。正因为如此，林伯渠等5月2日到达西安，还在西安停留期间，就同前来摸底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达成了一项初步交涉书面意见书，约定“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①] 而书面意见中突出强调的只是：第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为四军十二师；第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地区，但改称为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第三，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及迫害八路军、新四军之军人家属，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②]

恰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在西安达成书面妥协意见之际，国民党中央军在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消息陆续传来，延安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军内部或者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或者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已经大部分失去战斗力，国统区因此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根本解决中共及边区地位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机会。毛泽东据此迅速指示林伯渠等改变谈判策略。他明确说：目前情况“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随后，中共中央于5月中旬重新提出全面解决两党关系二十条，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敌后政权，停止一切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特务活动，释放一切被捕的中共人员，甚至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助中

①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0日。

②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2日。

国之各种武器、弹药、药品和金钱等。[1] 中共中央并且开始公开宣传，它所抗击的伪军已经占到整个伪军总数的84%以上，而它所抗击的日军则是日军在华兵力总数的64%。"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2]

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与军事上的无能，激起了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胜利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在这时中共中央所提各种条件和方案中，仍未提出联合政府问题。不过，在5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态度开始变得十分明确了。在中共新的二十条和6月初进一步修改提出的十二条中，第一条就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字。[3]

要求实行民主，与要求解除党禁一样，其矛头无疑是针对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来的。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这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自宪政运动开展以来，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了国民党之外各党派谋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形式的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93~696页。

②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迫问题的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谋团的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7月7日；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43~244页。

③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提的八条口头意见》，1944年6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02~705页。

主要话题。但宪政的实施毕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且蒋介石已明确宣布，实施宪政必须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坚持要以国民党战前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来作为实施宪政的工具。承认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不仅战争结束前没有可能，就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后，恐怕也很少可能。因此，要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打算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和形式在这时具有关键意义。美国人这时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正好适合了中共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罗斯福提出来的。1943 年 11 月，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经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① 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不会加以理睬，美国方面此后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美国方面重新提出这一设想，也是震惊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通大陆架作战中的节节败退。6 月前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开始在大使馆范围内提出“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以便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确保中国尚存地区不致进一步落入日本手中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其他外交官的一致认同，也迅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认可。国务卿赫尔甚至直接打电报给高思称：总统和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

---

① 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 1946 年版，第 249～250 页。

据此，7月4日，艾切森代办在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建议。之后，高思同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亲自向蒋介石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①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高思以及美国政府这时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着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高思明确告诉蒋介石，他并没有设想过立即改组政府，尽管他相信，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也许不失为有效办法。但是，不论高思这时如何考虑，对于那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而反感国民党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根本改组现行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多半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随着7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向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也受命一同前往执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8月13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声言国共关系的症结，根本就在于此。② 但是，周恩来这时还没有谈到应当以何种形式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的问题。四天之后，即8月17日，当在重庆的董必武电询周恩来是否应当赞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4, Vol. 6, PP. 116~117, 120, 124~126, 132, 561, 567~569.

②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194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24页。

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左舜生扩大参政会的主张时，毛泽东才开始提到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复电中请董必武、林伯渠考虑，目前如果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不难看出，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开始考虑联合政府的提议，当时他们对提出这一主张的可行性还存着某种疑问，因此叮嘱重庆方面的代表就此一设想先行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暗中征询意见。①

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样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与随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明确的说法。9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征询党的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他当时特别说明：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显而易见，在得到了谢伟思的这一消息之后，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故仍多方征询意见。② 直到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虽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90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明确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但是在谈话中仍没

---

①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② 《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1944年9月1日。

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①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是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但是，这样一种方针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过右达不到目的，过左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民主党派的同情。根据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守，因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不能不十分慎重。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的设想。但一方面共产国际相信这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当时两党力量悬殊太大，这一主张最后只好放弃了。② 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③ 很明显，只是在9月1日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才最终确定了要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联合政府来作为自己当前的斗争目标。

---

① 转见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1~255页。

② 1938年1月，因得到国民党有意拉共产党代表加入政府的消息，共产国际专门电示中共中央：不应参加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据此明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转见《洛毛致朱彭任电》，1938年1月14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8日。

③ 谢伟思7月22日到延安，四天前，即7月18日，毛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他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11页。

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周恩来根据9月1日会议讨论结果起草的给重庆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的电报，通知后者应当以联合政府作为中共当前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的电报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①]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林伯渠9月15日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就需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②]

就在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了美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23页。

② 见《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大使高思，委婉地拒绝了高思关于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并含蓄地表示：希望美国人不要设想改组中国政府，因为在目前试图改变政府结构是错误的，他将来会考虑让少数党派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① 不难想象，蒋介石这时对来自美国和中共的两面夹击深感恼火，但这时他与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正闹得不可开交，不能四面出击，因此他在公开场合还不能不对此轻描淡写，有意置之不理，甚至表示对林参政员的态度“甚为佩慰”。②

蒋介石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之外。而高思大使同孙科、王世杰等谈“中国应组联合政府事”的消息也为延安所知。与此同时，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人们或集会游行，或著文讲演，来表达他们对厉行民主政治，废止一党专政的渴望。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与鼓动。著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昂，以及国民党著名人物冯玉祥、邵力子、钟天心、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均出席了集会。发言者不乏激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者，多数亦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后，国共之外最有影响的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等数百人，也分别签署了同样的声明与宣言，与中共遥相呼应。③

---

① FRUS，1944，Vol.6，PP.573~574.

②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情况的报告》，1944年9月24日。

③ 见《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7日；1945年2月13日；2月22日；《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21~122页。

这种局面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的自信心。毛泽东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对此颇有感慨，说：过去我们的思想常跟不上形势，估计不足，总是认为国共之间，蒋介石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日本打河南之际，我们对国民党还是麻痹政策；直到后来提二十条、十二条，也未想到要求改组政府。现在看来确实时机成熟了，谁都看得出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态度再强硬，坚持不妥协，结果也是拖的局面，不致有太大的危险。[①] 但是，当有人提出应当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争取发展成第二个中央政府时，毛泽东却颇多犹豫，毕竟这里存在着一个革命和改良的重大区别。他明确讲："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同样，对国民党，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非联合不可。他特别告诫全党："国民党既然这样坏，为什么还要他？原因是日本人还在面前，这是基本原因"。其次，"外国人还要他"。第三，也"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虽然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它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同时，目前"群众还未觉悟"，也还承认他们，我们"不可因为一时气愤就'打倒'他们"，"要照顾群众"。因此，马上提出革命的口号则不免有脱离群众、自我孤立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认为：还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好，虽然它还不是一个革命口号，但它也不是改良主义的改良口号，而是带有革命性的改良口号，是等候群众觉悟、发展自己力量，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②]

肯定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并不等于中共中央相信他们真的能够迫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同意改组政府。毛泽东、周恩来这时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认为存在

---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546~547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3页；《毛主席在党校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552~553页。

着国民党同意召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蒋介石充其量只会邀请几位共产党领袖到国民党的政府里面作官，摆摆样子罢了。因此，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干脆像英美两国抛弃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政府转而援助铁托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撇开国民党，直接与延安打交道。① 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这时突然出面调处国共关系，竟然使联合政府的实现真的一度产生了希望。

赫尔利出面调处国共关系，基本目的其实是军事上的，是想要促使国共两党军队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在统一指挥下全力对付日本人，从而挽救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军事危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相信有必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来促成军队的国家化。为此，赫尔利从一开始就向国共双方许诺，一方面保证支持蒋介石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中共驻重庆代表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甚至租借物资的分配也“不应偏于那一党”。他最初提出的方案也明确主张，中共承认军队统一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则必须同意根据民主原则组织政府，并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② 鉴于赫尔利两次同中共代表谈话都要求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表示愿意支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明确认为，在承认蒋存在的条件下，看来可以迫使蒋“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③ 这样的“交易”在 11 月上旬似乎轻而易举地就接近于达成了。

11 月 7 日，赫尔利带着他与蒋介石商定的方案飞往延安，

① 《党史通讯》，第 20—21 期，1983 年 11 月 5 日。

② 赫尔利在 10 月 13 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明确认为，中国目前实际上还是一个独裁国家，有必要将其推向民主道路。并见 FRUS，1944，Vol.6，P.659.

③ 《毛泽东年谱》（中），第 552 页。

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修改过的这一方案其核心在于突出强调了"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①] 其中对改组政府问题一句未提。尽管赫尔利当场许诺说，蒋介石正在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却明确表示：首先应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双方谈来谈去，最后赫尔利被说服修改条文，将第二条改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第三条改为："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②] 对于修改以后的这五项协定，不论赫尔利，还是毛泽东，都感到相当的满意。赫尔利在与毛泽东双双在协定上签字之后，就立刻打电报给罗斯福，声称"这一修正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毛泽东也致电罗斯福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① 《赫尔利带来之五条》，1944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第 395～396 页。

② 该五项协定另外三条内容分别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延安协定草案》，1944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第 393～394 页。

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1]

与美国总统特使就联合政府问题签订协议，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发动要求联合政府的政治攻势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毛泽东为此再度向党内解释说：要知道国民党还有200多万军队，并且还得到国际国内的承认，而我们还只有63万军队，地区也很分散，与之妥协仍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这个五点协定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只是同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我们没有损失我们的解放区，没有损害我们坚持的民主原则，相反，只要蒋介石签了字，我们就攻破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把一个明确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协定条文拿到重庆去要蒋介石签字，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不论蒋介石如何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但在触及到他和国民党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绝不会听任美国人的摆布。何况，蒋介石也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它也只能选择国民党，而不会选择共产党。因此，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赫尔利带回去的五点协定。在得到蒋介石同意的所谓"复案"中，惟一的让步就是公开承诺，在中共同意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后，国民党政府同意"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2] 当然，这一回赫尔利又悄悄告诉周恩来，蒋介石并非不允许你们参加政府，只是他不愿写在纸上，不想让人认为是共产党要求的结果，反对用"联合"这个字眼儿。其实，是不是一定要逼国民党承认联合政府并不重要，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干，先参加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最高统帅机构，最好里面既有国共代表，也有盟国方面参加，设置一个盟国的统帅，以公平的态度来指挥和装备双方的军队。11月22日下午蒋介石召见周恩来、董必武时也说，我

---

① FRUS, 1944, Vol.6, P.699;《毛泽东致罗斯福函》，1944年11月10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他同时向赫尔利许诺说，只要中共接受他的复案，马上就可以开始改编和装备中共军队。①

面对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毛泽东显得十分气愤。他开始电示周恩来：应立即与有关朋友商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事，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同时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据此，周恩来在重庆与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磋商。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考虑到从争取美援的角度不宜让美国为难，但可以提出解放委员会来逼一逼美国和国民党，周恩来于 29 日致电延安，提议另提新案答复国民党。周恩来在新拟的草案中提出："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如果此议一时不能实行，"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同时，"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②

周恩来的提议意味着中共事实上可能要从联合政府的要求

---

① FRUS, 1944, Vol.6, PP.697~698.

② 《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 年 11 月 29 日。

上后退。毛泽东对此颇有些疑问。他得知周准备提出复案，当即要周返回延安进行讨论。在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进一步提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依据延安协定进行谈判，坚持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仍是拖；一种是干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我们的将来，但要冒险，蒋介石可能有词可藉，美国可能不同我来往，结果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公开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会孤立？但是，毛泽东看来还是对此抱有某种希望。为了唬一唬赫尔利，也是为了要看看风色，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会后马上找来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宣布说："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受命写信给赫尔利，表示中共准备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①]

中共方面的表示果然惹得赫尔利大发脾气，特别是周恩来关于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的威胁，使赫尔利坐立不安，声称毛不可信赖。包瑞德急忙通过中间人转告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说明他本人虽然相信中共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不赞成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但中共应当知道华盛顿今天还是支持蒋的，许多美国人，包括罗斯福、赫尔利，对中共也不了解。况且毛泽东与赫尔利当初都曾答应对条约内容保守秘密，不应使他太难堪，并如此之快就准备破裂步骤。他明确提出疑问：中共突然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否存在着苏联背景？无论如何，从9日起，进攻贵州的日军已经开始撤退，蒋介石已可以挺直腰杆儿宣布不需要利用中共军队来抵抗日本进攻，这个时候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一旦蒋宣布你们为分裂行动，转而以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564页。

汉奸名义打击你们，对你们十分不利。[①]

赫尔利和包瑞德的反应使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恰恰证实了他此前的担心。得到王若飞来电的第二天，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就召开会议，与会的领导人几乎一致主张将成立解放委员会的计划暂时放一放。没有人不了解，搞解放委员会就是做另立中央政府的准备，也没有人不希望尽快搞垮蒋介石，问题是自身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舆论是否已经造好，人民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讲：我对此事一直感到有些不安，我们的一切计划是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现在也确实相当衰弱，但他毕竟还有一点优势，即还占有一些二等城市，而我们拥有的只是三等城市。恐怕要到反攻的时候，我们才能占据更多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本准备胜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包括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都还要提要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解放委员会要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只在内部酝酿，谨慎有利，美蒋可以放心。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天致电王若飞，要求他通过包瑞德等向赫尔利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延安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解放委员会几个月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所拒绝的只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当然，毛泽东同时也并没有忘记提醒党的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这个准备一定要。"[②]

12月15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提联合政府问题。他宣布："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

---

① 《王若飞致毛、周、董电》，1944年12月11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中），第564～565页；《毛泽东在董必武报告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0日。

的总任务。[1] 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谈判之门并未关闭，但若不能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在国民党一党政府内进行个别人事更动，继续谈判毫无意义。[2] 此后，赫尔利虽仍再三要求恢复两党谈判，但中共中央始终以“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为由，予以婉拒。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很明确，抓住联合政府的口号不放，以此来继续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同时全力发展自身力量，争取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掌握整个中国的命运。为此，周恩来于12月28日进一步致书赫尔利，声明：“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的探讨。”国民政府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应当首先自动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并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3]

“联合政府”主张的变化

中共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变得极端被动。蒋介石所做的关于战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许诺，也因此变得一钱不值，社会上几乎人人都相信国民党应当尽快改组政府。赫尔利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但他更担心的显然是国民政府会

---

①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6日。

② FRUS，1944，Vol.6，PP.739～740.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周恩来致赫尔利将军的信》，1944年12月28日。

不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过大而濒于崩溃。相对于他曾经赞同过的政治民主和联合政府而言，蒋介石的存在以及保持中国的稳定对美国的利益更是第一位的。因此，赫尔利在刚刚取得了新任驻华大使职位之后，很快就致电美国国务卿，要求确认他的主要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①]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地位稳固和根本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赫尔利费尽心思地设想了一个用所谓战时内阁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的连环计。经过赫尔利的反复劝告，蒋介石终于在 1945 年元旦发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告，公开宣布，他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了新的三项办法，准备在行政院以下设置具有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作为行政院决策之机关，延请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中。以此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不过在形式上指派国共及美国军官各一人负责中共军队的指挥、改编及军事补给等事，以美国军官为总指挥官，直接向蒋介石负责。[②]

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让步之后，赫尔利相信他又有了与中共方面讨价还价的资本了。他一面致电罗斯福，声称只要能够进一步确认苏联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就不难把共产党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一面再次于 1 月 7 日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允许他与国民党代表一同前往延安重开谈判。[③] 而在蒋介石公开表示战争结束之前准备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之后，中共中央也不能不急谋对付。毛泽东因此明确表示同意派周恩来再度前往重庆，前提是国民党应同意"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

---

① 《中美关系资料》，第 1 辑，第 139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294～295 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297～298 页。

地位及往返自由。”中共中央此举旨在用党派会议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国民大会，因为，如果让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那些国民大会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利”，结果丝毫也不会改变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①

24日，周恩来再赴重庆。当天，宋子文向周恩来提议行政院下设置由国共及其他党派合组的直属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委员会（或曰最高国防委员会），被周恩来当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与宋子文再向周恩来提议国民党正式决定的新的三项办法，又遭周恩来的反对。周25日公开发表声明称：此次来渝，就是来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的，第一步首先应当召开党派会议，以此来作为召开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并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甚望政府速加采纳。”②

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再度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甚至国民党内众多高层人物也在私下里对此表示赞成。2月2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开始让步。王世杰当晚向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仍照国民党所提组织有各党派参加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但冠之联合政府的名义；一是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但名称应加以改变，并加入无党派人士。周当场表示，不论何种名义，只要是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不受国民党干涉，有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能够改组五院和军事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572页。

② 《周恩来抵渝后的声明》，194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8页。

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共产党就会赞成。至于党派会议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会议名称最好不改，至多也只能改为政治会议。第二天，王世杰又带来国民党方面的新提案，同意召开政治会议，讨论“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和“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前提是这一会议的性质应为“咨询”，会议名称应改为“政治咨询会议”。[①] 王世杰并解释说，他们同意“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其实就是同意改组政府，只是文字上不便直接表示而已。但是，国民党的这一让步远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他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并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②]

2月初，苏联红军迫近柏林，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苏联明显地已有可能转过身来参加对日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相信美蒋会“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因此主张周恩来在成功破坏了蒋介石关于“还政于民”的鼓惑宣传之后，就迅速找理由返回延安，不必就党派会议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周旋。在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新闻处电台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更是断定“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

① 《国共谈判文献》（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302~303页。

②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0页。

大骂”。[1] 鉴于此，周恩来接连会见赫尔利与蒋介石，除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结束党治、改组政府和起草共同纲领外，又再度口头提出四项要求。赫尔利虽百般劝说，但不起作用。蒋介石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开党派会议，声言他只能将政权交还人民，而不能交给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说什么改组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宣称只有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才有权组党等等。至此，国共谈判再度陷于僵局，周恩来乘机返回延安。想不到，蒋介石于3月1日竟进一步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因此极端反感，提出：国民党既然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他甚至一面指示各地准备成立具有独立地方政权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面亲自挥笔为新华社写文章，严厉地提出：中国人民应该振作精神，“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城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2]

当然，报纸上的谴责是一回事，实际政策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明确讲，我们今天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而非砍头政策。这叫“留有余地”，否则会犯政治错误。因此，毛泽东这时为他称之为“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报告，仍旧题为《论联合政府》。他明确讲，我们长期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终于找到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没有料到这个口号很快的抓住了群众，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考虑到战争临近结束，自己的军队还不足90万，美苏英等国也把蒋介石的政府视为正统，毛泽东估计这个联合政府多半还会有三种可能，即一是要我们交出军队，蒋介石给我们官做；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

---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576，579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第583页；《解放日报》，1945年3月9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3~804页。

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1亿5千万以上，那时把政府设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毛泽东明确主张："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前途，"在蒋介石缩小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①

1945年4月23日，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宣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他认为，应当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全国力量，配合盟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再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十分清楚的是，他这时所主张的未来的联合政府，更多的其实是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他明白宣称：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仍然应当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②

自1945年开始，中共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据2月份的统计，其军队人数已由年前的63万增加到70万以上。而到中共七大召开时，仅两个月时间，其军队人数竟猛增近20万，达到90余万人。但是，中共这时军事力量还很不集中，根据地相当分散，另外装备也十分欠缺，仅有各种步骑枪约39万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586～5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56，1062～1063页。

支，各种机枪9千余挺，迫击炮、掷弹筒等数百架，大炮极少，更没有坦克、飞机之类的现代装备，与200多万正在陆续得到美国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不仅数量上相差甚多，装备上相差得更远。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明确讲：必须要“武器加数量”，“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军队太分散了，根据地人口太少了，“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①

除了军事上存在着不利因素之外，这个时候政治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困难。本来，中共中央对通过美国逼迫蒋介石在政府问题上让步抱有某种期望，七大召开期间却得知赫尔利4月初一反常态地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过去有关中共作用的说法都是夸大的，美国政府将只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而不同中共合作。② 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毛泽东估计“美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由于德国已经战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面援助与支持，从而大大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不能不对战后国内形势开始作种种最坏的准备。据此，中共中央一面再度表示愿意就前此提议的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改革问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一面下决心公开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以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当然，毛泽东告诫说，我们这

①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② 关于赫尔利的这次讲话，延安的《解放日报》于5月8日作了公开报道，这说明延安得到这一讲话内容的时间应不早于5月初。

个代表大会仍旧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最好的结果是向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可能是经过一段曲折，先是成为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经过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①

7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前来延安推动国共谈判的6位参政员，再度向国民党表明愿意谈判的立场，即愿意在国民党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同意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前提下，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的政治会议。② 随着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公开发布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度空前加剧。中共中央一面加紧做好应付内战的一切准备，一面又不能不审时度势，再度强调与国民党恢复谈判的必要性。它这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③

形势的发展颇为出人意外。毛泽东始终相信：国共反映美苏，战后中共应该可以背靠苏联来抗拒美蒋，想不到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却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承诺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都只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苏共中央还专门打电报来，要求毛泽东务必要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绝对不能和国民党打起来。考虑到“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而苏美英关系复杂，都不想打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608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7，810~813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1945年7月4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14~815页。

③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7页。

仗，国共两党间全面对抗的条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于8月23日正式决定提出包括要求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成立联合政府在内的紧急措施若干条，以便重开谈判。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通过谈判争取联合政府并无任何幻想，毛泽东一面表示，由于美国的干预，“我们现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要准备相当长的时期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一面又说：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多半“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主张作最坏的打算，准备“作城下之盟”，即准备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准备必要时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以便换取成立由自己领导的华北政治委员会，和取得在东北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就此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①

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至此，中共中央除在报纸上仍有过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个别宣传之外，在实际政策上已经放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周恩来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就明确告诉国民党代表：中共为了两党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已经在政治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这包括：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国民党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49页；《毛泽东年谱》（下），第10～11，14页。

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 但是，正如毛泽东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即使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放弃对长江以南根据地的控制，国民党也还是不能允许共产党取得对华北的自治和在东北占据优势。双方谈来谈去，除了蒋介石许诺可以允许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国民大会，允许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外，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因此，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明确认为，放弃要求结束党治和要求联合政府这种让步形式，是不可取的。他们一再宣称："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2]

重庆谈判没有实现中国的和平，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赴原本为共产党占优势的华北和先行进入的东北地区而愈演愈烈。为了设法阻止苏联利用中国的混乱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945 年底再度决心介入国共冲突，并派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作为自己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停内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明确提议："支持民盟主张，先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去筹备自由普选的国大"。中共中央很快表示赞成。紧接着，杜鲁门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声明，主张中国废止一党训政，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党派代表参加，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共中央乘机重提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

① 关于联合政府的继续宣传问题，自重庆谈判开始后三个月内，仅见于 1945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303 页；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 44～45 页。

② 《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编》，第 140 页。

国民政府”。[1] 战后几个月间中共军事力量在华北和东北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使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资本。

由于有马歇尔的干预，苏联大使的劝告，国共两党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于同时召开了。面对美国的压力和中共的强大实力，蒋介石已不能不同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了。甚至，国民党提出的“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试图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要由蒋介石提名，和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也因受到中共及民盟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超过一半，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且无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蒋虽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议案于复议时如有3/5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才能通过。这一结果虽然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还“存在着距离”，但无疑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因此相信这是“很大胜利”，相信“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并因此正式宣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正式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并为此具体拟定了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人员名单，准备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

---

①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1月28日首先提议美国应促使蒋介石同意召开党派代表会议实行改组政府，他们确信这是消弥中国内部冲突的重要途径。此后，杜鲁门及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马歇尔12月11日谈话时明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希望中国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的国民政府。FRUS，1945，Vol.7，PP.745～746，767～769；《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38页。

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及不管部的部长人选。[1]

政协协议的达成，国民党被迫同意改组政府，以及中共方面准备走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相互牵制，国内国共两党力量日趋接近在政治上的反映。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快就开始困扰共产党人了。这不仅在于蒋介石于政协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就开始反悔他所承诺的妥协，密谋推翻政协决议[2]，而且也在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政协军事问题决议紧接着将要开始的整军谈判抱以严重的怀疑，担心交出军队是否真能换得政治民主化？2月10日，就在蒋介石扬言不赞成政协决议的当天，重庆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在较场口对庆祝政协成功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消息传来，毛泽东迅速开始对中共是否应当走法国式道路的问题表明怀疑的态度。他断言："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我们不能像法国共产党那样，交出军队到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去当部长。因为蒋介石绝不会把他的军队真正国家化，更不会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逃脱，到头来很可能被消灭。[3]

一方面是蒋介石绝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从此拖延和阻挠政府改组工作的进行；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

---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3~45，58~59，70~71页。

②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全集》，第37卷，第333~335页。

③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57页。

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 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转眼之间就丧失了。蒋介石很快开始发动全面战争，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这种结果无论在这时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也是惟一的一种选择。只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得到它所盼望已久的种种物质条件，今非昔比。战争的结果，共产党日益强大，而国民党日益衰弱。终于，毛泽东所盼望的那种“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的前途渐渐出现了。新的“联合政府”注定要成为排除蒋介石国民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那种曾经被共产党人几乎视为必须经过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计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535，1159页。

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战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推动革命的种种动力，却多少忽略了对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迄今为止，注意到分析说明战后中国革命外部条件的文章著作与那些强调中国革命内部原因的文章著作相比，可以说屈指可数①。而不少谈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习惯于把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具体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或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关战后外部世界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所起作用和意义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讨论。

何谓战后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通常，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战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结果，中俄两国档案公布的迟缓就极大地妨碍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严格说来，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

---

① 比较多地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的著作，主要有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 1992 年版）；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8 年版）；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ses Civil War, 1944—19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等。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任东来的《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原文载于《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联究竟在何时何地向中共具体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它其实更重要地反映在，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迅速分化与改组，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机会，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于外部因素和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对最具可比性的例子。两国同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在国内都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较战后中共当时在国内的力量为强，结果却是一个惨遭外部干涉而失败，一个轻而易举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有过一个划分双方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腊划在了英美一边，结果不仅英美敢于大胆干涉希腊革命，而且当希腊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时，俄国人却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眼看希腊共产党人被强敌所压倒。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者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中革命一方是否居于优势的地位，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很大程度上恰恰接近于希腊，而不是南斯拉夫。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复辙，遭到美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军在华北登陆助蒋接收……，一切都显示共产党人正在陷入希腊共产党人曾经遭遇过的困难境地。但是，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并没有干涉，共产党只用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由弱变强，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取得了世人意想不到的全面胜利。共产党真的不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美国人为何不敢出

兵干涉？……十分明显，仅仅用毛泽东如何“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本文准备就战前战后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生成和作用做一扼要的分析，旨在说明，战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①]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

① 除了60年代 Anthong Kubek 所著《远东是怎样失去的》从相反的角度探讨美国丢掉中国的教训以外，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一书大概是最早从论证美国与新中国早应友好这个角度谈问题的书了。埃谢里克书，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约翰·P·戴维斯和约翰·C·文森特等人。[①] 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因为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②]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

---

① 伊利·雅克·卡恩给这群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年轻职业外交官起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中国通”。在他所列举的名单上，比较有名还有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等。参见伊·卡顿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谢伟思的有关报告，主要部分已经收录在埃谢里克前引书中；戴维斯的有关报告，除了可以在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看到相当部分摘要以外，还可以见FRUS，1942，China，pp. 226～228；FRUS，1943，China，pp. 258～266，397～399；FRUS，1944，Vol. 6，p. 308，667～671.

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1] 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2] 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作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4]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做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

---

① FRUS, 1943, China, pp. 193 ~ 199.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4 ~ 595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587 ~ 588，592 ~ 593，595 页。

④ 埃谢里克前引书，第 249 ~ 269，271 ~ 274，304 ~ 307，317，326 ~ 332 页。

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① 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②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

① 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 1980 年版，第 542～545 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3，China，pp. 258～266.

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①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②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

① 见埃谢里克前引书，第221～225页。

② FRUS, 1944, Vol. 6, pp. 667～671.

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他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所知甚少。①

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换言之，一

① FRUS, 1944, Vol. 6, pp. 667～671.

且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其实，随着欧洲战争接近胜利，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渐渐暴露出来了。而它所带来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美英与苏联之间的问题。

还在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中，苏联与美英之间就已经开始产生分歧。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苏联两败俱伤。[①] 为了战后苏联自身的战略利益，苏联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相继开始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同样，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的崛起，英美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

---

① 时任东南亚盟军副参谋长的艾伯特·魏德迈就清楚地表示过这种态度。转见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56 页。

的政治空气，他们决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① 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英美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小国的争夺，最终触发了英美和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1944 年 2 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据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②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之机于 8—9 月间在

① 见温斯顿·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825～827，838 页。

② 参见叶戈罗夫主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 8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4～346 页；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1 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5～197，201～204，207～208，243，246～247，251～252，292～293 页；苏联外交部编，宗伊译：《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 128～129，153～156，178～179，181～183，184～185 页。

华沙发动的起义，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①]的重大阴谋。[②]结果，英美和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苏联的态度不能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指责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③]

---

①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设在卢布林而得名。

② 有关波兰国家军敌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的程度，可以从苏军在华沙起义期间得到这下面这则国家军的传单中略知一二。传单称：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惶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自由波兰万岁。"转见吴伟编辑《苏联与1944年华沙起义》中NO.07925号文件：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年9月19日）。

③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98，201，205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78～379，381～382，385，386页。

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作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急匆匆飞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了。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间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要坐卧不安了。他这时已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一万或一万二千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①]

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主要的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

①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67～168，171～172页。

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反正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考虑到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 10 月 9 日商定，罗马尼亚苏联占 90%，希腊英美占 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 50%，保加利亚苏联占 75%，英美占 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①

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但英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就连 75% 的保加利亚、50% 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② 相反，当时，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对与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却是始作俑的丘吉尔本人。很明显，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产党专政的

---

①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337～339 页；哈里曼前引书，第 399 页。根据苏方的档案记载，当时经过莫洛托夫和艾登修改后的百分比协定对苏联更加有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三国苏联 80%，英美 20%，南斯拉夫各占 50%。见拉津斯基著，李慧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75～576 页。

② 由于英军开进雅典，支持保皇派的希腊军队和流亡政府回国，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在苏联的要求下与流亡政府妥协，参加了联合政府。但随后英军司令斯科比下令民族解放阵线交出武器，后者举行抗议遭到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起义从 12 月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2 月，由于民族解放阵线起义之初采取了扣压人质等一些丧失人心的作法，再加上希腊面积有限，军事上回旋余地过小，又得不到苏联的赞同，因此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于失败。

话，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政治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在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选择。如何检验各国人民究竟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就是：“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①

毫无疑问，这决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它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了。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美国决不应该让苏联为所欲为。②

①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77～178，192～193页。

② 哈里曼前引书，第385，387～389页。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定"的办法，通过与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苏联的合作。[①] 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过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从斯大林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双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 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再加上"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

① 有关美国当时需要采取这一妥协的原因，哈里曼的解释是有根据的。哈里曼前引书，第442~443页。

把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①

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且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优惠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对自己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提出更多的要求，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② 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深受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③

---

① 萨纳柯耶、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 1971 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258 页；哈里曼前引书，第 443～447 页。

② 吉拉斯著：《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页。

③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618 页；前引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首相的通信，第 309～310，316～317 页；前引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 195～198 页。

既然凭实力讲话[1]，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英美支持的当局合作。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2] 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的观点，即二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熟悉列宁著作的读者都会了解，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3] 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

---

① 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只懂得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师"？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519页。

② 转见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③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0～82页。

当时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大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①

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尚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生怕任何无

①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8～169页。

序的革命会毁坏了共产党人盼望了20多年才得来的这一系列胜利成果。更何况，要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绝不愿意把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①

相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我们都不能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苏联。所谓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民族的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

① 根据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可知即使在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也从未真正改变过对美英等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本质认识，但他们并不主张因此在战后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1944年1月11日苏联副外长迈斯基提交给莫洛托夫的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明确主张：为了争取战后能够保持30—50年的和平局面使苏联治愈战争创伤，推进欧洲的社会主义化，苏联有必要在通过军队向周边国家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同时，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合作关系，为此应避免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会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过于尖锐。报告相信，尽管美国是最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堡垒，但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需要扩张的地区十分广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可能与苏联妥协的。

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二战后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磨擦可谓层出不穷。这边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那边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①

不仅如此，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5月8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去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到不少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

---

① 参见张盛发：《苏联与战后初期的中近东危机：缘起与结果》，1999年3月20日首都师范大学“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散发论文。

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7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子，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① 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公开出面加以干预②，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到时候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作出了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承诺。③ 并且在签订了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后者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④ 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

---

① 有关斯大林过分要求的细节可详见邹谠的解说。邹谠前引书，第240~241页；并见FRUS，1945，Vol. 7，pp. 967~969.

② 参见FRUS，1945，Vol. 7，pp. 960~965，965~966.

③ 综合蒋介石给宋子文的指示，可以看出蒋对苏联的中心要求即在中共问题上。前引战时外交（二），第593~594，596，621页。而美国的态度虽一度强硬，但苏军进入满洲后，也明显软了下来。可对照美国政府8月5日和11日给哈里曼的指示电。FRUS，1945，Vol. 7，pp. 955~956，969~970.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自讨苦吃。他显然没有想到，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他所寄希望的美苏合作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明确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①] 随后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的种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文森特，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而文森特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苏联做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②] 此前始终主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麦克阿瑟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领包括上海、烟台、

---

① FRUS, 1945, Vol. 7, pp. 869～870.

② 戴维斯前引书，第405～406页；邹谠前引书，第247～248页。

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的其实炸给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①]

1945 年 8 月 9 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 150 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人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做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要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而为了避免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赶不及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②]

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 9 月 11 日

---

①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 页；James V.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alter Millis, New York 1951, pp. 202～203; Current Richard,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37.

② 邹谠前引书，第 270 页。

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二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①

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单独占据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想不到如今美国却必欲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②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

①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172～188页；Sumner Welles，Where are We Heading? New York，1946，P. 380.

② James Matray，Captive of the Cold War，The Decision to divide Korea at the 38th Parallel，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50，no. 2，May 1981，pp. 145～168.

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

还在8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苏联取得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中共武装。9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苏联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任态度。① 而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更是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② 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提出和制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

---

①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4日。

②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9月20日。

占据东北①。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

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做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其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鉴于东北局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他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部署10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②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4日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

---

①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78～279页；《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

②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

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这次会谈后不过两周时间，已知中共方面就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①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刚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当机立断，决定依目前部队调动情况确保山海关一线虽暂时做不到，但仍可按照苏方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②

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也是尽其所能。它先是不顾美蒋方面的外交交涉，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东北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同时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交给中共接收；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苏军代表 10 月 25 日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如果国民党军在 11 月 15 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这一十分强硬的政治主张，主张公开宣

①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4 页；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 2 集，第 228 页；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44 页。

②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364 页。

布："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①]

但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料到国民党会以退为进，发动外交攻势。11 月 17 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处处制肘，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 15 日刚刚开始的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 4 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前已放弃了营口重新布防。

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波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 180 度的改变。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②] 结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改变了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

①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45 年 11 月 3 日。

②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11 月 18 日。

中央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

从上面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随着苏美关系的渐趋恶化和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反复，中共中央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不论这种改变与变动的内容中共是否都那么喜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

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

1945年11月17日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当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苏军公然支援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严重情况，并且声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2] 魏德迈对这种情况也有着更加清楚的说明与估计。他报告称：目前

---

①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开展东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29~432页。

② 电报称：“当日军投降时，东北诸省原无中共军队，此一事实即斯大林元帅亦曾予以证实。彼于八月下旬与哈利曼大使谈话中曾经如此中说（该谈话经赫尔利将军告余）。最近东北诸省境内有大部中共军队存在，自系由于苏军之支援。”苏军并且“使中共军队入占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以阻挠中国军队在该各地登陆。”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149页。

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十分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而苏联明确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为此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层层障碍。事实上，中国已经变成“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势必要动用大量的美国军队，而这无论从美国国内民众的愿望来看，还是从美苏关系的全局来看，事实上又是办不到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蒋介石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否则他不仅不可能得到东北，就连控制华北也难。①

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② 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为什么？邹谠的分析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以及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③ 但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

① FRUS, 1945, Vol. 7, pp. 627～628, 681～684；《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1959年版，第309页，转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② 美国政府始终声称他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证明苏军向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但严格说来，这多半只是其避免公开与苏联冲突的一种借口罢了。

③ 邹谠前引书，第310页。

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说到底，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的，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到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二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作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①

因为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自然更是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

① 根据邹谠披露的资料，美陆军在德国投降时约有 829 万人，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的强烈要求，到 1945 年 12 月，其陆军已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将近 423 万人，半年后又削减了一半多，只剩下不足 190 万人。一年之后，即到 1947 年 6 月，美国海陆空三军全部加起来也只剩下了不到 100 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即使在对苏联的恶感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很少有人赞成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邹谠前引书，第 317～318 页。

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1] 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2]

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做出选择。而要倒向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染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3] 这话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痴迷不误，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

马歇尔使华的头两个月，正值苏联寄希望与国民党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过程中。因此，苏联政府虽拒绝参加调处，对马歇尔使命倒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美英苏三国 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反而比 9 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显得气氛融洽，会议公报中美国甚至和苏联一起承诺不干

---

① 《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五）》，《传记文学》，第 36 卷第 4 期。

② 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卷，第 617 页。

③ 哈里曼前引书，第 600 页；FRUS，1945，Vol. 7，pp. 848 ~ 859；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 1973 年版，第 15 页。

涉中国内政，双方都要尽早从中国撤军。[1]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利用美苏这种暂时的并且是表面的"合作"，左右开弓，一时间也成功地促使国共两党互相有所妥协，达成了一纸停火令和几个政协文件。但从2月份美苏因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引发一系列冲突之后，美苏间敌对气氛明显加剧，国共妥协的趋势自然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2月间美苏关系恶化的最典型的反映，是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力主遏制苏联的著名长电，和苏军再度鼓动中共在东北抵抗国民党。凯南22日的这封电报对华盛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致成为一年后美国对苏冷战政策的基本依据。凯南在电报中断言，苏联领导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绝不相信苏联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观点出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切方法，包括参与国际活动和暗地里搞颠覆与离间，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美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应再对苏联抱有任何幻想，而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坚定自己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仰，并用以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不使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2]

就在凯南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苏军代表再度找到中共东北局，一面说明苏军主要负责人希望与东北局负责人见面，一面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

---

① 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曾反复就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质疑，坚持要美国说出撤军时间。FRUS，1945，Vol. 7，pp. 841～844，845～846；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3页。

② 转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2页。

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给予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和磋商。在第二天双方负责人的会见当中，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①]

美苏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2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开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苏联极感被动。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实际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推波助澜，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②] 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

3月8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

---

①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2月23日。

② 前引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26～427页；FRUS，1946，Vol. 10，p. 166.

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5个多军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三方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大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党。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高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为什么？[1] 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2]

4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并且说明，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3] 而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还进一步向东北局转交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根据苏军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开始在东北做出全面部署，拦截国民党军北上的阻

---

①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0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3月1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846年3月14日。

②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

③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4月3日。

击战迅速在四平和本溪打响。14 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 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①

1946 年 4—5 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守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②

但是，时至于此，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 5—6 月里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 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 100 多车皮。中国的内战已经名符其实地全面爆发了。蒋介石顿时捉襟见肘，在东北被迫转入了守势。极大地决定着此后中国革命命运的东北根据地由此得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地较量。欧洲的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

---

①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 年 4 月 19 日。

② FRUS, 1946, Vol. 10, pp. 1046 ~ 1047; Vol. 9, pp. 1042 ~ 1044, 1082 ~ 1083.

“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①] 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就注定了腐败和顽固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只能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直至引发全面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出台。

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缺少双方的宣言罢了。

① 华庆昭前引书，第97~98页；《新华日报》，1946年9月12日。

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

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之久的对立、冲突和血雨腥风的搏杀之后，要在国共两党之间找到一条妥协的和平之路，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情况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历史机遇。由于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由于整个世界需要和平，由于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政治走向的美苏两大强国也主张中国和平，因此，就在日本宣告投降，授降仪式还未举行之际，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就在重庆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谈判了。十多天后，国共两党达成了一项颇为鼓舞人心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宣布和平谈判已获重要结果。[①] 随后，在盟国极具显赫地位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受美国总统派遣，以特使身份亲来中国参与调处国共冲突，一时间和平发展的大门似乎已经对历经战乱和分裂的中国敞开了。只可惜，来自美国的马歇尔并不能消除国共两党之间的猜忌与仇恨。1946 年，美、苏、国、共及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和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国共两党还是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以下仅就这段历史做一回顾与评述。

走向和平民主的尝试

1945 年底，中国的局势异常复杂。一方面，自“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并企图迅速运兵以控制

① 转见《解放日报》1945 年 10 月 12 日。

华北，接收东北，而共产党则利用在华北的优势地位，切断华北各主要交通线，并迅速开进东北，控制了部分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甚至阻止了蒋军由海路进入东北的企图，使蒋介石陷于被动之中。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苏联须顾及外交信用，共产党军队的落后装备又一时难以改善，要阻止有着大批美式装备的蒋军向前推进，显然有极大的困难；但蒋介石要在华北和东北全面展开攻击，也明显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受命前来调处国共冲突，无疑成为复杂局面的一种转机。

对于马歇尔使华，国共两党的态度最初截然不同。蒋介石多次函电以示欢迎，并积极准备材料和方案，力图影响马歇尔和美国政策，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同时利用美国的压力得到战场上一时得不到的东西。但共产党却出于对其前任赫尔利扶蒋反共政策的厌恶，对马歇尔的调停不抱任何幻想。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对美国总统此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① 一方面出于策略考虑，在公开场合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欢迎②，另一方面在党内则明确指出，杜鲁门声明的实质仍旧是“扶蒋防苏压共”。

杜鲁门声明和其它一系列文件，构成了马歇尔赴华使命的主要点。它确实包含着扶蒋、防苏、压共的重要内容。杜鲁门等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以防止苏联控制满洲以至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必须设法制止中国的内战和混乱，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完整统一③。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和美国民主政治观念的产物，马歇尔使命也包含着某些共产党人最初所不了解的内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28—629 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 1945. Vol.7, p.793 ~ 794.

③ 参见 FRUS., 1945, Vol.7, p, 745 ~ 746、747 ~ 749、768、77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628 ~ 629 页。

容。这就是必须设法取消国民党的所谓一党“训政”制度，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举行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使他们得以参加政府，从而建立起广泛代议制政府。美国清楚地知道，作出这种妥协和进行必要改革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并深信有足够的办法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①。在这一点上，美国甚至成功地取得了苏联的谅解，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中，双方不仅相互承认了对方在中国目前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同意共同促进中国停止内战和实施民主政治②。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马歇尔的地位，而且也不能不迅速影响了共产党人的看法。

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与各方接谈。30日，国民党方面提议由马歇尔参加，会同国共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调处停战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颇担心，希望苏联也参加调处活动，但为苏联所拒绝。于是，中共中央不能不下决心接受美国政府代表单方面介入国共冲突的事实。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就此达成有关协议。③

这时，对于根本解决国共冲突的办法，国共双方的公开立场非常明确：蒋介石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双方主张南辕北辙④。但马歇尔似乎胸有成竹。调处工作一开始，他就一面提出实施停战和恢复交通的建议和办法，一面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停战、政治民主化和统编军队三个步骤来完成他的使命。

关于停战的建议和办法，马歇尔提出一份停战令草案和一项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具体计划。停战令的中心内容是全国停战及军队停止调动和恢复交通，但草案提出两点例外，一是国民党军队可以“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

① 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42页。

②③ 1945年12月30日、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④ FRUS., 1945, Vol.7, p.794～804.

境内调动”，二是应允许“为必须之给养、行政及警卫而作之纯粹地方性军队调动”①。对共产党来说，这种例外显然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意味着战争仍将不可避免，而共产党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考虑到军事上无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外交上又必须顾及苏联的信用和愿望，中共中央决定同意马歇尔的建议。② 随后，在1月7日开始的三人军事小组正式会议上，国共双方经过一系列具体磋商，逐项修改通过了马歇尔提出的这一草案，并于1月10日达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停战协定③。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式召开，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齐集一堂，讨论和商定国家大政方针。至此，美苏的干预和马歇尔的调处产生了明显的成果。毛泽东也公开认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④

共产党人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会议召开的这种积极态度，并不是一种宣传手段。共产党人在美国单方面调处国共冲突和停战协定问题上所作的种种让步，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在目前条件下实现和平。因此，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准备和国民党在全国包括在东北实行全面合作，并认为此后的斗争将由武装的转入非武装的，由军事的转入政治的。中共中央还为此明令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违者将受到处分”。⑤ 当然，中共中央也特别告诫各地领导人，独裁还没有完全打破，蒋介石也不会真的变成民主派，“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6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谈判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4日；FRUS.，1946，Vol.9，p.20—25.

③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④ 1946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⑤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1946年1月12日。

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1]。

果然，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的企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月14日，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就改组政府问题明确主张：（1）必须在现有之国民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2）增加人选应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3）国府委员会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以及蒋介石交议和1/3委员建议事项，蒋并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4）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2]。这一态度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扩大和改组现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3]。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4]。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马歇尔认为，必须促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重要让步，放弃"一党政府"的形式，尽量实现政治民主，如此才可能说服共产党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鉴于国民党的态度，马歇尔不得不放弃不干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形式的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

② 1946年1月15日《中央日报》。

③ 1946年1月17日《新华日报》。

④ 《中共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

许诺[①]，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他于1月22日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的立场，并提交一份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张立即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取代最高国防委员会，由蒋指定20人组成，其中9人为国民党，6人为共产党，1人为民盟，1人为青年党，3人为无党派人士。蒋可批准或否决该委员会通过之法令，但被否决者经该委员会委员14人再次赞同，则立即生效。蒋有权指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五院院长、各部部长以及各部、院委员等，但其中50%为国民党人，30%为共产党，20%由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热、察、绥、宁、鲁、冀、晋、湘、赣各省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市长应由蒋从临时国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共同提名的人员中指定，而该特别委员会须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2人组成[②]。马歇尔明白告诉蒋介石，成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将使蒋确实取得全中国的总统地位，而非如现在的一党领袖，并将保证中国的非共产党化。马歇尔声称，美国陆战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国民党在西北和东北的地位都已因苏联而严重削弱，如不采取变通办法，目前的中国将很容易受到苏联下层渗透方式的损害，从而使共产党的制度强大起来[③]。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影响。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④]，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⑤]之后，国民党代表逐渐在政协会上作出让步：承认应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

---

① 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曾明确表示："关于中国的团结的详细的必要步骤，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拟定出来，任何外国对这些事情的干涉，都是不适当的"，马歇尔来华后也多次表示，中国民主的形式应由中国人自己选择。

②③ FRUS., 1946, Vol.9, p.139～141、142～143.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71页。

⑤ FRUS., 1946, Vol.9, p.139～141、142～143.

关；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国民党不得超过半数；蒋没有紧急处置权，且蒋否决之决议如复议时有 3/5 以上委员坚持，则否决无效；凡重要决议均须有 2/3 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始可通过。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表示同意充分肯定人民权利和自由，愿意在协议上写上共产党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鉴于国民党作出重要让步，共产党方面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比例、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让步。由此，政协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事以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书面协议①。

政协决议的达成，对冲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确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②，并正式通告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③。

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关键的整军问题将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马歇尔看来，这是他全部使命中最困难的问题。但是，通过政协会议的结果，他看到自己在蒋介石国民党那里说话的分量；而通过与周恩来的谈话④和毛泽东的来信⑤，他确信自己也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因此，马歇尔踌躇满志，认为成功有望。他为此致电杜鲁门，不无得意地声称：“事态进展颇为顺利，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效果良好”，以“极机密方式”提交蒋介石的政治方案，现已“为

---

① 1946 年 2 月 1 日《新华日报》。

② 毛泽东 2 月 9 日对美联社记者谈话，1946 年 2 月 13 日《新华日报》；《中共中央关于打一大仗决定东北大局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 年 1 月 27 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 年 2 月 1 日。

④ ⑤ FRUS.，1946，Vol.9，p.148 ~ 152.

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相当确定的基础。”至于最困难的军队国家化问题，亦“有顺利解决之希望”。一旦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他就准备回国讨论对华金融贷款问题[1]。然而，马歇尔过于乐观了。

难以调和的矛盾

自停战谈判开始以来，马歇尔试图暂时把东北问题撇在一边。可是，到1945年底，东北地区已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20余万人，并控制了许多城市和乡村；而国民党虽顽固反对共产党在东北存在，但直到1946年1月，它进入东北的军队不过几万人，刚刚接收了几座城市。尽管马歇尔与蒋介石都寄希望于中苏条约的约束[2]，但东北毕竟是共产党决心保持的战略要地，而且已经建立了如此之多的军队和地方政权，不论中苏条约如何规定，也不论国民党采取何种不承认主义，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何况，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使苏联对美国控制中国的企图极度不安[3]，苏联也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步骤，通过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广大根据地的作法，确保东北地区日后不会成为美国反苏的跳板。于是，东北问题不仅成为国共

① FRUS.，1946，Vol.9，p.206～207.

② 中苏条约规定，苏联一切支持和援助都只提供给“国民政府”，并只有“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东北地区之主权，且在苏军恢复地区停止直接军事行动时，应由国民政府“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07～608、613～614页。

③ 这种不安在斯大林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蒋经国等人的谈话中有突出的反映，斯大林甚至明白告诫蒋经国，他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让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FRUS.，1946，Vol.9，p.848～850；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两党的内争问题，而且成为美苏远东战略争夺的重心。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问题十分严重，在停战谈判期间，共产党最终还是作了妥协，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东北争端。但是，由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此时在热河连战连捷，以致蒋介石完全不把东北的中共军队放在眼里，拒不承认东北有国共冲突问题，扬言只有接收主权和剿灭“土匪”问题，迫使共产党下决心在东北和蒋军作战，“以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①。这样一来，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成功后，关内一片和平气氛，关外却充满了火药味，大有一触即燃之势。

正在这时，蒋介石突然旧态复萌，在政治上重新制造紧张空气。他首先在国府委员党派比例问题上制造矛盾，以拖延政府改组；继而又以自己“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为借口，根本否定政协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煽动国民党人发难②。同时还公然唆使暴徒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圆满成功的大会会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

东北形势的紧张和政治环境的骤然恶化，使共产党再度强烈地意识到：蒋介石是不可能轻易放弃武力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军队整编谈判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对着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显然，由于政协决议已经明确规定了军队国家化的方向和步骤，拒绝谈判是极不适当的。但没有国家民主化，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无疑是假的，其目的只是要“化”掉共产党的军队。马歇尔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取消共产党手中的兵权。而严酷的现实却告诉共产党人，用军队国家化来换取国家民主化是有极大危险的。为此，中共中央一面赞成政协决议原则，一面通

---

① 《中共中央关于打一大仗决定东北大局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 年 1 月 27 日。

②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第 37 卷，第 333 ~ 335 页。

过整军谈判和争取东北和平的公开斗争，力图揭露蒋介石的骗人嘴脸。这样一来，和平统一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整军谈判正是在这样的气氛和条件下开始的。谈判从 2 月 11 日开始，2 月 14 日起正式讨论马歇尔提出的整军方案草案，国共双方除在第一期军队缩编比例、开始统编日期、宪兵性质和文件标题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之外，没有发生重大争论[①]。三人小组很快于 2 月 22 日达成一致意见[②]。25 日，经蒋介石和毛泽东认可，整军方案正式签字。该方案包括部队复员、统编及配置等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歇尔极力强调的所谓“西方军事传统”[③]。

马歇尔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只是一纸形式上的东西。其实质是要共产党的军队统一到所谓“国军”中去。而这个“国军”，在政府没有真正改组，或蒋介石国民党仍旧支配着政府大权的情况下，充其量不过是国民党“党军”。显而易见，要共产党现在就准备缩编和交出军队，完全是一种幻想。然而，马歇尔这时却充满了幻想。在谈判中，他坚持要写上：自协定公布三个星期后，双方应拟具并提交各自所有部队的全部表册，以及所保留的部队表册和头两个月复员的次序。他以为，只要逼得紧，事情就一定会像以前一样顺利进展。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马歇尔甚至自信地指出，“现在可以准备开始复员和整编工作了”，惟一的困难只是作为中间人的美国军官太少了[④]。紧接着，他兴冲冲地飞了将近半个中国，甚至跑到延安，去对在他看来“毫无怨恨样子”[⑤]的毛泽东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把政治分歧放在

---

① 参见 FRUS.，1946，Vol.9，p.211～258；《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0～64 页。

② FRUS.，1946，Vol.9，p.265～289.

③ 1946 年 2 月 26 日《新华日报》；《马歇尔使华》，第 60 页。

④ ⑤ FRUS.，1946，Vol.9，p.510～511.

一边”的时刻了[①]。

马歇尔的愿望确实产生了一些反响。3 月 6 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示除东北、山东以外各区、局领导人：部队立即开始复员 1/3，“于三个月内外完成”，并准备第二期再复员 1/3。随后，各地雷厉风行，拟定计划，并先后开始实施[②]。不过，坦率地说，这种作法一是为了“精兵简政”，二也是为了争取舆论，与马歇尔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相反，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反对在目前情况下交出部队战斗序列和表册，另一方面，也丝毫不打算把政治分歧放在一边。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在政治方面的宣传和斗争，并且把东北问题同政治攻势联系起来，决心以争取东北停战和争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之地位为目的。

共产党这时解决东北问题的原则是：（一）反对一党包办东北接收机构；（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三）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四）限制开入东北国民党军队之数量[③]。

3 月初，苏军在南满的部队陆续撤退，并先后通知中共东北部队，使其控制和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洮南等地，南满大部分工业区已为共产党所占有。这使蒋介石慌了手脚。他急忙找到马歇尔，一改过去态度，承认东北也存在国共冲突，要求速派停战小组去东北，阻止共产党进一步进入苏撤区。3 月 9 日，蒋介石就派停战小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经马歇尔修改后，于第二天转交给周恩来。蒋介石的条件无异于要求共产党从东北完全退出，而经过马歇尔修改的建议在表面上则缓和得多，但实质并无太大差别。特别是他突出强调停战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显然是想

---

① FRUS.，1946，Vol.9，p.501～502.

② 《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1946 年 3 月 6 日。

③ 1946 年 2 月 16 日《新华日报》。

回避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地位问题。这无疑是行不通的。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告诉马歇尔：把政治和军事分开的解决办法，是不能接受的。停战以来，共产党在东北军事上一让再让，就是为了争取东北政治上的民主和共产党的地位①。

共产党的态度已在蒋介石预料之中。这时，蒋懊丧已极，向马歇尔大发牢骚，埋怨杜鲁门不该用政府改组作为援华的附加条件，以致使他无所适从；埋怨马歇尔实际上作了共产党人的保护伞，政协和整军都使共产党有机可乘。他拐弯抹角地表示，过去不愿改组政府和派停战小组去东北，正是因为看出共产党的意图是想渗入政府控制其外交政策，使俄国人有机会插手东北问题，因而责任都在美国方面。他扬言：满洲问题能否解决，现在就取决于美国对苏联的强硬程度，"任何软弱都将意味着满洲会从中国被分割出去"②。

3 月 11 日，马歇尔按计划准备回华盛顿商洽金融贷款等事，但蒋介石的态度和东北的局势使他感到某种担心。为此，他不得不紧急拟就正式书面提议，提交国共双方代表，上午会见周恩来，下午又匆忙召集三人小组会进行讨论。但马歇尔的中心意图只是想派出执行小组而已。因此，当他在上飞机以前得知中共方面并不打算推翻关于同意国民党军队有权进入东北和接收东北地区主权的许诺时，似乎颇感欣慰③。

不过，问题比马歇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中央全会，准备公开推翻政协决议所确定的各项基本政治原则，并大肆攻击共产党④。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国民党代表坚决主张修改政协确定的宪草原则。这进一步激起了共产党的强烈愤懑。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国民党二中全会企图"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

---

①②③ FRUS., 1946, Vol.9, p.535~538、528~529、541~542.

④ 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32~1037、1047~1048 页。

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在坚持政协决议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①。

共产党这时主观上既不愿分裂，也不想打内战，但客观上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防共政策，坚持独裁体制，甚至在挽救东北不利局面的斗争中，也顽固坚持苛刻条件，不愿作任何有意义的让步，迫使共产党不能不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尤其在东北问题上，中共中央意识到，由于停战谈判同意国民党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却没有解决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已经给自己造成了许多困难。因此，此次谈判决不能作更多的妥协。毛泽东强调指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向三人小组具体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派遣小组进入东北的任务的提议。提议的主旨在于维持现状，协商解决一切③。这一提议显然与蒋介石的想法相距太远，因此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大战，致谈判停滞不前。

面对东北战争在即，停战小组迟迟不能派出的局势，马歇尔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明确指示他在三人小组的代理人吉伦：必须设法立即就派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否则后果“可能是致命的”④。显然，马歇尔已多少觉察到，蒋介石一旦走到必须用武力争夺满洲的地步，他就可能陷入泥沼而难以自拔，整个调处工作也很可能前功尽弃。为此，马歇尔在华盛顿不断地对他的下属发布指令，甚至派考伊上校亲自飞往延安讨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16日。

③ ④ FRUS.，1946，Vol.9，P.564～565、576.

论具体问题。但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3月中旬，苏联决定全部撤退驻东北之军队，国民党加紧军事进攻，抚顺、辽阳、铁岭一带受到蒋军直接攻击，中共中央决心夺取四平，阻止蒋军沿长春路继续推进。东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3月22日，蒋军攻占抚顺、辽阳、铁岭等地。27日进占开原，并向昌图、四平推进。同时分兵向鞍山、海城、营口方向进攻。共产党的南满解放区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一面指示周恩来提出折衷方案，使派遣小组去东北的协议迅速取得一致，设法通过停战小组延缓蒋之进攻；一面发布命令，要东北部队“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①，并指示东北局速与苏军交涉接收北满各主要地区②。

这时，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30日以前全部撤出东北③。蒋虽急令东北国民党军队全力推进，但亦深知至4月底无论如何来不及进占北满各战略要地。迫不得已，他一方面同意国民党谈判代表与周恩来就派遣小组去东北问题的折衷方案达成协议，一方面紧急呼吁马歇尔返华，以决定“东北问题之成败”④。

3月27日，三人小组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在这样一种特殊形式下正式签订。协定仅仅规定“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交涉进占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

③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一），第188～189页，战后中国（三），第101页。

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此外并无任何实质内容①。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和美国两方在一份以军调部名义下达给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的密令里，却指令负责小组工作的美方代表到东北后应极力协助"政府军"占领所有村镇、城市、交通线要点，以及所有公路、水运、空运交通及其设备和两侧30公里之地区，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矿山、电厂及其所在地区②。这势必要引起一连串纠纷并使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战的协定如同一纸空文。

4月初，执行小组到达沈阳，中共代表力主按照协定前往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四平、本溪、营口等地执行调处任务，但美方代表白劳德却坚持中共代表必须首先承认1月10号停战令所确定的原则，即国军有权在东北接收主权和进入一切苏撤区，致使调处工作无法进行。接着，鞍山、海城、营口等地相继被国民党攻占，国民党主战派顿时趾高气扬，就连美方代表吉伦也冷嘲热讽，竟然不把中共代表的抗议放在眼里③。蒋介石更公开扬言，共产党的行动已经"威胁远东和平与世界安全"，声称对共产党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④。

显而易见，和平的前景越来越遥远了。

战争解决问题

3月30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鉴于国民党违反四项诺言，破坏政协决议，擅改国大代表总数，拒绝中共在国府委

① 1946年3月28日《新华日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94页。

③ FRUS.，1946，Vol.9，P.719～721、745～746.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一），第76页。

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应有之名额，中共决定不提交国府委员名单[①]，不参加改组政府。

4月8日，美国代表吉伦站在国民党一边，要求东北中共军队停止移动，并撤离长春路及沿线城镇[②]。周恩来坚决反对，并致电中央：蒋"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以杀其锋"[③]。

此时，东北四平及本溪两处蒋军攻势猛烈。中共中央明确主张打胜四平、本溪两仗，不惜任何牺牲，阻敌北上，以取得在东北的巩固地位。而后，四平、本溪部队抵抗连连告捷，蒋之新1军、52军、71军主攻部队均遭败绩。至4月17日，毛泽东认为"东北局势已根本好转"，国民党"非重调几个军至东北不能采取攻势"[④]，于是，东北中共部队乘势拿下了长春市，并准备尽快"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与蒋之东北行营和政治经济委员会相抗衡[⑤]。

4月下旬，马歇尔出面调停东北问题，接连提出一系列停战方案[⑥]。周恩来及民盟立即积极响应，并提出具体建议。但因国民党这时军事上已占先机，蒋对各方建议一一拒绝，不愿作任何让步。他表示，或者将长春及长春路沿线30公里以内地区交国民党接收，或者中共退出长春再谈判其他，否则必以武力解决，不打下长春不止[⑦]。

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决心，声称他无

---

① 1946年3月31日《新华日报》。

② FRUS.，1946，Vol.9，P.719～721、745～746.

③ 《周恩来关于三人小组谈判情况等问题给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及叶、罗并饶的电报》，1946年4月8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势已根本好转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4月17日。

⑤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应迁长春等问题的指示》，1946年4月19日。

⑥⑦ FRUS.，1946，Vol. 9，P. 792～793、795～801、880～881.

能为力，决定暂时退出调处。此举实际上是马歇尔的一种策略，但他却美其名曰向双方施加压力。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警告说：马歇尔暂时退出可以理解，但若美国借机运兵借款以援蒋，东北战争就可能“变成全国性的内战”[①]。

周恩来的警告马歇尔当然清楚。他确也担心东北大打祸及全国，且深知国民党军事上有严重弱点，继续战争会使中国在军事、财政及经济上都陷于严重混乱[②]。但是，东北事关美国对苏战略利益，中共控制东北的势头必须遏止，因此在国共之争无计可施，而国民党又占优势的情况下，他只能继续支持蒋介石，运兵东北，以便使国民党有效地控制东北局势。当然，他仍旧指望停战，故一方面继续向蒋进言，一方面则力劝中共主动撤出长春，让执行部派员进驻，然后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从4月上旬到5月中旬，共产党约6个旅在四平一线阻击蒋军达一个多月，顶住了近10个师的轮番进攻，伤亡近两万人，且兵力全部投入战斗，极为疲惫。不得已，中共中央决定必要时“应主动的放弃四平”，同时要求中共代表团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经民盟提出“长春双方不驻兵”，组织“三三制民主政府”，市长由中间人士担任的建议[③]。但因5月19日中共军队被迫撤出四平，长春门户洞开，蒋介石气焰大盛，此议遂不了了之。不仅如此，蒋一面通知马歇尔：除非美方成员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他将不愿受任何进一步协议的约束[④]，以此来拉美压共；一面挥师北进，迅速拿下长春、吉林，攻占辽源、伊通、西丰、西安，并分兵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永吉、安东等城市推进，并扬言：“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

① 同上，P. 802~805；1946年5月1日《新华日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121~124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停战问题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5月15日。

④ FRUS.，1946，Vol. 9，P. 792~793、795~801、880~881.

叛乱也"①。然而，事与愿违。中共四平之战并未完全丧失战斗力，相反，被迫撤出各大城市，退据东北广大山地和乡村，恰恰有利于发挥共产党的优势。而国民党军又恰恰停在松花江南岸，没有继续乘势向北大举推进，夺取北满，结果中共取得了北满根据地，得以休整补充，国民党反而变得战线过长，捉襟露肘了。南满中共军队之后更乘敌北上，迅速展开攻势，歼灭184师（一部起义），重创207师，再下鞍山，直逼海城、大石桥、营口附近，迫使其北上部队不得不停止在松花江以南，不敢继续向北推进，其余各部则只能龟缩在几条铁路干线沿途的城镇里，根本无法展开。

对此，马歇尔早有预见。他反复告诫蒋："东北幅员辽阔，交通线绵长，中央军数量不足，无法处处设防"，应乘此"最好时机"，"与共方商谈解决一切问题"②。为迫使蒋让步，马歇尔甚至决心以宣布退出调处相威胁。终于，蒋亦意识到军事上的弱点。因此，为进一步调集兵力巩固南满，并在舆论上向中共施加压力，蒋宣布在东北休战15天，以便谈判解决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方案的具体办法③。但蒋特别声明："政府对收复主权保持自由行动一点，应始终予以维持"④。

对蒋之休战，中共当然不能相信。但考虑到"长期战争与我不利"，故同意与之和平谈判，准备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⑤。中共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仅以和平的方法是不能保持其基本利益及获得真正的和平。

---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13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三），第134页。

③ 1946年6月7日、8日《中央日报》。

④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第37卷，第348~349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我党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条件下实现和平的指示》，1946年6月7日。

果然，尽管周恩来先后在恢复交通、东北停战，以及共产党激烈反对的所谓美方人员决定权等问题上相继让步，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国民党却寸步不让。政治问题坚持不谈，军事问题则由马歇尔出面，强硬要求中共退出安徽、苏北、胶济路全线及山东枣庄、鲁东北、德县地区，放弃张家口以南、承德以南、鄂豫边区和山西闻喜地区，以换取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的让步。而中共在东北也只能驻军新黑龙江，兴安及嫩江省中部和北部及吉林延吉地区①，地方政权亦不能保留。马歇尔明知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并担心目前这种混乱局面继续下去会引起苏联干涉②，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国共两党的实力，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迫蒋让步，只是极力设法使国民党的条件表面上更容易接受，幻想如此可以促使中共作出更多的牺牲。

事实上，共产党并不寄希望于这次谈判。休战伊始，蒋军即向南满解放区进攻，并公开声明要继续其在东北的"接收"行动，要共产党人退出他们指定的所有城市③。毛泽东对此早有准备，遂命令山东解放区进攻被围各点，并由周恩来公开宣布"收复"由伪军占据的这些据点④，以示其强硬态度。同时，中共军队对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的进攻和在山西的战争挑衅，或坚决应战，或实施报复性措施。国共双方都很明白，目前的谈判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虽然双方都一再表示同意延长休战⑤，但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停止。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在

---

① 此一方案系马歇尔与国民党方面多次交换意见，精心策划之结果。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7 编，战后中国（三），第 180 ~ 182 页；FRUS.，1946，Vol. 9，p.1035 ~ 1037、1075 ~ 1081、1091 ~ 1099.

② FRUS.，1946，Vol. 9，p. 1099 ~ 1101.

③ 1946 年 6 月 7 日、8 日《中央日报》。

④ 1946 年 6 月 18 日《新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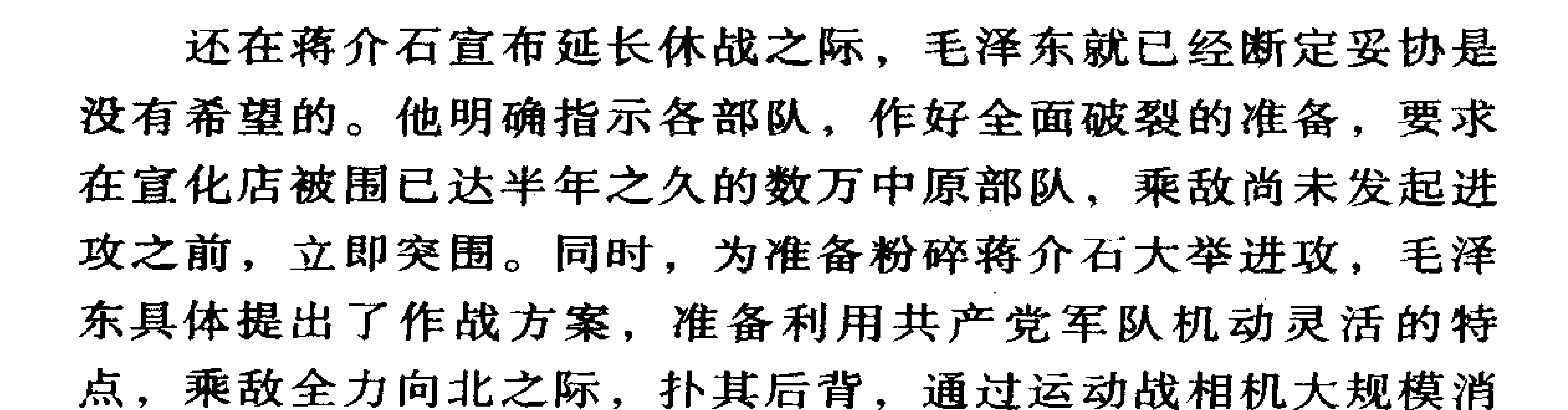
⑤ 参见 1946 年 6 月 22 日《新华日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663 ~ 664 页。

国民党目前统治之下，得到一种真正的和平民主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感到，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来自国民党的任何进攻"[①]。共产党确信："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关键取决于战争。"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②]。

6 月 30 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整军方案谈判的情况，称已让到"不增加师的数目，哈埠让政府象征接收，淮安、张家口、承德三地驻正规师，三地以南不驻正规军，驻保安队"，"仍未得蒋同意"，"坚持我让出"，"非要苏北、安东、承德不可"[③]。鉴于此，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蒋得寸进尺"，"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④]，下决心与蒋斗争到底。

"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


还在蒋介石宣布延长休战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断定妥协是没有希望的。他明确指示各部队，作好全面破裂的准备，要求在宣化店被围已达半年之久的数万中原部队，乘敌尚未发起进攻之前，立即突围。同时，为准备粉碎蒋介石大举进攻，毛泽东具体提出了作战方案，准备利用共产党军队机动灵活的特点，乘敌全力向北之际，扑其后背，通过运动战相机大规模消

---

① FRUS.,1946,Vol.9,p.1008 ~ 1020.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的指示》，1946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 年 6 月 28 日。

③ 《周恩来关于整军方案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6 年 6 月 30 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一个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 年 6 月 30 日。

灭其有生力量，把战争引向国统区，造成敌之混乱和被动。毛泽东已经看出，形势是极不利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从来没有这样丧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是打不了多久的。共产党作战愈坚决，蒋介石就愈被动；共产党愈向南发展，蒋介石就愈害怕。不怕蒋介石不妥协[①]。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鼓舞斗志，并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斗争，经毛泽东提议和修改，中共中央于7月4日公开发表了“七七”宣言。宣言尖锐抨击国民党，并且谴责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援助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宣言的主要精神是“坚持政治军事同时解决，即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全面实现政协决议及整军原则”[②]。目的仍是和平，而非宣战，故对马歇尔仍持合作的态度[③]。

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共产党开始采取尖锐立场，使马歇尔把国共两党拉在一起置于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幻想几乎破灭，但这位极度自信的美国将军仍旧试图继续自己的使命。为此，他亲自提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④]，力图借助这位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中国通”来缓和严重局面，找到一种使双方重新坐在一起谈判的办法[⑤]。然而，国民党7月3日单方面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又在山东、苏北大举进攻，在昆明公然暗杀民盟地方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

①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问题给郑、李、王的电报》，194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和方针问题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七七”宣言精神问题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1946年7月4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

④ FRUS.，1946，Vol. 9，p. 1278、1297~1299、1419~1421、1468~1471.

⑤ 参见艾奇逊著，居仁译《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6页。

等，使马歇尔再度失算。不仅共产党、民盟以及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宋庆龄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的行为[①]。一时间，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在舆论上极端被动。为此，马歇尔十分恼火，他一面致电杜鲁门大诉其苦[②]，一面严厉警告蒋介石：再继续这样干下去，不仅会严重削弱国民党自身，便利共产党暗中破坏，有利于苏联干涉，而且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严重反感[③]。杜鲁门随后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他设法制止“极端分子”的凶残行为，迅速谋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④]。可是，由于蒋介石此时在山东、苏北进攻得手，哪里还想和平。在给杜鲁门的复信中，他含蓄地但却是强硬地告诉杜鲁门：“和平的愿望必须是相互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其以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有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否则战争很难停止[⑤]。

这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苏北地区的进攻，华中方面共产党军队开始同敌展开大规模激战。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共产党军队不得不以运动战方式击敌，主动放弃了若干城镇。而山东方面，蒋军着手打通胶济线，占据了沿线一些重要城镇和矿区。蒋为此十分得意，气势汹汹地对共产党提出五项停战条件：（1）让出苏皖边区；（2）让出胶济线；（3）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地区；（4）东北共军于10月15日以前退至新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交出此外一切地区；（5）山东、山西两省，共军须退出6月7日以后占领地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似乎也觉得这是劝共产党妥协的好机会，两次三番要周恩来考虑蒋之条件[⑥]。这自然遭到周恩来的坚决回绝。显然，国共关系已走

---

① 1946年7月25日《新华日报》。

②③ FRUS., 1946, Vol. 9, p. 1278、1297 ~ 1299、1419 ~ 1421、1468 ~ 1471.

④⑤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70 ~ 671、672页。

⑥ FRUS., 1946, Vol. 9, p. 1452 ~ 1460、1474 ~ 1489、1493 ~ 1502.

入绝境，无可挽回。马歇尔的希望再度破灭。8 月 20 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无计可施[1]，事实上公开承认了调处的失败。

对于蒋介石的骄横和战争初期的失地，中共中央并不感到意外。毛泽东明确告诫各部队："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坚持以运动战为主的打法，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2]，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3]。

8 月前后，共产党在关内连连奏捷，至 9 月初，歼敌 19 个旅。中共中央信心十足地告诉中共代表团："我军现正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之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之五四个旅"[4]。时至于此，蒋介石仍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于 7 月 29 日下令禁止运送武器给中国，试图迫使他作些妥协。但 8 月 30 日中美签订了让售剩余物资的协定[5]，加上国民党已占领苏北部分解放区，打下承德和全部冀东解放区，打通胶济线，使蒋介石对打败共产党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甚至当司徒雷登提议召集一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国府改组问题时，中共代表作出让步：只要国民党同意一有初步协议即应停战，并放弃五项条件，就愿意参加，蒋介石依然公开拒绝。不仅如此，国民党更公开扬言要占领共产党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为此，中共中央决心彻底放弃和平解决国共关系的一切努力，做公开破裂的准备。

9 月 30 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和蒋介石，发出警告，要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664 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竖排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83、1195、1183～1185 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我应要求蒋军全部退出解放区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 年 9 月 6 日。

⑤ 美国政府此次让售之物资价值 82500 万美元。

国民党放弃进攻张家口之行动[1]，同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2]。

事态发展至如此程度，使马歇尔颇为恼怒，他立即致函蒋介石，表示要中止调处，开始撤出[3]。为以后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蒋不得不故作姿态，提出休战10天，但要求中共必须先行交出参加国府和国大的名单，同时先行规定18个师之驻地[4]。蒋一再约马歇尔等晤谈，为内战政策辩解，并力劝马歇尔继续进行调解[5]。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又再度出谋划策，积极活动，试图说服周恩来接受蒋之要求，以便暂时休战，谈判各项问题。但这显然是徒劳的。毛泽东断言：蒋之停战，全是假的，我们决不受其欺骗。

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再次重申“战胜蒋介石”的充分信心和决心，并电示周恩来，坚决拒绝美蒋提议，惟在“为了揭破美蒋阴谋”的前提下，可提出：(1)停战必须是长期的；(2)进攻张家口之蒋军必须全部退回原来位置[6]。

和平解放国共冲突，从而和平选择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根本消失了。10月11日，蒋发动大举进攻，夺取张家口，再次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日期。作为一种姿态，蒋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发表了由马歇尔起草的一项声明，提出八项条件，表示一俟中共同意，即召开非正式五人会议和三人小组会议，讨论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7]。尽管此举引起了中间党派的某些

---

① 见《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400页。

②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第408页。

③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79～680、680～681页。

⑤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第38卷，第209～215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对美蒋停攻张垣方案我绝对不能接受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10月7日。

⑦ 1946年10月17日《中央日报》。

幻想，就连苏联大使也出面劝说中共设法同国民党和平解决争端，断言继续打下去有极大危险，但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清楚：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了。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拒绝蒋之八项条件，坚持“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的基础上进行会谈①。这当然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

蒋再也不能忍耐了。11 月 8 日，他决心不顾一切单方面召开国大。15 日，蒋记国大开幕，其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面目暴露无遗，周恩来随即撤回延安，民主党派也宣布抵制，与共产党同进退。

1947 年 1 月 7 日，马歇尔一事无成地离开了中国。他显然对中国只有腐败的国民党和亲苏的共产党在那里左右政局，而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集团”，感到由衷的遗憾②。他在蒋介石身边的经历，使他不相信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会有所谓“清明的政治和迈向稳定的进步”。本来，他多多少少是带着美国式的幻想来到中国的。但最后，和他来中国前所预感到的一样：无论蒋介石国民党多么不可理喻，他注定了只能站在他们一边③。

但蒋介石对这样一种结果却是满意的。他一方面胸有成竹地发布“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密令④；一方面热情有余地对马歇尔的“重大之贡献”、“劳绩”和“赞助”，表示衷心地感谢⑤。在蒋看来，无论马歇尔本身多么“无定见”，但他毕竟在和战之间帮助自己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自己在中国的

① 1946 年 10 月 19 日《新华日报》。

② 见《马歇尔使华》，第 461 页。

③ FRUS.，1945，Vol. 7，P.770.

④ 《蒋介石内战密令》，1946 年 12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0 册，第 273 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战后中国（三），第 267 页。

统治，剩下的事情就不那么困难了。他确信是可以很容易打败共产党的[1]。然而，蒋介石彻底地错了。历史的发展正如蒋记国大召开时中共中央所预言的那样："此会开幕之时，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

---

① 参见1946年10月18日《中央日报》，蒋之参谋总长陈诚答记者，扬言："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

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华德事件（The Ward Case），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ugus I Ward，又译为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于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毫无疑问，它是此后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因而可以说是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同时，考虑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美政府一度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可以肯定，对于这一事件前后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具体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确定对美政策的关键一环。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还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① 美国学者的研究虽稍具体，却又较多地侧重于介绍美国

---

①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论文，许多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外交史或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如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几乎都只是把这一事件当作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并不十分重要的小插曲，顺便提到而已。目前只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曾经用了几百字来谈论这一事件的原因。但她也只是认为此事在美国有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则多半是只出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的警惕和急于彻底取消"治外法权"，而采取的一种未作"过细的考虑"的外交行动。章百家的一篇文章也简单地提到这个问题，但认为这个事件纯粹是东北局按照苏联人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极为恼火"。见《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政府的反映，对中共方面的政策考虑则缺少深入了解和研究。[1] 这自然是一种遗憾。但愿本文的发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弥补这一缺憾。

华德事件的发生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上面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华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他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2] 华德看来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3]

华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共产党11月1日

---

① 美国学者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说明，特别值得重视的有爱德温·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该书已于1990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其他还有伯纳德·格茨曼的《人质危机：三十年前》（1980年5月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等。在美国学者中，对这一事件描写得比较全面的，只有陈兼1993年发表的论文。见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8–194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3.

② 《驻沈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函》，1948年11月15日。

③ 《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致国务卿》，1948年11月16日，FRUS，1948，Vol. 7，P.573.

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没有任何企图敌视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的计划。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上任伊始，就立即发出就职通知，并于11月5日以官方身份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份，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①] 这自然使得受命留在沈阳与中共地方当局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白天，华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像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②]

从15日10时开始的36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华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讨论，迟迟没有能够到来。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旧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他才得到了他所盼望已久的召见通知。而在下午2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华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对方毫不动摇，坚持当日下午5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

① FRUS, 1948, Vol. 7, PP.548～549, 829～831.

② FRUS, 1948, Vol. 7, P.826; 华德：《沈阳事件》，《外事处日志》，1950年2月15日，转见 Chen Jian 前引文。

馆接收一切，美领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终于，华德意识到，形势与前有所不同了，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4时，华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①] 很显然，联系到前此的乐观估计，华德不能不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华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5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执行没收电台的任务。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在20日中午1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华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份，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提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部切断。但直到这时，华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180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②]

---

① FRUS, 1948, Vol. 7, P.837;《驻沈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华盛顿电》，1948年11月18日。

② 《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致瓦尔德（华德）先生公函》，1948年11月20日；《驻沈阳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香港美国总领事再转国务院和大使馆电》，1948年11月22日。

"挤走"方针的形成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确有明显的不同。在11月上旬，至少到8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8日回访的某些说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① 此后，沈阳当局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11月15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15日递交给华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份，称其为"总领事"。这也就是说，没收电台的行动看起来最初似乎并不包含着后来的一系列根本否认华德等人官方身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计划在内。②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华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时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11月14日正式签发的没收电台的通令，主要还并不是一个针对美国等国

---

①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年11月11日。

② 一些文章认为，从11月15日开始，沈阳当局就完全否定了美英法各国领事的官方身份，这看来是不正确的。参见Chen Jian前引文。

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一个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而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它确实不包含着具体地否认和打击美国在沈阳领事馆的计划在内，因此沈阳军管会在发出通令之前甚至没有再具体请示中共中央。导致事态向后来的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①] 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

但我们能不能说，没收电台的行动事先中共中央一无所知，事后也明确反对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资料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态的发展同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因为高岗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国等国留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态度是已经决定了的，这就是“挤走”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挤走”方针，事实上还在沈阳当局决定没有收当地所有电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那是在11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东北局提

---

① 苏联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在中国东北之敏感，由此可见一般。在科瓦廖夫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据他说，他当时也曾向中共方面提出过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建议。见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俄）《远东问题》，1992年1—3合期。《高岗致毛主席电》，1948年11月16日。

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曾发出指示称：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1] 不难看出，正是苏联方面这时的态度，使得这次没收电台的行动迅速同中共中央内定的“挤走”美国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外交行动，联系了起来。17 日，毛泽东复电中一句“同意你所取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为沈阳军管会把没收美国领事馆电台的行动升格为封锁与孤立美国在沈阳外交人员的行动，正式开了绿灯。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封锁与孤立，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沈阳军管会在发出没收电台通令时，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引起外交纠纷，因此，当美国总领事华德表示拒绝主动交出电台之后，由于不了解卫戍部队是否有权利进入外国领事馆强制执行，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至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情况，在 11 月 16 日晚 10 时 36 小时期限过了之后，没收行动竟又拖延了三天半之久。对此，毛泽东自然颇不满意。[2] 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人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凡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在核准其外出后，应有武装随行保护)。你们如此办理，可达

① 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96 页。

② 所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极为恼火”不过如此。从他致电东北局质问：“你们没有事先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可以看出，此种“恼火”只是就外事纪律而言，并非反对“挤走”方针和采取相应的策略。

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由于美国领事公然违抗命令，“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无疑是中共中央这时实施“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方针的一种策略。但沈阳方面在实行时却又忽略了这种策略上的必要性。具体说来，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20日中午开始的行动中，有些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比如在这一天，他们其实是不仅将美国领事馆的人员，而且还将英、法两国领事馆的人员也都统统软禁起来了。而他们全面切断领事馆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并非受命于中共中央，纯粹是当时考虑到东北主力部队即将入关必须设法封锁消息，参考了苏联在沈阳的商务代表的建议的结果。显然，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在外交方面的经验是欠缺的。因此，这回又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情况才多少有了改观。尽管已经开始的对美、英、法三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和断电等，一时难以立即改变，但沈阳方面的中共领导人毕竟已经注意到必须区别对待英、法人员，而以主要力量对付美国人了。

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质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他们这时很少幻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对自己的美国会迅速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

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与会者甚至完全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①] 从这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唯一寄予希望的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他们对美英等国政府极不信任。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共产党人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即使是中共中央，最初也并没有把美国等国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看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外交条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坚持留在自己控制区域里却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②]

越是距离新中国的诞生不远，毛泽东就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承认与支持。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威胁的情况下，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必须重视苏联方面的意

---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 年 9 月，《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3 页。

② 参见《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1948 年 11 月 6 日；《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 年 11 月 1 日，等。

见。因此，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方面的考虑之后，即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1]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方面的劝告去做。一向重视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法的毛泽东，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有关"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就再度发出指示，强调区别对待英、法与美国，"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缓和些"，明确认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2]

区别对待的方法，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运用娴熟的一种斗争策略。何况整个"挤走"方针，其实也并不是根本不要与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地还不可能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分化的可能。因此，"挤走"方针的本身完全可以包含斗争的手法问题。至于先"挤"谁后"挤"谁，则应完全视需要而定。重要的只在于孤立美国，因为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总头子，是国民党的总后台，它不仅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处心积虑地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再度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称：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3]

---

① 《毛泽东给高岗的电报》，1948年11月17日。

②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示》，1948年11月18，21日，等。

③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3日。

比较一下同是周恩来起草的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23 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封电报有一点是显著不同的，那就是，在 11 月 10 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它只是笼统地提出封锁和孤立美、英、法，既没有提出区别美国和英法，也没有提出区别东北与关内。而在 23 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 11 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一度开始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1 月 10 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 9 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报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 月 11 日，毛泽东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 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一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更大胆。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

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①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这时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甚至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像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24日发出的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华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② 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执行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又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开始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而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

---

① 《毛泽东关于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指示》，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上的批语》，1948年11月23日，等。

② 关于这一案件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在以后审判华德时曾经部分地加以公布。从当时东北局的报告和被捕特务人员的交待材料来看，应该肯定此一间谍组织确曾一度利用了沈阳领事馆，只不过，经过长期侦察和审讯，关于华德是否知晓此一间谍组织，并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证明。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年11月24日。

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不禁勃然大怒：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1]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同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2] 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对他们前此的外交形势估计产生严重的影响。

---

① 《毛泽东对雷和文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 年 12 月 4 日，等。

② 《中央关于战争期间拒绝一切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的指示》，1948 年 12 月 23 日，等。

外交接触的尝试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①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否认他们的权利，也是理所当然的。1月19

---

① 《目前的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1页。

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①] 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几天之后，即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同这时苏联方面的意见有关，也同这时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

还在1月上旬，南京政府就积极谋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当1月10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征求毛泽东意见时，毛泽东最初曾断然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强硬地拒绝和平谈判，可能会给美国干预中国革命带来借口，斯大林一再劝告毛泽东务必在策略上做出某种姿态，包括对美国也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敌对态度。在反复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之后，毛泽东最终同意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既包括策略上赞同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也包括在外交上避免采取过于生硬的作法。[③] 斯大林的态度显示出，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5~47页。

②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78~79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397页。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桂系李宗仁及华中一带国民党军队最高将领桂系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况且，和平解放北平前后，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的重要条件。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显示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与中共领导人有着友好关系的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和路易斯·斯特朗不用说了，就是多数美国在平津的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并非带有挑衅性。[①] 不仅如此，这时，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大使的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②] 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其在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其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以文书形式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询问。[③] 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当然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共产党为未来中国新主人的可能性。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自1月下旬以来外交手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少灵活的态度，是其外交方针的改变。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

---

① 《史沫特莱致朱将军函》，1949年1月；《鲍大可（Doak Barnett）、司徒禄（A.T.Steele）致毛主席的信》，1948年12月29日，等。

② 《傅泾波致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诸先生函》，1948年12月8日。

③ FRUS，1949，Vol. 8，PP.901~903，907~910.

旧再度重申了他们在1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毛泽东肯定地说：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而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并坚决表示，我们是和苏联站在一起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公开发表文告来说明我们的这种坚定态度。① 这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至少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4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4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开始正式出面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以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34～1437页。

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1] 紧接着，就在中共决定开始渡江战役的几乎同时，针对毛泽东去电征询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回电中特别说明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他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2]

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表现其灵活性的一个适当的机会。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而与此同时，不管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相信与美国政府接触的实际意义，中共中央这时毕竟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4 月 6 日晚，中共中央曾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已经到达香港，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像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即中共中央 4 月中旬初决定以 4 月 20 日为过江最后期限的同时，它才破天荒地致电自己在香港的代表，宣布

---

① 关于司徒雷登的这一大胆的秘密尝试，至今无论是在司徒雷登公布的个人档案里，还是在美国政府所公布的外交档案里，都没有记载。唯一可以作为理解司徒雷登这一行动的参考的，就是他在 3 月 10 日发给国务卿的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第一次明确要求国务院授权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会谈。参见 FRUS, 1949, Vol. 8, P.174;《陈铭枢先生报告美大使来沪密访二次事》，1949 年 3 月 26 日。

② 参见冈察洛夫前引文。

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在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外国人，甚至是像路易斯·斯特朗这样历来受到中共领导人欢迎的美国人，几个月来全部都被拒之门外之后，密尔斯是有幸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将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①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策略意义，但毛泽东并没有像一个月以前那样把建交的门封死。由于对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像几个月以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两天以后，即4月30日，他进一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②

① 《密尔斯备忘录》，1949年；密尔斯：《赴华使命》，1949年；《密尔斯与周恩来谈话纪要》，1949年5月18日。

② 《毛泽东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政策问题致总前委电》，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5页；《毛泽东选集》，第1464页。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拿下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便利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派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前往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①] 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相当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表示同意安排见面，但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②]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③] 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是，从这次接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

---

① 《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参见FRUS，1949，Vol. 8，P.741；并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② 《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

③ 参见FRUS，1949，Vol.8，P.746；《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6页。

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难怪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1]

5月17日，5月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是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者，因此中共方面对司徒雷登应加以信任和谅解。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6月6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突出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与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2]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他们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

① 参见 FRUS, 1949, Vol.8, P.744, 746.

② FRUS, 1949, Vol. 8, PP.752～753；《南京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6月7日。

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在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① 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这时对司徒雷登事实上已无信任可言，它还是在继续推动这样一种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② 然而意相不到的是，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的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此事自然节外生

① 根据笔者1994年4月与齐赫文斯基谈话的笔记及齐赫文斯基在近代史所所作报告。

② 关于此次谈话还有一种格外引人关注的说法，即所谓黄华突然改变了两天前的态度，转而强调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中国的恢复是决定性的。（见FRUS, 1949, Vol. 8, PP.377～378）马丁的《抉择与分歧》一书不仅肯定这种说法是真实的，而且还以此来支持另外一种神话，即至今仍在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周恩来5月31日通过澳大利亚记者基翁转给美国政府的口信。这个口信宣称，中国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并强调中共党内存在着开明人士。（见前引书第357～360页，并见马丁书第38～47页）马丁相信，这两种说法之所以如出一辙，就是因为黄是按照周的“新方针”行事的。但资料表明，黄就此次谈话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丝毫没有上述内容，恰恰相反，报告谈到，关于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的说法，是傅泾波在提出司徒希望能够去北平与周恩来见面时，自己强调的。而黄华当时的答复是：美国对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若无正式表示，司徒去平要求恐怕不会得到回答。再从黄向中央报告的谈话内容看，这时傅已得到所谓周恩来的口信，因此，他极力表示美国政府方面许多人都了解周，也对周近来向人表示的意向感到鼓舞，并知道中共内部见解并不一致，而他们是赞成毛泽东、周恩来并反对亲苏派的。对此，黄明确予以了驳斥，称之为“造谣挑拨、老调重弹”，完全是“美国对我阴谋”。可以想见，如果黄照所谓“新方针”行事，必不会如此表示。

枝。[1]

6月27日，傅泾波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雷登的信，称毛泽东已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2] 事实上这也确是毛泽东的意思。在6月21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中，毛特别就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一事做了专门的批示，称“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3] 然而傅泾波却矢口否认司徒有此意图，称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4]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

---

① 对照当时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和南京外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以看出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和黄华中间经常捕风捉影地传递甚至制造一些假信息。比如，他曾多次向黄华谈到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多次谈到美国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先回美国做短期停留即返北平协助国务院做中共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到了7月21日，司徒雷登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之际，傅泾波又一次向中共传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但中共方面不仅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而且对傅也已再无信任可言。中共中央甚至警告傅：日后切忌不要“招摇撞骗”。

② 《陆志韦致司徒雷登函》，1949年6月16日。

③ 《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21日。

④ 《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

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他们当然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于他们其实也并无丝毫损害。从6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7月1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随后，司徒雷登于9日正式申请于7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对话的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双方的感觉。因为他们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①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这时政策的考虑上确实相差太远，而它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当时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不谈，当时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根本上还在于两大因素。一是历史因素，是他们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的惨痛记忆，他们看不出帝国主义有可能自动地放弃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看不出除了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中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扬眉吐气；二是现实因素，是他们从美国顽固地坚持武装援助国民党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中，从美国处心积虑地利用外交官做掩护，在苏联东欧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自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92页；FRUS，1949，Vol. 8，PP.405~407，801~802.

己的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从雷和文以及司徒雷登等人赤裸裸地主张在新中国政府中支持民主人士抵抗共产党的政治攻势中，所深切感受到的，他们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可能，看不出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像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来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他们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自己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几乎同时。很清楚，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设想，即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公开宣布自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而这个时候一天天地来到了。当中共中央了解到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他们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做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1]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在6月19日突然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

① 《南京市委给中央并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6月10日。

动的情况。本来，在5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领事馆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直到6月初，中共东北局方面对于华德等人的软禁也相当放松，华德也已经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关闭领事馆的指令，并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但这时，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象。显然，这一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他们甚至来不及具体通知中共东北局，并且还没有具体研究是否应当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其必欲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6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①]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二个多半是更为引人注目的强硬行动，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他们尝试过采取某种策略手段，适当灵活地处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人员的关系，甚至为此在表面上与苏联有关人员也保持适当的距离，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迟了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时间。然而，与司徒雷登的对话表明，美国政府的条件远不止于此，他们根本上就反对中共与苏联站在一起，不论

---

① 见《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2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

是秘密的是还是公开的，甚至他们根本上就反对共产党，不论共产党是不是愿意与它们改善关系。况且在事实上，要否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或者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不表明自己的亲苏态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是不是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①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调子，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毛泽东的表态中所包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②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其重视之程度，可以说空前绝后。毛泽东要干什么？那就是，要彻底打破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中存在着的对于美国的幻想，要彻底摧毁司徒雷登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所寄予希望的一切“社会基础”。这个工作，毛泽东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始终在做。先是同党内

---

① 毛泽东在此之后多次说过：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70，1477～148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册，第213页，等。

② FRUS，1949，Vol. 8，P.407.

“恐美”思想做斗争，现在是同社会上的对美国的幻想做斗争。他已经断定，在武装干涉难以实现之后，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只能是内部的破坏与颠覆，而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可供美国政府利用的足以用来颠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根本否定英美外交也好，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只是要让举国上下认清这样一条是非界限，是要警告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毛泽东知道，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在中国还占相当数量，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他们。“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打破这些中间派头脑中对美国的幻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①] 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美国，一方面使其威风扫地，以利恢复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则将其赶出中国，以利根本破灭中间派的幻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87～1520页。

谈判，建立外交关系”。[①] 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②]

从 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又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却更强硬了。毛泽东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③]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

---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告》，1949 年 10 月 1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卷，第 13，21 页。

②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 年 9 月 22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卷，第 19 页；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 年 11 月 8 日，《中共党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59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490～1491 页。

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以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华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①] 而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政府人员。[②] 对于这一结果，正在苏联访问，争取和苏联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的毛泽东看上去颇为满意，宣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才会如此丢脸，如此灰溜溜地离开中国，而“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这样做根本上还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即：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就会困难得多，暂时不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就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③]

① 华德最后被驱逐出中国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1日。参见《新华月报》，1949年12月11日，1950年新年号，合订本第620~624页。

②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合订本第853页。

③ 《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纪要》，1955年9月18日，等。

